

摘 译

一九七四年第二期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 马关路 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5 1/32 印张 5.75 • 字数 132,000

1974年 2 月第 1 版 197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统一书号：10171·278 定价：0.45 元

内 部 发 行

目 录

“我们赶走了希特勒，我们也一定赶走勃列日涅夫！”	
——评《勃兰登堡门旁》.....	徐继先 (1)
勃兰登堡门旁 (苏修中篇小说)	(7)
海浪上的花圈 (苏修中篇小说·梗概).....	(133)
朝霞之诗 (日本电影剧本·摘译).....	(140)
蓝衣骑士 (美国长篇小说·梗概).....	(157)
狮子头们 (美国长篇小说·梗概).....	(163)
艺术地再现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	
(苏修文艺理论 ·节译).....	(173)
苏修文艺动态 (6则)	(136)
日本文艺动态 (2则)	(155)
美国文艺动态 (3则)	(171)

“我们赶走了希特勒， 我们也一定赶走勃列日涅夫！”

——评《勃兰登堡门旁》

徐 继 先

一九七〇年，苏修控制的华沙条约国武装部队，在东柏林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三年之后，以这场演习为背景的中篇小说《勃兰登堡门旁》便出笼了，并被大肆吹捧为反映了当代“最重大的主题之一”——“国际主义”的作品。

社会帝国主义而宣传起国际主义来了，岂不滑天下之大稽吗？《勃兰登堡门旁》就是这样的一篇绝妙佳作。在这部小说里，是非是颠倒着的。实际上的大国霸权主义，小说偏偏说这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主义”；实际上的侵略，小说偏偏说这是“友谊”。在这部小说里，是非就是这样完全颠倒着的。

小说中的一个驻德苏军上校普罗霍洛夫曾振振有词地吹嘘说：“他们学习打仗不是为了去跨越别人的边界，而是为使那些有时想要跨越别人边界的人，别迈出冒失的步子。”人们不禁要问，你，普罗霍洛夫上校，不正践踏着别国的领土吗？不、不、不，普罗霍洛夫上校把这叫作“战斗的兄弟友谊”。正是由于这种“友谊”的需要，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布拉格的街道一夜之中被苏修的铁蹄蹂躏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民族权利被苏修剥夺

殆尽。也正是由于这种“友谊”的需要，苏修在东德驻有三四十万军队（小说中的这位普罗霍洛夫上校先生当然也是其中的一分子了，而且是一个颇为重要的分子），在匈牙利驻有六万军队，在波兰驻有四五万军队……。既然美其名曰“战斗的兄弟友谊”，那末所有这些国家在苏联驻有一兵一卒没有？它的答数是：0。这种单方面的“友谊”真是太不平等，太叫人难堪了。更有甚者，苏修军队在各驻在国还可以享有种种特权，只要在“苏军有不安全之感时，可采取各种措施以消除威胁”。这种“友谊”，就是建筑在丧失别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基础上的。普罗霍洛夫上校自己招供道：“我一辈子都是坐在箱子上的，今天在这里，明天又到那里。”这倒有点使人相信，因为，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勃列日涅夫们看来，就如小说中所写的：“到波兰或保加利亚去，比到诺夫戈罗德或苏兹达尔去要容易。”他们“跨越别人的边界”，如同在自己的国土上旅行，甚至还要神气活现些，以显“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一家之长”的威风啊！所以，当大大小小的勃列日涅夫们要来跟你“友谊”、“友谊”的时候，千万要警惕。黄鼠狼给鸡拜年，安的可不是好心。他们的“友谊”就是侵略和掠夺。

苏修在军事上“跨过别人的边界”或者到处张牙舞爪炫耀其军事实力，其政治目的，无非是搞“逼宫”，要那些中小国家的领导集团就社会帝国主义之范，围着苏修的指挥棒转，为其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服务罢了。

然而军事上、政治上“跨过别人的边界”，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在经济上“跨过别人的边界”。资产阶级是为攫取最大利润而生存的。勃列日涅夫们当然也不例外。按照“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所谓分工，苏修为某些东欧国家规定了这样的“前景”：保加利亚只准发展农业。“前景”就是成为苏修的“果菜园”和“宅旁园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只准发展机械加工等某些工业，“前景”也不妙，只

能成为苏修的附属加工厂；匈牙利呢？给你发展些传统的工业已经不错了，“前景”也还是成为苏修的工业附庸。既然某些东欧国家不允许有自己的完整独立的经济，经济命脉被掌握在苏修手中，当然只能唯命是听了。然而这又是一种多么不公平的买卖！以石油贸易为例，苏修卖给某些东欧国家的石油售价要比国际市场高一倍以上，而其从另一些东欧国家进口的石油价格却要比国际市场低许多。一九六九年，由于苏修对东德出口价格高于对西德出口价格，光这一年，被苏修额外榨取的暴利就有二亿多卢布，占该年东德出口总额的近六分之一。这种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和无耻掠夺，大概也是叫做“战斗的兄弟友谊”吧！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鲁迅杂文《牺牲记》中那个骗走了人家最后一条裤子，还自吹是“成人之美”的恶棍的丑恶嘴脸。当然，那个恶棍也算不了什么，与今日的苏修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以“友谊”之名，行占领、剥削、掠夺之实，这就是社会帝国主义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这种政策是由它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苏修叛徒集团在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一小撮特权阶层垄断着苏联的国民经济，垄断已经成为苏修社会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列宁指出，垄断的必然结果是侵略、扩张，争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现代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结果。垄断资本集团主宰的资本帝国主义是这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帝国主义也是这样。了解了这一点，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疯狂扩张就好懂了；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满嘴“友谊”也就好懂了。有侵略，就有反抗。现在，苏修到处伸手，到处扩张，结果到处碰壁，它的帝国主义真面目已经越来越暴露。为了掩盖它的越来越大的扩张野心，就不得不把“友谊”的廉价口号叫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响。《勃兰登堡门旁》这样一部用友谊掩盖侵略的小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笼的，它

适应了苏修叛徒集团对外政策的需要，因而受到赏识，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勃兰登堡门旁》还故意地把以普罗霍洛夫上校为代表的苏军一伙，编造成为当年是把东欧人民从法西斯铁蹄下解放出来的救世主，而今天又是东欧人民的恩赐者。为了使这种编造能够达到吹嘘“友谊”的目的，小说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华沙过去并不是这样的”，“一片废墟”，“现在建了那么多大厦”；“柏林过去也不是这样的”，现在，呵，“绿树成荫”，“行人如织”，多繁华，怎么来的？还不是靠普罗霍洛夫们解放你们，帮助你们建设起来的！可是从这种自吹自擂的“友谊”中，人们却看到了社会帝国主义的恶习，嗅到了大国霸权主义的臭气！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把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看作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并且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都是相互支持的，援助不是单方面的。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确实给东欧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以很大的影响，但是，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本身也是同东欧各国人民长期的反法西斯斗争所给予的支持分不开的。而东欧各国的解放，则总归是这些国家人民的长期斗争的结果，“首先是依靠自己的斗争，其次才是国际的援助”。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修正主义上台，就是大资产阶级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苏修叛徒集团就是当代的法西斯、当代的希特勒，是骑在东欧人民头上，敲骨吸髓的死敌。它们根本没有资格谈论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它们恬不知耻地以“反法西斯英雄”自居，把自己打扮成普渡众生、救苦救难的救世主，这只能说明他们歪曲客观事实已经到了何等卑鄙的程度。

为了要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小说中精心安排了诸如此类的情节：在飞机上要为“从莫斯科走到柏林的人干杯”，因为他们

是“功臣”；在波兰兵营参观历史厅时，白发苍苍的波兰军官流利地用俄语解说：“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全师宣誓……忠于对苏联的联盟”，因为“是苏联给了我手里的……武器来同我们共同的敌人作斗争……。”小说还蓄意编造了德国人汉斯、库尔特父子等许多人物，通过他们的嘴，为苏修侵略、霸占东欧歌功颂德，似乎今天东欧各国人民是当真把苏修的法西斯统治当作“友谊”来领受的。你看，在工厂里，到处张贴着歌颂同苏联友谊的大幅标语；至于象卡什塔诺夫这样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过役的退役军人到汉斯家里去作客，那简直成了救世主光临，真是一派“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遇到友谊”的情景。可惜，这种盛况只存在于小说的杜撰之中，在现实的东欧却是不存在的。一九六八年苏修用刺刀和坦克制造了“捷克事件”以后，塔斯社不也发了许许多多所谓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热烈欢迎“兄弟的苏军”来把他们“从背离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拯救出来”的消息吗？但是，真实情况却是从一九六八年十月到十一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布拉格就发生了多次公开的示威游行，数以千计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高举“宁死不屈”、“我们要自由，不要俄国的奴役”等标语和旗帜，抗议苏修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示威群众不怕苏修占领军的镇压，愤怒地冲向苏修大使馆，向着苏修大使馆高呼：“俄国佬滚回去！”“我们赶走了希特勒，我们也一定赶走勃列日涅夫！”这才是东欧人民的真正形象。这种光辉形象不但存在于广大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之中，也存在于其他东欧国家人民之中。去年华沙上演了一个以反抗老沙皇对波兰人民的压迫为主题的历史剧《先人祭》，轰动全波兰，不正说明了广大波兰人民决心从新沙皇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新觉醒吗？毛主席说过：各国人民“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这就是历史的真理！

当然，苏修侵占和控制东欧，仅仅是它妄图称霸全世界的桥头堡。十九世纪的老沙皇尼古拉一世曾经叫嚣：“俄国国旗不论在哪里升起，就不应当再降下来。”而今天，老沙皇的魔影正深深地印在克里姆林宫的新贵的肥脑中，他们正重温把侵略之旗升到全世界的旧梦。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倒是说出了勃列日涅夫之流在公开场合羞羞答答不敢公开说出的话：“士兵们从战壕里跳出来，马上就遮住了半个地球，就象遮住半个地球仪一样。”区区东欧，何足以填新沙皇称霸世界的欲望？要遮住半个以至整个地球，这才是新沙皇梦寐以求的心愿。这不正恰恰暴露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同美帝既争夺又勾结，妄图称霸世界的狂妄野心吗？

捷克人民说得好：“我们赶走了希特勒，我们也一定赶走勃列日涅夫！”胜利属于东欧人民！胜利属于世界人民！

勃 兰 登 堡 门 旁

(苏修中篇小说)

作者 B·斯捷潘诺夫

载于苏修杂志《旗》1973年第5期

第 一 章

“要到柏林，每跨一步，地雷轰鸣。”

(选自战争年代战士的俗语)

“我们的飞机‘伊尔—18’开往柏林。飞行时间是两小时三十分。乘客同志们，祝你们一路平安。”

(选自民航机上女服务员的通告)

卡什塔诺夫有生以来一次也没有乘过飞机。因此当隔板上突然闪现出“不准吸烟！扣上皮带！”的文字时，这无声的令人惊慌的警告，使他焦躁不安起来，他坐在安乐椅上，转来转去，把身体更深地压在椅子上。他长时间地扣皮带，可是怎么也无法扣上。当他看到这种扣环，跟村里熟悉的电工腰里扎的几乎一模一样，而那个电工就靠这扣环毫不害怕地在很滑的电杆上爬，这时他稍稍安定起来了。当一个讨人喜欢的姑娘，捧着装满糖果的托盘，在安乐椅间轻盈地走过的时候，卡什塔诺夫心上已经产生了十分舒适之感。她不仅脸部露出微笑，甚至她天蓝色短上

衣的每一个钮扣，每一条褶纹都露出了笑意。“你瞧，在空中她满不在乎，还穿着高跟鞋！”卡什塔诺夫神往而钦佩地想着，同时小心翼翼地用两只指头夹起一块糖果。

飞机急躁地轻微地震抖起来，同时在柏油地坪上开始滑行。“现在我们要起飞了！”卡什塔诺夫紧张地在想。但结果没有猜对。飞机好象紧束起翅膀，以免碰着正在停机坪上打盹的自己的同行，走上了主要的起飞跑道。它忽然呆立不动了，就象百公尺的快跑能手，集中全力准备冲刺那样。功率强大的发动机吼叫起来，用足全力，好象发出了胜利的召唤，这声音响彻了整个机场，在机场的一端到另一端广阔的空间荡漾。接着飞机就向前滚动了一阵，冲向天空。卡什塔诺夫感到，好象有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强劲力量把他挤压到安乐椅的靠背上。他领悟到：“现在确实是起飞了”。

可是卡什塔诺夫还是没有看到飞机的起飞。他没有感觉到，他们是怎样飞离地面的，当他朝舷窗外张望的时候，看到的已经是变成玩具一般大小的一幢幢房子，象铅笔大小的工厂烟囱，河流有如缎带，森林有如田畦上的秧苗，这一切都在脚下遥远的地方一一掠过。飞机微微抖动着翅膀，急速地向高空飞升，好似从海市蜃楼的深处冲向高处的什么地方，而下面的一切越来越缩小，越来越模糊不清了。整个城市好象沉没在浩瀚水库的底层，房屋象一块块小砖头，那些汽车象小甲虫似的，在这些砖块中间爬行，而行人已经根本无法看清。云彩象一块轻软的白色围巾，从机翼上飞落而下，卡什塔诺夫看着那雾气濛濛的地平线，如今已漫延到几百公里，他不禁愁闷地想到，可能现在正在故乡伊凡诺沃小村上空飞过。真是件奇事啊，在那下面，在那不可见亦不可及的世界里，他的妻子格鲁尼娅，也许已经生好了炉子，现在正在桌边忙碌着，竭力想使从城里到双亲这里来度

假的女儿感到满意。

卡什塔诺夫刚一想到家，一种疑惑之感又在心中油然而生：出这样的远门，做得对不对呢？对这件事，他连想也没有想到过，算也没有算到过，可是突然区里来了个电话说：“达尼雷奇，你是否想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去一趟？有一张价格可以优待的票子”。“这种恩惠是为什么呢？”“是为了奖励你的工作。”

卡什塔诺夫没有急于作出回答，他请求能有一天时间进行考虑。可是在家庭会议上，正如他自己有时候开玩笑所说的，“在谈判桌边”，作出了决定：派卡什塔诺夫·谢苗·达尼洛维奇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差一趟。妻子的理由是：“你去看一看谢连卡，想必他不会有休假……”女儿的理由是：“没有什么好考虑的，要是我处在你的地位的话……”表决的结果是：两票赞成，一票弃权。

妻子有她自己对的地方：儿子谢尔盖在驻德苏军中服役已经第二年了，为什么要放弃去看看他的这个幸福的可能性呢？女儿显然是想弄到一些礼品。至于说到自己的理由，尽管卡什塔诺夫没有说出口，可是它要有份量得多。已经几乎有二十五年了，谢苗·达尼洛维奇象怀着一个神圣的秘密一样，怀着一个宿愿，就是想看一看曾经出现在他生命的十字路口上的一个城市。在二十岁的中士卡什塔诺夫的想象中，这个城市是一个可怕的海市蜃楼，当时，这个中士在沃洛科拉姆斯克附近积雪的战壕里冻得要命，只得用呼出的热气来暖和冲锋枪的枪栓。在人世间，再也没有比要走到这个城市去更大的愿望了，哪怕甚至不得不在雪地里爬上一千公里，也要到达那里。

这个城市的名字叫做柏林。

一九四五年五月，卡什塔诺夫乘在颠簸的、积满尘埃的灰蒙蒙的坦克的钢板上，开进了这个城市，可是他没有认出这个早已

给自己描绘过的城市。它比想象中的柏林更可怕，更难看。它好象天生就是一堆废墟，没有窗的洞口里吞吐着火舌。好象是建筑师们特意把它造成这种畸形残酷的样子，作为仇视人类的那一代人的某种象征。

可是曾经这样吸引过卡什塔诺夫，好象用一块看不见的磁铁把卡什塔诺夫吸到了自己跟前的柏林，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从那阴暗的地下射出了一颗致命的炮弹，城里最后一批炮弹中的一颗，轰隆一声向着钢盔上铸着一颗星星的年轻战士飞去。

卡什塔诺夫记得，这件事发生在离勃兰登堡门不远的地方。而随后的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都是单调地在医院的四壁中度过。重伤之后，他一直在各个军医院里转来转去，偶尔回家，只是作短期休假。医生们当然尽力所能及给他医治了，可是要神奇地把他治愈是没有指望的了，因为在卡什塔诺夫背部里面，靠近腰的地方，现在装着一个用不锈钢做成的弹簧，它把被弹片伤过的椎骨束在里面，以保安全。一条腿夜夜痛得忍受不了，这使他想起在离柏林还有几百俄里^①地的尔热夫斯基森林里，在五步路外爆炸的一颗地雷。此外，根据医生们没有解释清楚的原因（也许是伤及了一根神经）左眼开始褪色了，说简单些，就是左眼开始长白翳。如今他这一只眼睛几乎已经失明了。

不，对卡什塔诺夫来说，战争并没有结束，无论是在一九四五年，还是在过了十年——十五年之后。正如有一次谢苗·达尼洛维奇痛苦地开玩笑所说的，正是在柏林，他也得到了“一级残废”的称号。顺便说一说，当时卡什塔诺夫几岁了呢？好象是二十四岁吧？正是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候，正是“各种工作都很

① 一俄里等于1.06公里。

好，凭你兴趣来挑选”的时候。可是这么一来，不论你往哪里走，到处都走不通了。要不是村里的医生助手，真不知道那苦闷残疾的日子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医生助手，是个直爽的汉子，他说：“你想要多活五年到十年吗？”唉，怎么不想呢，要知道连谈恋爱还没有来得及啊……。“你既然想，”医生助手拍着他的肩膀说：“那你就到养蜂场去找个工作，这是我对你的劝告，今后你会感激的。”

这个十年制中学的优秀毕业生、光荣勋章的获得者、坚定勇敢的中士卡什塔诺夫，就这样成了集体农庄的一名养蜂人。

在历次检查身体的时候，医生们都耸耸肩膀表示惊讶，他们本来以为，他这个人是不久于人世的，可是结果竟……

医生助手有时候跑到养蜂场来，他说：“蜜蜂怎么样？刺人吗？那好吧，你就多让它们刺刺吧……”

就是说，战争并没有把一切东西都夺走。将近老年的时候，孩子们都象体态挺拔的杨树一样成长起来了。女儿即将成为一名教师。儿子在部队里，看来并不是属于落后之列。对谢苗·达尼洛维奇来说，他们好象行军队伍中的领头人，他好象就是为跟上他们而走着。

卡什塔诺夫向舷窗转过身去，飞机现在好象是在积雪的草原上空飞行，云彩在下面软软地铺开，整个辽阔的空间真好象刚刚撒上了一层薄薄的雪花。要是他忽然看到机翼下面有穿着五彩缤纷的绒线衣的滑雪运动员在跟飞机互相追逐，他是一点也不会感到惊奇的——这一片闪耀着金光的静寂的白云，真是太象地面了。发动机无忧无虑地响着，因此卡什塔诺夫已经听得出来乘客们的谈话声了，这些乘客们大着胆子正在解开那系着的皮带，坐椅上腾起了一缕缕香烟的烟雾。

邻座上是一个三十岁左右，身体胖大笨重的小伙子，全神贯

注于飞行的卡什塔诺夫，起先并没有注意到他，现在他也掏出了香烟，习惯地打开了圈椅扶手上的烟灰缸，同时象人们初交时的问话那样问卡什塔诺夫道：

“大概是第一次到柏林去吧？”

“不，要算第二次了……”

“你真走运，”年轻人叹了一口气说，“可是我呢，跟伊里亚·穆罗麦茨^①一样，耽在一个地方，一耽就是三十年。”

“你的一切还都在将来呢，”卡什塔诺夫一面说着，一面想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在谈到自己是第二次访问柏林时，他没有向这个年轻人说谎。他笑了一声，想起了出国登记表上的一个项目曾经使他大伤脑筋：“工作、因公出差，还是随代表团出访，及其目的”。这里该回答些什么呢？他决定凭良心来填写：“曾经出国，到过华沙和柏林，目的是把人民从法西斯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他对这一措词如此满意，以致把格鲁尼娅叫来了，并高声地朗读给她听。“你看？怎么样？简直象登在报上的，要不就象无线电里广播的文章！”“你啊，真是个吹牛家！”妻子微笑了一下说。而当卡什塔诺夫对着镜子，打量着那件新衬衫的时候，妻子又说开了：“你当心，达尼雷奇，你在那里将迷惑住一个什么弗拉乌^②。我看，我要倒霉了。”

卡什塔诺夫默不作声。该说些什么呢？要是在二十五年前，这些话倒是一针见血的。中士当时在连里并不是最差的青年。因为他体态匀称，姿势端正，因为那船形帽檐怎么也掩盖不住的波浪式的额发，因为他那褐色开朗的眼神和那脱口而出的笑话和俏皮话，所以不论低级的和高级的指挥官总带着卡什塔诺夫一起去参加跟当地居民的各种会见和谈判各种事务。为了使外国

① 俄罗斯壮士歌中的主人公，勇士，俄罗斯土地的主要保卫者之一。

② 德语，太太。

人看一看，俄国的士兵是怎样的人才。当然啰，有过这么一类事情，有时，人群中年轻的弗拉乌的眼光会象子弹一样射到你的身上：姑娘们嘛，她们到处都一样。

可是现在镜子里映出的却是另一种形象了。眼睛已经褪色，变得暗淡无光了，好象里面的电池已经用光了，可是没有替换。脸上布满条条皱纹，好象大型地形图上起伏的地势一样。已经无法认出达尼雷奇，无法认出。甚至无论怎样时髦的衬衫也无法使他的形象得以修饰和翻新。可是在从前，军便服就是最好的衣衫。这身旧时的军便服至今还放在五斗橱底里，已经久未熨烫，而上面的一枚枚勋章叮当作响，象铠甲上的环一样。当年穿着这套服装，走遍了半个欧洲，确实不错，这是最时髦的服装啰！人们给以荣誉，到处鲜花相迎……

于是，卡什塔诺夫象起飞时那样，重又产生了一种疑惑之感。但是谢苗·达尼洛维奇立即抛开了那种种令人厌烦的思想，想起了主要的，已经完全定下来的事情。归根结蒂，他不是去散步旅行。而且既然自己的亲生儿子在那里生活服役，那末一个别人的国家也就不怎么是别人的了。同时，卡什塔诺夫心中还抱着一个微弱的希望——见一见当年的中尉，同团的战友普罗霍洛夫，如今大概是上校了吧。谢尔盖正巧是在他的部队里服役。

“我是到自己人那里去，就是这么回事。不必多想别的！”卡什塔诺夫给自己鼓了一下气。

机上女服务员给每一个人分发了一只盛着早餐的小巧细致的托盘。卡什塔诺夫觉得，“好象在幼儿园里一样”，可是，奇怪的是，他发觉高脚杯里装着淡绿色的液体——烈性葡萄酒。

“一百克军用的①。”他不拘礼节地把旁边那个人推了一下。

“什么？”那人不解地问。

① 一百克是指卫国战争时期发给前线军人的伏特加酒定量。

“军用的……”卡什塔诺夫闷闷不乐地笑了一下说，“有一支歌，大概你听到过吧：《请你把自己一百克军用的倒满铁杯……》”

“没有，没有听到过，”旁边那个人承认说。

“这么说，我们为什么而干杯呢？”卡什塔诺夫一面问着，一面用指头捻转着高脚酒杯，好象要使杯子发暖似的。

“就让我们为一切美好的事情干杯吧！”旁边那人一挥手说道：“有什么关系呢！”

“人们是不会为随便什么事情而干杯的，”卡什塔诺夫反对说：“一定总得有一个意义。让我们为那些徒步从莫斯科走到柏林的人干杯吧。为那些走到了和没有走到的人……这意思就是，为那些士兵干杯，”卡什塔诺夫补充说。

“当然……这说得真好，”旁边那人同意地说。

朵朵云彩紧贴着舷窗，飞机好象沉没在松软的雪里似的。机舱里忽然间一暗，随后光线又射进了圆圆的窗洞，只不过不是从上面射来的光线，而是从下面。从那白茫茫的云幕断隙处，卡什塔诺夫看到了大地。

“大概，已经是德国了，”旁边那人说着，便把皮带扣环咔嚓一声扣上了。

隔板上重又亮起了警告性的词句：“不准吸烟，扣上皮带！”

“现在我们降落了！柏林阳光灿烂，气温是十二度！”机上女服务员以如此得意的语调宣布，好象是她为乘客们预订了天气似的。

飞机又下降一些，大地摇晃起来，它好象从侧面向舷窗紧压过来似的。

“您不要摆架子，”旁边那人说：“您扣上。”

可是卡什塔诺夫已经什么也听不见了。他把前额紧贴着舷窗冰凉的玻璃，全神贯注地盯着下面掠过的一幢幢红顶住宅，他

的目光搜索到了每一条小河，每一条道路，每一座小山，每一丛小森林，白费力气地企图找到二十五年前熟悉的遗迹，哪怕是某种标记也好。谢苗·达尼洛维奇知道，寻找是枉费心机的，因为他从来也没有从飞机上鸟瞰过德国。可是由于激动而紧缩的心在怦怦地跳着，在祈求着：你看，也许，可能……当年坦克不是就沿着这条栽着一排排小杨树的公路隆隆开过，履带挤石，溅出星星火花吗？你记得那戴着烧得焦黑的头盔的坦克手说的话吗：“步兵，不要扬起灰尘走路了！你们请上来，我象风一样快地把你们送到柏林！”不就是在那个给水塔旁边，直到最后时刻塔上的机枪打得哗啦响，一个排里立即断送了八个人吗？就是普罗霍洛夫排里的八个人。不，好象不是那个塔，不象。那个塔更庞大些，象砖头的堡垒。可是，那边有条熟悉的小河！……是的，是那条小河！还有那棕黄色岸边的小松林……渡口。不过，不是，渡口是在这里，在桥偏左一点的地方，这座桥当时被炸毁了。话又说回来，根本不是这座桥，看来，这桥是很久以后建造的……可是，侧面这个村子是怎么一回事呢？……

飞机在降落，大地在机翼下加速飞跑。卡什塔诺夫泪水盈眶，可是他眼睛一眨也不眨地依然在看着，在看着，唯恐放过了那一定得看到的东西……不，战时的青春，根据一切情况来判断，没有留下任何识别的标记。不论你怎么寻找，你也无法找出一件能触动记忆的东西。从空中看下来的一切，都好象第一次新看到一样。卡什塔诺夫看着那以飞快的速度疾驰而过的大地，他忽然懂得了过去在地面上用普通战士的脚步走路时从未想到过的东西。穿着厚油布靴迎着子弹而通过的路途的长短，是另有一种量法的。无论哪一架超音速飞机，它都无法跟以散兵线冲锋前进的普通步兵连队相竞争，因为冲锋起来，往往每进一步都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只要想一想啊，”卡什塔诺夫出声地说：“从莫斯科到柏林只花了两个半钟头！……”

“这有什么可说的呢——技术嘛……”旁边的人以开导的口气回答说，一面把飞机上的水果糖塞进嘴巴。

有人立即把他们这个旅行组从机场送往旅馆去。卡什塔诺夫一路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在这里遇到的第一个德国人，他完全还是一个青年，留着向后梳得又平又光的淡黄头发，毫不涩讷地说着俄国话。

谢苗·达尼洛维奇心里盘算，这个游览向导员可能比谢尔盖大一、二岁。在我国随便哪个城市里，要是遇上这样的小伙子，你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是个德国人。

二十五年前，卡什塔诺夫在柏林看到的最后一个德国人，在七十步左右远的地方，挟着火箭筒，从一堆废墟奔到另一堆废墟，寻找着苏联坦克无防御的侧面。他年纪很轻，十分瘦小。身上晃晃荡荡地穿着一件从别人肩上脱来的军大衣，就好象一只大口袋套在一根桩上似的。这件人家的军大衣，他穿着如此不合身，以致看来在奔跑着的好象并不是一个士兵，而是个大学生，他手里拿着的好象并不是足以致人致命的炮弹，而是一个装着图纸的圆匣。甚至手也抬不起来对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瞄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卡什塔诺夫迟了一步。眼前闪过一阵红光。就一切都结束了。一个穿着长襟军大衣，手里拿着图纸匣的男孩子的形象，就这样在记忆中留下来了。

“也许应该到维尤恩斯多尔弗去跑一趟，去了解一下，我们军人住的小城在那里”，卡什塔诺夫打定主意，一面在口袋里摸着写有谢尔盖地址的信封。

旅馆里已在等着他们。马上便开始分配房间——两人一间。

卡什塔诺夫要求让他跟飞机上邻座那个人住在一起，因为大家毕竟已经相识了。谁也没有表示反对。

“喂，怎么样，”卡什塔诺夫满意地说：“我们去占领拨给我们的公馆吧。”

房间不大，但也并不显得窄小。整个房间闪闪发亮，好象新年枞树上用鲜艳的纸片粘贴成的玩具一样。

“现在就是抓住耳朵，也不能把我们从这里拉出去，”卡什塔诺夫作了个总结，可他自己刚把箱子推到橱下面，就仓促地准备到什么地方去了。

“您怎么啦，您不知道计划吗？”同房间的人摸不清头脑地问：“现在休息到十四点，洗洗脸，刮刮胡子，之后吃饭和第一次集体参观。”

“孩子，我应该赶快去完成自己的计划。因为家庭情况，已让我请假到十八点正，”卡什塔诺夫笑着说，同时把鞋后跟啪的一声并拢。“你允许我去吗？”

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一股劲头！好象年岁和疾病都突然减轻，他沿着楼梯，每步跨两级阶梯向下走去。他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了，打开了第二扇门。他深深地吸了口气，说道：“你好，柏林！”

现在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跟着人们一同走，随着旅游向导员的手指头看。二十五年来，他一直在等待着这一时刻，以便能这样单独地和这个城市会见。有一度这个城市曾受到永世不得翻身的诅咒，可是后来它重建成了另一个城市，不象从前那个样子。“你好啊，柏林！”

两条腿自动地把卡什塔诺夫带向心灵召唤的地方，带向那勃兰登堡门，带向那金属碎片涂掉了百万生命中的一条生命，即卡什塔诺夫生命的地方。由于碰巧运气好，金属碎片没有勾销掉，而恰恰正是涂掉了他的生命，以便让人把一切从头来起，按

照战争所希望的方式。

可是，当走到第一个转弯处的时候，卡什塔诺夫忽然想起，从旅馆到勃兰登堡门的路他不认识。是啊，还在家里的时候，谢苗·达尼洛维奇央求图书馆女管理员，弄到了一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旅行指南，他心里暗暗地不止一次走过城市的主要街道，并且牢牢地记住了，要到朝思暮想的勃兰登堡门，该走翁捷尔——登——林登大街，可是这一条翁捷尔——登……在哪里呢，如今要断定，这是不可能的事。尽管是星期天，可是路上碰到的行人却很少，所以卡什塔诺夫也没有立即就决定问一问，到要去的那条街道，该怎么个走法。

他长时间地在街角上裹足不前，最后他终于壮着胆向一个推着装有各种食品的摇篮车的，上了年纪的干瘦的德国女人探问。

“翁捷尔——登——林登……”卡什塔诺夫感到不好意思地问道：“到翁捷尔——登——林登大街该怎么走？”

那德国女人抬起了描画过的眉毛，又快又不清楚地不知说了些什么。卡什塔诺夫懂一二十个德国词，可是一个熟悉的字也没有抓住。

“费尔什捷叶尼希特，”^①他耸了耸肩膀，感到脸刷地涨得绯红起来。

“费尔什捷叶尼希特，费尔什捷叶尼希特，”德国女人点着头，忽然间抓住了卡什塔诺夫的衣袖，向后转，并拉着他跟自己走。她如此迅速地碎步走去，以致谢苗·达尼洛维奇不得不加大步伐。在僻静无人的街上，他们走了相当大的一段距离，德国女人终于停下了脚步，说了“比捷”^②之后，指了指街角一幢房子

① 德语，意即“什么也不懂”。

② 德语，意即“请”。

上的牌子。“翁捷尔——登——林登”，卡什塔诺夫照字母读了一遍。他想用德语说句“谢谢”，可是好象故意为难似的，话全都忘光了，只是不自然地笑了笑，和她点头告别。

是啊，这就是有名的翁捷尔——登——林登大街，这就是卡什塔诺夫过去根据画报所想象的一条大街。可是无论哪一张照片，甚至是色彩最鲜艳的、最精致的照片，也无法反映出好似在飞翔的、以一幢幢崭新建筑物的银色线条勾划出来的这一美景，也无法反映出好似由浅蓝色的天空切割而成的接连不断的窗户，也无法反映出这些排成四行傲然屹立在那里的翠绿的菩提树，也无法反映出跟我们那里一样的人群，他们为了欢度节日都走到街上，让人家看看自己，自己也看看别人。卡什塔诺夫立即跟行人们融成了一片，不由自主地听命于街道的节奏。他走着，肩膀一会儿碰到了迎面过来的人，一会儿又碰到了同行的人，他已经忘却了现在自己正在柏林走着。

这里还有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吗，还有一九四五年五月看到过的东西吗？什么也没有了。一点痕迹也没有了。难道这就是当年树枝被炮弹烧焦或是打断了的菩提树吗？卡什塔诺夫在一棵树下停下了脚步，他的目光在树干上搜索着。也许，就是在那个凹凸不平的木瘤下面藏着一块弹片……新的树皮长出来，把它盖没了。有名的翁捷尔——登——林登大街，意思就是说，在菩提树下面的街道。菩提树下的街道……关于这种树，卡什塔诺夫在什么地方曾经读到过。那些最老的菩提树，是一九三六年出生的。说确切一点，是一九三六年在这里种植的。树枝已经长得弯曲多节错综交叉，织成了茂密的树冠。树枝簌簌作响，是在倾诉什么？……而旁边栽种的还是十分幼小的菩提树苗，树干还没有被琢上条条皱纹。那些小树站在那里，就象手持绿色小旗的孩子们奔上人行道似的。“翁捷尔——登——林登，

翁捷尔——登——林登，这就是树叶的嘹亮的歌声……”从无线电里，还是什么别的地方，你听到过这支歌吗？早已忘记了，可是现在忽然记起来了。

城市变样了，完全变样了！要是把卡什塔诺夫的眼睛蒙着带到这里来，随后在街中心给他解开蒙眼的绷带，对他说，他来到了柏林，他是决不会相信的。不可能把现出殷勤好客样子的这些住宅，想象成被破坏得歪歪斜斜的样子。在金莲花愉快的火红色彩之中，这里一片片剪得平整的草地，不可能被践踏，不可能堆满一堆堆碎石。如今要把正在欣赏着秋高气爽清新景色的镇定自若的人们，来跟头戴钢盔、脚穿铁皮包靴、由于愤恨而发抖的双手把冲锋枪的准星瞄准着你的暴徒作比较，这是无法想象的。笼罩在从施普累河一浪接着一浪飘浮而来的愁云惨雾之中的那个柏林，在每个街角和十字路口上，在所有堑壕密布的广场上，都有装甲车喷吐火舌的那个柏林，理应受到全民和全世界痛恨和报复的那个柏林，如今在哪里呢？那个柏林好象钻入了地层……

卡什塔诺夫从林荫道转到广场上，惊呆地停下了脚步：在他面前奇迹似地忽然出现了那熟悉的，熟悉得令人心痛的勃兰登堡门的轮廓，这门和周围的景色无论如何也协调不起来，就好象是另一个时代的陈列品似的。有六根沉重的圆柱，在上面有四匹奔跑着的青铜马。他甚至觉得，这些柱子好象在笨重地跨步一样，好象巨怪的脚一样。

他记得，他清楚地记得这些门。当年他在柏林看到的最后的东西，那就是一个挟着火箭筒在飞跑的孩子样的兵，还有这些好似要把他，把卡什塔诺夫中士压死似的柱子。

就是说，在这里某个地方，在大约五十公尺的地方……在这幢房子附近……可是当时没有这幢房子。在这里当时是另

一座已成废墟的房子。也许，就是在如今绿茵如毯的草地上，当时曾经有过那幢建筑物吧？也可能，卡什塔诺夫如今站着的地方，正是那硝烟弥漫的五月的一天，他痛得痉挛不已而倒下去的地方吧？卡什塔诺夫甚至望了望自己的脚下。随后环顾四周，寻找个可以坐一会儿的地方，因为腰部剧烈地痠痛起来了，似乎伤口象扫雷器发现了地下看不到的地雷一样，嗅到了这个可怕的地方，因此苏醒过来了。

坐是没处可坐的。卡什塔诺夫背靠在一棵菩提树上，以便等待一会儿，克服腰间的痠痛，同时他感到十分疲乏。他感到浑身软弱无力，脚也站不直了。“说不定人家会当是醉汉呢！”他精神一振，竭力把身体站得直一些。

勃兰登堡门边的广场上，两个年轻的母亲无忧无虑地在交谈着，她们各自推着一辆孩儿车。一辆漆得光彩耀眼的汽车，轮胎发出沙沙声，飞驰而来。车门砰地一响，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走出了汽车。小伙子把照相机对准了勃兰登堡门，便咔嚓地揿响起来。

“留作纪念……”卡什塔诺夫忧郁不乐地在想，“可是我用不着照片……这些门本身就坐在我的背脊里。谁也不对你说什么……人家连知道都不知道……关他们什么事呢？……”

另一种疼痛跟腰间的疼痛汇合起来了——这种新的痛苦之感，是由于受不了人们这样冷漠地走过对卡什塔诺夫来说十分可怕的地方而产生的。好象他们以自己那种无所谓的态度无缘无故地欺负了一个老战士。虽然卡什塔诺夫下意识地知道，他的想法是不对的，他们哪里会知道他的疼痛呢，可是他心中还是产生了一种忿恨和对自己的怜悯，因为，不管你怎么说，这座门好象命运的某种象征，它在一个本来还有无限前程的青年面前突然砰地一声关上了，这些沉重的圆柱把他通往明天的道路给

堵死了。这些柱子倒自由自在地竖在那里，再有个一百年也不会有什么。可是那个人呢，过了四分之一世纪重又来到了这里，却已经成了完全另一个人了，各种伤痛和回忆使得他忍无可忍。

周围的一切，好象故意讥笑你似的，美丽如画：镀上了十月的金色的广场，好象一个劲地要冲向新铺平的柏油路的青铜马，还跟姑娘一样无忧无虑卖弄风情的推着孩童坐车的年轻母亲，带着照相机，对准了镜头，以便更好地、更清楚地把勃兰登堡门拍摄下来的小伙子。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多么宁静安逸的田园诗啊！好象另外那一切东西都跟旧柏林一起钻到地狱里去了；那住宅的废墟，卡什塔诺夫曾经跟其他战士一起，从这个住宅的地下室里挖出两个德国小姑娘，就象暖和鸡雏一样，在手掌里使她们苏醒了过来；在广场中间的装甲地堡，形状象是一个齐肩立在地下的大个子士兵的钢盔；蒸着热气腾腾黍米粥的行军灶，柏林人排着急切求食的长队，手里都拿着饭盒，向最善良的俄国小伙子——炊事员瓦夏伸过去，而这个瓦夏过了一分钟就倒在他们的手上，白色的炊事帽上现出一圈象石竹一样鲜红的血迹。

“对那些没有看到过这种事情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没有发生过的，”卡什塔诺夫怀着某种新的豁然开朗之感在想着。“我的一切东西都留在我的身上，正象那块炮弹碎片留在老菩提树上一样。你倒试试猜猜看，那碎片现在在什么地方，——另一块树皮长起来了，于是那些老伤被新枝遮没了。”

“应该到儿子那里去一趟”，他打定了主意，于是展开了写着谢尔盖地址的纸张。

卡什塔诺夫运气很好。他刚从火车上下来，便碰到了一辆到他儿子服役部队去的便车。

“我把您带到团指挥所去，到那里后您再自己去争取吧，”驾驶员说。

“没关系，孩子，我会争取到的，”卡什塔诺夫颇有信心地回答说：“大概，不会每天都有家长从俄国来探望的。”

可是一切事情都不象他想象的那样简单。团指挥所的一名中士把卡什塔诺夫的证件翻阅了好久，看看照片，又朝向值班室狭小的窗口探身进来的卡什塔诺夫投过怀疑的目光。

“您的儿子在哪个连里？”中士依然疑心地问道。

“可是我哪里知道呢？好象是在萨哈罗夫连里。你们这里有萨哈罗夫吗？”

“哼，我们这里有谁，这是我们的事情，”中士略微有点粗暴简单地回答说。可是他立即拨动电话号码，以机械的语调报告说：“大尉同志！这里有人要找列兵卡什塔诺夫。要求允许会见。”

他一声不响，两眼呆视地听着，等待着。随后他以同样的语调说道：

“是，大尉同志……”

他漫不经心地把电话筒掷到架上，傲慢地含糊不清地对卡什塔诺夫说道：

“他过五分钟左右就来。你们可以谈到十六点半……”

“到十六点半，应当理解为，就是到四点半，”谢苗·达尼洛维奇猜想，同时看了看表。听他支配的只有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为了使中士产生某种好感，产生哪怕是一点信任，卡什塔诺夫好象就便说起似地：

“我跟你们的首长，跟上校普罗霍洛夫……在战争的时候，我们同吃一只饭盒……当时我是中士，他是中尉……”

团指挥所的中士装作没有听到的样子，可是卡什塔诺夫注意到，他刚要埋头看记事本，听到这句话后，两眼忽然离开记事本，抬了起来，可以看出，他产生了某种兴趣。过了分把钟，他按捺不住地问话了，可是在他的声调里依然保持着一种官腔。

“这究竟是什么时候上校当过中尉？”

“甚至还当过普通的列兵呢，”卡什塔诺夫掩饰住笑意，转弯抹角地高声说着，同时不耐烦地朝团指挥所栅形大门瞟了一眼；他觉得从远处营房里奔出来的一个战士身形有点熟悉。

是的，这正是谢尔盖！他在一条撒满砂砾的小路上奔跑着，沉重的靴子发出橐橐的响声；军大衣的下摆拍打着小腿，好象在谢尔盖的脚下有一只被绊住了的鸟儿在拍打着翅膀。他气喘吁吁地冲到团指挥所，停下了脚步，他脸色绯红，不自然地张开了手，当着中士的面，不好意思拥抱父亲，好象迟疑了一会儿，忽然把发烫的面颊紧贴着父亲说道：

“你好，爸爸！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今天所经受的一切，包括在飞机上的，在翁捷尔——登——林登大街上的，在勃兰登堡门边的，好似都倾注在一只碗里，满得马上就要溢出来了。卡什塔诺夫把润湿的眼睛移开，自我克制地，止住了涌向喉头的要哭出来的感觉。他不知道该用什么来消除这种沉默的间歇，就匆忙地把一个纸包打了开来，好象他是专门为此而来的。

“喏，你吃吧，是母亲烤的……我们村里的大馅饼。是你欢喜吃的。”

同时，好象要取得中士支持似的，也把纸包向他递了过去：

“拿吧，小伙子……你也吃吧……我们的。”

“你们请到这个房间里去。请坐。干什么站着呢？”中士殷勤地打开了门说。

卡什塔诺夫以父亲的关切的目光注意到，这一年半来谢尔盖变得更出色了。在整个体形上显出了一个战士固有的匀称和结实。同时在行动上，这也是很明显的，流露出一种新的品质：处事的审慎态度和那年轻人对长者的彬彬有礼。谢尔盖在等待着，让父亲把话说完了。

“其余所有的事情都跟先前一样，”卡什塔诺夫一下子把村里的事都一一提到了，他总结地说：“母亲从早到晚，要不是在菜园里忙碌着，就是绕着锅台打转。至于我呢，你自己也晓得，为我那些嗡嗡叫的居民忙得简直不可开交。你姐姐呢，每个休息日都要回家探望，来的时候拎一只空包，可是出门的时候，两只手提包总是装得满满的……还有什么呢？好象就是这些了……”

卡什塔诺夫要谈的不是这件事，不是这件事。自从飞机的马达在起飞跑道上发出吼声时起，他整天所想的一切，这该怎么给儿子说呢？该怎样把谢尔盖搂紧到心口，让他感到心脏的跳动呢？

“得了，讲来讲去老是讲自己……你工作得怎么样？”卡什塔诺夫抱歉似地问道。

“正常！”谢尔盖精神饱满地回答说：“都照规定。”

“那末关于休假的事……准进城吗？”

“曾经集体参观过……你自己知道，集体参观。排着队去，排着队回来。不过反正总是有意思……”

忽然间，卡什塔诺夫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怎么呐，真的……我去向普罗霍洛夫请求，准许谢尔盖跟我去一两个钟头。让我们在一起谈个够！同时一定得带他到那个地方去跑一趟……”

“喂，谢尔盖，”卡什塔诺夫和蔼可亲地说道：“有个想法。或者去跟连长谈谈，或者我跟普罗霍洛夫本人去谈谈，让你跟我一起到城里去两个钟头。看行不行？”

“不一定能准，爸爸，”谢尔盖低下头去说道：“今天不是时候……”

“那末明天吧！”卡什塔诺夫坚持说：“让我们明天去。”

“明天更不用说了，”谢尔盖掩饰不住遗憾的心情说道。

“为什么？”

“有工作。你知道，爸爸，有工作……”

“我知道，我知道，”卡什塔诺夫勉强地同意说，“要知道这样的话……”

他还没有来得及说完，忽然听到中士的声音传进了虚掩的房门，随即他明白了，是有人在询问关于他们父子俩的事。

“他们在这里，上校同志，在接待室！”中士高声地在向某人报告着。

房门打开了，接着普罗霍洛夫大步走进了房间。即使他们再有一百年不会面，卡什塔诺夫也会立即认出他来的。岁月没有对这位过去的中尉发生影响。普罗霍洛夫仍象当年那样年轻力壮，只是脸变圆了，而头发不只是变成花白，而是完全白了，好象染过的一样。

他把军帽掷到小桌子上，两只手抓住了卡什塔诺夫的一只手说道：

“你生活得好啊，达尼雷奇！居然健在无恙？来，你转过身来看看，你这个人啊……而这个大概是儿子。您怎么的，好同志，不向我报告一声，你是从哪个家庭到我们部队来的？”

谢尔盖象弹簧似地跳了起来，在这种意料不到的情况下，他不知该如何是好。谢苗·达尼洛维奇看到普罗霍洛夫肩章上上

校衔的星星，也本能地挺直了身体，这是一个老兵的习惯。

“现在这么办吧，”普罗霍洛夫目不转睛地看着卡什塔诺夫说道，“我正好准备吃饭去。请同着儿子一起到我家去……”

“一下军舰就上舞会！”卡什塔诺夫接过话头说，“我们一道去吧，谢尔盖，怎么样？首长的命令，对被领导者来说就是法律！”

谢尔盖感到十分窘迫，他鼓足勇气，也不知是对父亲呢，还是对上校，说道：

“我不行……有要紧事情……”

“有要紧事情，这完全有可能，”普罗霍洛夫表示理解地同意说道，“至于你，达尼雷奇，我是不会放你走的。”他把军帽低低地拉到额上，随即挽起了卡什塔诺夫的臂膀。

“可以走了吗，上校同志？”谢尔盖作了个“立正”的动作，清清楚楚地报告说。

“可以，”普罗霍洛夫微笑着回答说：“为什么要这样正式呢？您应该向父亲问这个……指挥官多得很，可是父亲只有一个。”

父亲带着抱歉的神情站在那里，好象由于他使得会面突然中断了。

“没关系，谢廖尼，”他也不知是安慰自己呢，还是安慰儿子。“我们见面不会是最最后一次……你给小卡什塔诺夫一个进城的短期假好吗，上校同志？”他转过身来对普罗霍洛夫说道。

“这要看他以怎样的实际行动争取了！”后者一面回答，一面以指挥官的目光把谢尔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好吧，孩子，明天见……”卡什塔诺夫告别说，他因儿子拒绝到普罗霍洛夫家去吃顿饭毕竟感到难受。他心中对谢尔盖的倔强精神是感到欣慰的。要是换了别人，是不会放过在首长身边磨蹭这个机会的，可是这个……”

“你有一个好儿子，”普罗霍洛夫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坐在

汽车里了。

卡什塔诺夫不喜欢上校这套宽敞的、初看起来不适宜于居住的房间。是的，尽管房间里摆设着崭新的、还散发着油漆气味的家具，可是这套房间看起来确实空空荡荡，四壁引起很响的脚步的回声。

普罗霍洛夫的妻子玛丽娜不在家，他们在等她的同时，上校领着客人在房里一间间地走过去。

“你住得很宽敞，”卡什塔诺夫坦白地说道，“这无话可说。可是好象所有的东西在位置上都不固定。好象是在箱子上一样。”

“是啊，要知道，习惯是第二天性。主人的性格，据说可以传给东西，”普罗霍洛夫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好意思，他承认说：“我一辈子都是坐在箱子上的，今天在这里，明天又到那里。”

卡什塔诺夫毕竟怀有朴素的农家感情，眼见普罗霍洛夫这种对待东西和对待安定的舒适生活的蔑视态度，感到十分惊讶。“一辈子都象在行军途中一样，或者譬如说象露营一样，”他在反复思考着。“上校到底是上校。不过”，有一种内心的声音马上出现了：“要是没有残废，你也可能成为……喏，即使不成为上校，也能成为少校。普罗霍洛夫有什么呢，他难道头脑特别发达些吗？他也是跟你一样的一个人……就是说，还是为了那件倒霉事——你从头开始吧，在什么地方停下来的，就从什么地方开始。从勃兰登堡门旁那个地方开始。”

“你怎么啦，达尼雷奇，你情绪变坏了？”普罗霍洛夫注意地问道。

卡什塔诺夫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普罗霍洛夫的妻子气喘吁吁地来了。她把尼龙短大衣掷到挂钩上。

“您是卡什塔诺夫？我猜到了吧？您好啊！对不起，我迟到了！……普罗霍洛夫，为什么不摆桌子呢？”

“在我家里，她是司令，”普罗霍洛夫匆忙地解释说。

卡什塔诺夫坐在桌边，感到不很自然：上校的肩章毕竟使他感到十分窘迫。二十五年前，当他们在军医院救护车旁分手的时候，普罗霍洛夫还是个中尉，可以说，他离中士不是很远，可是现在……

“喂，在这里，他们怎么样？”客人突然毫无联系地动问主人，他说的“他们”，显然是指德国人，德国人的生活普罗霍洛夫应该是了解得很清楚的。他在驻德苏军部队中工作，大概不是头一年了，大概他每天都在和当地居民打交道。

“你是指德国人吧？”普罗霍洛夫为以防万一更明确地说：“他们生活得不错，很好，不比我们差。”

“您指的是什么？”玛丽娜插进来问道。

“生活情况我了解……”卡什塔诺夫回答说：“我常读报。关于思想意识怎么样？”

“什么思想意识？”普罗霍洛夫冷淡地回答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跟你说，这根本不是一九四五年我们进入的那个国家了。要知道，不仅一幢幢住宅是新的，人们成长起来了。在这些年里，整整一代人成长起来了。”

“新生的小树们……这当然是对的，”卡什塔诺夫沉思地说道：“可是那些老菩提树也还站立着。现在还在，是吗？”他重复了一遍，他那暗淡的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表情，对此普罗霍洛夫感到不快。“顺便说一说，”卡什塔诺夫好象在跟自己说话似地，他轻声地继续说道：“今天在街上我可能面对面地碰到当时把我打伤的德国鬼子。这不是很有可能吗，啊？”

卡什塔诺夫的暗淡的眼神凝视着一点，这个痛苦的疑问大

概久已使他不得安宁。

“一切都是可能的，世界上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普罗霍洛夫安慰性地议论说，“我不打算宣告这个德国人无罪，但是我们应当了解他。在把火箭筒塞到他手里之前，希特勒和戈培尔把他的脑袋弄得如此糊涂，使他甚至把父母亲都忘光了……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屈服于这一套的。可是那些人就被押进了刑讯室。希特勒成了个上帝，而那些宪兵盖世太保紧盯着每一个人的身影……”

“我要讲的正是那件事！”卡什塔诺夫活跃起来了。“可以理解，甚至可以原谅德国工人，人家把冲锋枪塞到他手里并对他说，‘去保卫祖国吧，俄国正向我们发动进攻！’可是当他向莫斯科进逼的时候，当他被赶回去的时候，要知道，他头脑里对好多东西都应当已经弄清真相了。你倒不妨给我解释一下看，为什么在战争结束前十五天（要知道，那些恶棍，他们那时已经明白反正是要完蛋了），为什么旧的给水塔上的那些机枪手还要打死我们半排人呢？他们不是可以打出白旗吗？我问你，他们可以吗？”

普罗霍洛夫自己对这个问题也思考过不止一次了。当然，他们可以。整个柏林在被攻克时曾经挂满了白被单。而他们碰到的大概是最顽固的家伙，这些人已经失去未来，因此他们对德国的未来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这里现在已是另一种人了，真的，”普罗霍洛夫说着，显然是想转换个话题。应该给卡什塔诺夫引用一些什么论据呢？当然，如果凭借理智，他自己也能理解一切，可是，有一种委屈显然深印在他的心灵上。而这不是他的过错。残废人总是觉得，阴暗的日子要比晴朗的日子多。

“我明白，”卡什塔诺夫叹了口气说。“我和你两个人用不着互相作报告。只不过你现在给我解释一下，上校：要是现在遇到

那个从给水塔上，差一点没有把你逼进棺材的人，你会怎么开始跟他交谈呢？”

“这要看他是什么人啦……”普罗霍洛夫不知马上该怎么回答，因为问题太出乎意料了，“要是他过去是个党卫军分子，这是一回事，要是个工人……”

“你话不要说得含含糊糊的，”卡什塔诺夫冷笑着说。

普罗霍洛夫又一次注意到，在朋友一只白蒙蒙的眼睛里闪过一种愤恨的表情，这种表情与善良的卡什塔诺夫的脸是如此的不相称。

“二十五年前，”卡什塔诺夫每吐一个字之后都坚决激烈地夹紧了嘴唇，“甚至二十五年前，如果我从军医院出来的路上遇到射伤我的那个人，我简直就会把他掐死……”

“那末现在怎样呢？”普罗霍洛夫问道，“你看，不是说了吗：照辩证法，事过境迁……现在你会伸出手去了……”

“我不知道，”卡什塔诺夫打断话头，他全部表情让人感到，他不愿就这个话题再继续交谈下去了。

“你们辩论会搞得也够了！”玛丽娜央求地说道，同时从墙上取下了吉他，是一把古老的吉他，弦板上装饰着贝壳珍珠层做成的小套圈。“普罗霍洛夫，你来一只自己欢喜的歌曲吧，”她吩咐着，一面拨动了琴弦。

普罗霍洛夫欢喜的一支新歌，是一支歌唱无名高地的歌曲，这支歌也是卡什塔诺夫所欢喜的。

在一个陌生的村庄旁，

在一块无名高地上……

紧跟着吉他的伴奏，上校哼唱了起来。这使卡什塔诺夫想起了，当年普罗霍洛夫以雄赳赳的男中音常唱的一支心爱的歌曲：歌唱一个小伙子，歌唱一个姑娘送他上阵的情景，歌唱整个

战争年代她那小窗户中透出的长明的灯火。而现在时兴的却是另一些歌曲……不过唱的依旧是那同样的事情。

“我的外出假就要满了，”卡什塔诺夫忽然想起地说道。

“别忙，”普罗霍洛夫安慰地说：“我用汽车送你到车站。”

谢苗·达尼洛维奇回到旅馆，已经迟到了很久。他小心翼翼地跨着脚步，免得吵醒同房间的人，他走到了自己的床前。可是那个同房间的人还没有睡着，他并无恶意地说道：

“我们这种人只要一有机会，就……”

卡什塔诺夫没有作答。

他站在窗边，看着夜晚华灯照耀的城市的轮廓。这已经是一个新的柏林了，虽然还是不理解的，但已经不象从前那样陌生了。这个对卡什塔诺夫来说是陌生的世界，他的儿子已经住惯了。也正因如此，那种不舒服的感觉都消失了。“明天我同谢廖恩卡一道去散散步。他们应该准他……普罗霍洛夫不是个冷酷无情的人……”

卡什塔诺夫不知道，就在半个钟头之前，一阵警报把谢尔盖叫起了床。

第二章

“你能不能想象一下？我们正在进攻。右邻是德国人。左邻是保加利亚人。我问指挥员：‘乌拉’这个词，保加利亚语和德语是怎么讲的？他说：‘乌拉’，它就是‘乌拉’，主要是要喊得响亮一点，那么大家就都会懂得的。”

（摘自战士抽烟休息时候的交谈）

谢尔盖·卡什塔诺夫从来还没有象在这震耳欲聋的、有如爆炸的日子里，这样深切地感到自己是一名战士。从外表看，一切都跟平时的作业相象，而且从装甲运兵车里也看不到很多东西。一切都是平常的。正如萨什卡·土林通常所说的：一听到口令——就把自己二十岁的身体从装甲运兵车上掷下来，跑过去，躺倒下来啃野草。连里这个爱说笑话的人把摩托化步兵在进攻时的战斗行动归纳进这样一个开玩笑的公式里，也有某种正确的地方。不管机枪怎样达达地响，不管炸药包怎样砰然轰鸣，大家都知道，这不过是战斗作业。在这种战斗中，谁也不会被打死，甚至不会被碰伤。“敌人”这个词本身显得如此平淡无奇，以致于是写在引号中的，这就是说，讲到“敌人”是不当真的，而是象征性的。

可是如今萨什卡坐在装甲运兵车里，背向着谢尔盖，坐在他的前面，一声不响，好象一尊雕像一样。他身上那根十分淘气的心弦，往常总会引起全班的共鸣，可如今不知为什么冻僵了似的。该用什么东西来把这根心弦拨动一下呢。

“萨沙，萨什，”谢尔盖轻轻地叫了一声，用手指在朋友的钢盔上弹了一下问道：“大概我们要高喊‘乌拉’了吧？”

犹豫不决的笑意在战士们的脸上掠过，但一看到中士维亚佐夫，笑意就消失了。玩笑没有开成功，尽管“我们要高叫‘乌拉’了吧”这句意义深长的话过去每次都引起哈哈大笑，并且使中士感到不快。战士们至今也还无法忘记，在那一年前战术训练时发生的一件开心的奇事。

“我们现在要练三门基本功，”中士象上级发布命令似地说道：“进攻敌人防线的前沿，在行动的过程中开火和高叫‘乌拉’。明白了吗？”

这一切大家都很清楚，可是萨什卡和往常一样弄不明白。

“中士同志，”他以抱歉的语调问道：“请您解释一下，要练就高叫‘乌拉’的本事，该采取什么方法？”

“不是用什么方法，而是用嗓子，”中士没有理睬萨什卡的讽刺，同时纠正他说。

训练照常在进行着。全班散开成链形，接着便冲锋起来。一听到“用手榴弹——开火！”的口令，大家便一齐把铁块向胶合板建筑物模型的窗口掷去。随后全班便该高喊着‘乌拉’向屋里冲去，并用刺刀和枪托消灭敌人。

“乌——拉！”中士以宏亮的声音喊着。

士兵们牛头不对马嘴地、精神不振地应声叫了起来。

“停下来！”中士皱着眉头说道，“我们重新练叫‘乌拉’……”

手榴弹又一次向窗户飞去。现在“乌拉”声喊得比较融洽整齐一点了，但依旧显得软弱无力。中士多疑地朝萨什卡瞟了一眼。

“列兵土林，您为什么不叫？”

“嗓子不好，中士同志，”萨什卡以因感冒而刺耳的沙哑声说道。

“唔，我来叫给您听，”中士怒气冲冲地威胁说，“您要用练习叫‘乌拉’来代替夜里的睡觉……”

“是，中士同志！”萨什卡举手敬礼说道，“我夜里一定高叫‘乌拉’，叫个‘优秀’！”

中士维亚佐夫总的说来是个和顺的小伙子，因此对萨什卡这种无礼貌的答话也就原谅过去了。可是这个“应当高声地叫‘乌拉’”，就象扣带扣住军大衣一样，从此紧扣住了连里这个爱说俏皮话的人。萨什卡并没有生气，他以惯于幽默的人所应有的微笑，回答人们对他的揶揄。可是他的微笑是能使人解除武装的。萨什卡即使在一本正经的时候，他身上也总有什么东西

在笑着——或者是弯成小钩的淡白的眉毛，或者是翘在头顶上的不符合任何发式的麦秆色的额发，或者是眼睛……在萨什卡浅灰色的眼睛里，甚至在沉思的灰烬下面也隐藏着火星，准备复燃起欢乐跳跃的火花。甚至黑色的瞳孔，也有如那小小的雷达一样，在搜寻着可以用来开玩笑的任何理由。

可是今天萨什卡好象变了样。

“萨什，哟，萨什，是因为关于‘乌拉’的问题吗？”谢尔盖企图使朋友精神振奋起来，又一次敲了敲他的钢盔，好象人家敲门一样。

钢盔一百八十度地转了过来，用白铁的，而不是萨什卡的声音这样说道：

“老东西，别敲了。这又不是一只锅子……”

谢尔盖由于不好意思而不安心起来了。所有其他的人也都为他感到不好意思。何苦要用这个早已不新鲜的笑话去缠住人家呢？这种玩笑开得不是时候，情绪也不对头。

不过，大伙们的情绪也绝对不是抑郁的。情绪是高涨的，但不是那种一般的开心情绪，如此而已。不，战士们是处在统帅们称之为有高度士气的状态之中。天空里马上就将燃起那号召投入战斗的火箭绿色的星火。

在那铺满湿漉漉的树叶，好似覆盖了巨大的伪装衣的秋天大地上，战争已经接连进行好几天了。当然，这是演习性的战争。这场战争称为“瓦芬勃鲁杰尔沙弗特”演习，把这话从德语翻译过来，就叫做“战斗的兄弟友谊”。

在威严的命令支配下，华沙条约各兄弟国家的部队进行了防御战、进攻战、遭遇战，顽强地向胜利挺进。保加利亚人、匈牙

利人、德国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俄国人和捷克人，他们以钢铁的侧翼彼此相接，并肩战斗。他们在一起都叫做“红军”。在司令部的军用地图上，一个个红色的箭头跟蓝色的箭头，针锋相对地碰在一起。

谁也没有看见过这些蓝色的部队。大家都意识到，这是假想的敌人，来自蓝色部队一方的炮弹和地雷的爆炸，机枪和冲锋枪猛烈的火光，所有这些不过是焰火制造家们的艺术创作而已。可是这些一九五一年出生的士兵，他们投入战斗，精神是如此激动振奋，好象在他们面前有真正现实的敌人，用望远镜和肉眼看得见的敌人在凶狠发狂。那些将军们掩饰不住欣喜的心情，不住地摇摆着满布苍苍白发的头颅，而那些翻译官则有礼貌地退到一边，因为在进攻炽烈的时分，他们是派不上用处的。

“战斗的兄弟友谊”演习是在德国领土上进行的，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面目一新的国土上进行的。在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在那次极其可怕的战争的火药烟雾早已消散的演习场上空，重新响起了战斗演习的枪声，这一事实就赋予这些演习以特殊的意义。是的，曾经在这里消灭了法西斯。可是即使到今天，远方的风间或也还吹来凝固汽油的味道。那就是说，敌人决不是那么“抽象”。那就是说，你写敌人这个词，是不能用引号的。敌人的名字和部署，是不放在保险箱和秘密文件夹里的。他的面目几乎每天都从报上国际生活栏里凶恶残暴地在窥探着。要不然，那又为什么七国的军队，千百个战士劳动的双手要举起那巨大沉重的盾牌呢。盾牌上有着万能的护身符，即那七面旗子的拼图。这面盾牌的极微小的一部分，就是谢尔盖·卡什塔诺夫和亚历山大·土林现在坐在里面等待冲锋的装甲运兵车。

至少谢尔盖是这样来理解他们这个班，他们这辆装甲运兵车参加部队演习的意义的。在这次演习中，不是个别国家的士

兵，而是社会主义的士兵在学习如何去夺取胜利。

归根到底，一个班是什么东西呢？是八个人，就算是九个人吧。分配给它的战线大约是七十公尺多一点。每一个战士大约分到八公尺，不会再多了。右边四公尺，左边四公尺。在军队的范围内说来，只不过是蚂蚁般的一点距离。可是这种蚂蚁般的距离可以连结成几公里，以至几百公里。在司令部里，不管你怎样制订战斗的规模，在各国军队的翼侧交界处，还是由两个士兵的战斗团结加以结合起来的。比如说，俄国人和德国人，匈牙利人和保加利亚人，捷克人和波兰人。不管装甲运兵车开得多么飞快，不管飞机在高空如何隆隆鸣响，不管坦克如何坚实而无法打穿，一个战士总得走到大地上，甚至走到被炸光了的、薰染了辐射能的大地上去。他的心不是装甲钢板制成的。不管武器变成什么样——从古代的投石器到弹道火箭——战争毕竟是靠平凡的战士的脚步进行的。因此前线的展开，不是一个军连着一个军，甚至不是一个连连着一个连，不是一个排连着一个排，而是一个战士连着一个战士。间隔六到八公尺，每一个战士左右各四公尺。

这一不难的算术，谢尔盖·卡什塔诺夫是比较早地掌握了，而其严峻的真理，他只是在这些日子里才意识到。要是父亲看到该多好……

那一天，当他们在团指挥所会面的时候，谢尔盖有生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假如说不是欺骗了父亲，那无论如何也是对父亲隐瞒了真情。他自己知道，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警报”这个具有无限权威的字眼将会破坏战士平常生活协调的节奏，他知道这一点，但是不露声色。服役就要象个服役，因此即使对亲生的父

亲也不应当把一切都和盘托出来。因为自从你宣誓那天起，你已经不仅是他的儿子，同时是祖国的儿子了，这不是空口说大话。

如今谢尔盖渴望父亲能够看到他，在人世间没有比这更大的希望了。他坐在装甲运兵车里，头上戴着钢盔，手里端着冲锋枪。哪怕让父亲到这里来一会儿也好，哪怕允许他看一眼也好。谢尔盖就会亲自向他介绍情况。“你看，爸爸，”他就会这么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强渡过这条河，并为主力部队准备好立足点。左邻是保加利亚人，右邻是德国人。”“你怎么啦，谢廖尼，你说错了吧？”父亲或许会再问一遍：“什么德国人？”对他来说是怪事，他跟德国人作过战，可是我们跟他们并排着进攻。“一些平凡的，今天的德国人，”谢尔盖会这样说，“他们和我们一样，他们中间有些小伙子，我认识已有一年半了：库尔特、丘恩捷尔、乌利里赫特……在那小松林里，你看，树枝微微一抖，那边是波兰的坦克手。他们中间有个阿达姆·列姆巴契，这个小伙子，我是昨天跟他认识的。有一段有意思的历史。爸爸，你总该记得，五年级的时候，我是怎样跟波兰的一个小男孩开始通信的吧。不，不是跟阿达姆。那个人叫叶日。为什么要通信呢？是为了……”

谢尔盖想起了六年前开始，而到昨天结束的这段历史，不禁笑了起来。确切一点说，这段历史并没有结束，正如萨什卡所说的，“第一部结束了，第二部开始了”。

六年前，如今觉得这是多么遥远的过去，好象已经过了一千年了，六年前，村子里来了一个赤着脚，穿着短裤衩的莫斯科人，名叫根卡·拉祖莫夫。他是到姨妈家来度夏的。男孩子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是个脆弱而傲慢的人。要是根卡不是个难以置信的宝物的持有者，一本外国邮票集的持有者，也许对他是不值得予以注意的。老实说，谢尔盖对邮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

使他感到大吃一惊的是另外一件事。原来，根卡在跟好几个国家的男孩子们通信。“你就这样直接写去，他们直接回信吗？”谢尔盖非常惊奇地问道。“嗯。”根卡好象不容分说地简短地作了回答。很显然，由于这个男孩对他的崇敬态度，使他发起善心来了，他把一本小记事簿递给窘住了的谢尔盖， he说道：“你想跟华沙通讯吗？这就是地址。”

叶日·佩季沙克！这是谢尔盖的不认识的“通讯员”的名字和姓，根卡把这种人叫做“通讯员”。叶日……纯粹是一只小刺猬^①。在这个名字里，听起来还有点姑娘家的意味。大概正因为这个，谢尔盖写第一封信时感到特别困难，不知道该从哪里写起。其次，尽管波兰人是朋友，但他还是不愿使自己从初次结交时起，就显得是个又笨又马虎的人。谢尔盖十分清楚地懂得，他寄信去，这不仅是以他自己个人的名义，而且好象是代表了整个苏联。“谢廖尼，你不必故作聪明，”当母亲看到儿子已经撕掉了一大堆信纸，都是刚开了个头便撕掉了，就同情地说道：“你可以讲讲学校的情况，讲讲我们集体农庄的情况。谢天谢地，值得夸耀的东西有的是。”

谈学校的情况嘛，当然可以。学生的学习成绩是区里第一。可是，要知道，在这方面的功绩并不属于谢尔盖。一学季接一学季，他总是挂着两个三分。其次，如果他是个什么冠军倒也罢了。哪怕是个班级的冠军吧，哪怕只是在跳棋方面。可是他既没有任何功绩，也不是任何冠军。没有什么好写的……

讲讲集体农庄的情况吗？可是讲集体农庄的什么事呢？……讲牛棚和养蜂场的事吗？这不妥当。

谢尔盖看着那黑黝黝的窗户，听着排水管里雨水的响声，同时在等待着父亲。他或许会来帮个忙的。可是父亲老是不见来。

① 波兰人的名字叶日(ЕЖИ)在俄语中与小刺猬(ЁЖИК)声音相近。

于是他打定了主意：不好讲讲他的事情吗，讲讲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的情况吗？他不是潇洒地斜戴着船形帽，从墙上的照片上在看着吗？父亲现在是个养蜂人，这并不重要，要紧的是他有光荣勋章……

早班火车把信带到了华沙。过了十天左右邮递员交给谢尔盖一封信，上面贴着五彩缤纷的外国邮票，完全同根卡的邮票一样，也许甚至比根卡的还要鲜艳。

谢尔盖迫不及待地撕开信封，全神贯注地看着斜写的印刷体字母的信，——叶日写俄文字就象我们的一年级学生写的。但是谢尔盖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他是用拉丁文写的。起初，这惹得谢尔盖发笑，可是当他仔细看了以后，似乎觉得甚至是很庄重的了。于是谢尔盖想道，在这样的衬托下，他的名字具有某些国际性的色彩了。

信写得很短，大概，要再讲多一点，叶日掌握的俄语词汇还不够。他告诉谢尔盖说，他立即在地图上找到了奥卡河，还有流过华沙的维斯瓦河也是一条十分美丽的河。谢尔盖根据明信片可以确信这一点。真的，在信封里有几张印有华沙新貌和旧景的明信片，在天蓝色河流的岸边，有一些华丽的尖顶小房子，这是十八世纪的建筑。而今天的华沙，就象在莫斯科，有着宽阔的大街和高楼大厦。

父亲从养蜂场回来，看到了信就赞叹道：“好家伙，你呀，谢连卡^①，简直是我们的外交部长了。你瞧，华沙写信到我们乡下来了！”母亲开始双手擦着围裙，后来就着手看明信片。父亲看着那张印着新建筑外貌的明信片，他高兴得象是收到了从亲人们那儿来的照相图片：“看，造了多少房子呀！过去这没有的……这也没有的……”

① 谢连卡和谢廖尼都是谢尔盖的爱称。

谢尔盖倒是没有想象到，父亲会这样受感动——整个晚上讲着华沙，但不是讲明信片上的那个华沙，而是讲他保存着的旧的、褪了色的照片上的华沙。在一幢房子的废墟旁，两个战士站着拥抱，甚至自动步枪的皮带也连在一起。左边是一个翘鼻子的士兵、戴着威风地歪在一边的钢盔，这是谢尔盖的父亲。右面……“右面戴着制帽的是波兰若尔涅什，”父亲解释道。“你说，他叫什么？”谢尔盖问道。“他叫斯捷凡，而若尔涅什是波兰语，意思是士兵。我们和若尔涅什们后来一直打到柏林。我再也没有碰到斯捷凡，听说他受了重伤，也许已经牺牲了……”

谢尔盖尊敬地看着微笑着的若尔涅什，若尔涅什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搭在父亲的肩膀上。当照相机咔嚓一声拍的时候，有人在这时讲了什么高兴的话。

父亲打开留声机，几次连续放“在梦境般的维斯瓦河后面的田野里，来自小勃隆纳亚河的谢辽什卡和来自莫霍瓦亚河的维坚卡躺在潮湿的泥土里……”这张唱片。

而谢尔盖看着信，看着有华沙风光的明信片和战时父亲的照片，他尽管还有不少东西不明白，却模糊地感到了伊凡诺沃村和华沙之间的看不见的联系。遥远的、不认识的叶日好象不久以前就住在邻近的街上，就好比在一个学校里一起学习的孩子，后来分手了。

在复信中，谢尔盖讲到了父亲和若尔涅什合摄留念的照片，叶日一定会惊奇！

然而叶日并没有惊奇，原来，在他们学校里收集了整整一本可以看到波兰士兵和苏联士兵在一起的照片集，而叶日的父亲参加过波兰人反对入侵者的起义，并且也不排除在解放的日子里，他曾经在华沙的一条街上遇见过谢尔盖父亲的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

“爸爸，”谢尔盖满怀希望地问父亲。“你们不是可能碰到过吗？”“为什么不能呢，”父亲确信地说，“甚至是十分可能。”

从这一时刻起，即使谢尔盖还有什么怀疑，他已统统把它丢开了。不是“可能”，而是已经遇见过。这是无疑的！

也许，是他们杜撰的故事完全使他们交上了朋友。这个故事说，有两个无畏的战士去战斗，无论是子弹还是刺刀都不能伤害他们。正是他们，一个俄罗斯人，一个波兰人，谢尔盖的父亲和叶日的父亲，没有让敌人把华沙从地球上抹去。

不相信这样的故事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真实的。任何一本教科书都能证实这一点。

谢尔盖把有波兰邮票的信封大方地给了根卡，使后者高兴非凡。但是，每一次根卡总是责备他说：“嗯，谁这样对待信封的？毛手毛脚把它撕坏了。你仔细一点，用剪刀沿着边剪。要知道这是集邮材料！”

对于这一点谢尔盖能说什么呢？

叶日寄来一张照片。在林中空地上、篝火旁，一个挨一个地成半圆形地坐着波兰哈尔采尔——也就是少先队员。脸拍得不很清晰，以致谢尔盖好久看着模糊不清的人形。“在树旁边戴着圆形礼帽的男孩子，就是我。”叶日写道。真是荒谬！他简直象个女孩子——清秀、留着卷曲的头发。

一个月过去了，二个月、三个月过去了……邮递员送来的不是信，而是贴着邮票的包裹。谢尔盖急忙解开绳子，打开一层又一层包皮——七件小衣服，都没有钮子：包裹变得越来越小了，里面会是什么东西？

谢尔盖解开已经是非常轻的小包了，一块鲜红的绸突然在他手指中间凉飕飕地滑过。少先队红领巾！夹着白条纹的红领巾。一张字条飞到地板上：

“亲爱的谢尔盖！给你寄上一条波兰哈尔采尔的红领巾，是我自己戴的。如果你把你自己的也寄给我，我将非常高兴。等我们长大了，我们会见面的。将来无论我们到哪里，无论干什么，让少先队红领巾在相会时，成为我们友谊的暗号。

你的朋友叶日”

“爸爸！妈妈！你们看，波兰红领巾！”谢尔盖由于高兴而情不自禁地喊道。

母亲惊奇得两只手一举一拍，而父亲拿着红领巾，不知为什么嗓子立刻变了：“完全象波兰国旗……”

次日早晨，谢尔盖把自己的包裹寄往华沙。

这一切发生在五年级——似乎过了好久好久了！而要是按照日历算一下，那么一共只不过是六年。现在谢尔盖已经一年多不知道叶日在哪儿，干什么和怎么样。嗨，这孩子的轻率啊！开始没有立刻写回信，考试忙得筋疲力尽，后来写信到华沙，叶日没有回复，也许是他也碰到了要紧事情。而这时军事委员部发来了通知单——“再见吧，军号响了，士兵们要上征途了。”就象在童话里那样：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橱里最隐秘处，和父亲的勋章一起放着一个玻璃纸的纸包，里面包着童年时鲜红的暗号——叶日的少先队红领巾。那时把一切看得多么简单：“我们会见面的！”

谢尔盖忧伤地笑着这个可爱的、但是天真的，就象童年本身似的幻想。要是不当兵的话，实现这个幻想的可能性要现实得多。现在持旅行证跑的人多得很！有时到波兰或保加利亚去，比到诺夫戈罗德或苏兹达尔去要容易。可那是对非军人而言，而谢尔盖是士兵。

不错，他所在的地方到华沙比任何时候更近了，但是大家知道，军队里是不发给到华沙去的休假证的，谢尔盖已经不指望

遇见叶日了，只得相信机会了。谁知道这个机会来到的时候比谢尔盖摘去肩章坐到莫斯科——华沙的列车里去要早得多。当得知就要举行的“战斗的兄弟友谊”演习时，列兵卡什塔诺夫给连长萨哈罗夫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突然：“大尉同志，波兰人将参加吗？”“要参加的……”连长回答说。

谢尔盖眉开眼笑。当然，高兴得还早，但是有什么不可能呢？

奥卡河和维斯瓦河的缓慢而明亮的河水，从并不怎么遥远的童年——一共只过了六年时间——流到了兵营的门槛前。

当谢尔盖要母亲立即给他寄去叶日的红领巾时，大概使她十分惊奇！

而谢尔盖的推论完全是符合逻辑的。他和叶日是同岁，从一切方面来说，这个华沙人也应当在军队里服务。根据概率论，对他们的相遇，百分之一的可能性是有的。哪里会只是百分之一，——当他知道离他们摩托化步兵分队一公里处驻扎着波兰军队时，在谢尔盖方面突然有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性。“到波兰人那儿去作客！”萨哈罗夫大尉宣布说。而这在谢尔盖听来，仿佛是“到叶日那儿去作客！”

谢尔盖在皮鞋上擦了半盒鞋油，钮扣洗刷得耀人眼目。

“白费力气，”萨什卡挖苦说。“不会有姑娘的。”

“我这是要显示出我和你不是一路货。”谢尔盖用一句笑话应付过去。

心里突然感到一阵激动。笼罩着波兰人的兵营的一片寂静中，仿佛响起少先队的号角声。一面苏联旗和一面波兰旗象两块大的红领巾在入口处的旗杆上飘扬。

就是没有翻译，大家也都懂得挂在树与树中间的标语：“苏联和波兰军队之间的兄弟友谊万岁！”

“你们好，欢迎。”一个面貌显得年轻，但两鬓已经斑白的波兰军官以地道的俄语含笑对他们说道。

“大概，在我们那儿学习过的，”萨什卡碰碰谢尔盖的臂膀。“我看到过，佩着绶带，象莱蒙托夫一样。”

看着团团围着他们的波兰坦克手们，谢尔盖泄气了：要认出叶日来是过于轻率的愿望。在他面前站着的是体格匀称、宽肩膀、相貌惊人地相似的士兵们。而其中的任何一个同哈尔采尔叶日的相象程度，都不会比有巨大树冠的高大的古铜色的松树与低矮的长着一绺绿色头发、幼儿园年龄的小松树的相象程度更大。

可是他还是可能在这里，在旁边，这个叶日……谢尔盖觉得肩膀后面有谁的呼吸。他转过身去，回答他的是微笑着的，但是陌生的眼光。

军官领客人们到他们叫做历史厅的房间里去，这就象我们的列宁室。

早已遗忘了的，但是又如此亲切和亲近的东西从陈列柜里望着谢尔盖。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好比在眼前出现了一本旧的上学时的练习簿那样……

瞧他，一个波兰若尔涅什同苏联士兵拥抱，几乎就象是父亲战时的照片一样。他漂亮地叉着腰，笑着，而一小时以前还在枪林弹雨里弯着身子，也许，一小时以后他又稍稍弯得太迟了。

而这一个，站在断墙残壁旁的，是一个起义者。会不会是叶日的父亲呢？山和山不会相会……要知道这不是几个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而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

白发苍苍的、令人喜爱的波兰军官这样流利地用俄语作解说，他不是根据词典，而是在休息时同苏联士兵交谈中学会我们的语言的。波兰军队的道路是在梁赞附近开始的。战斗道路的

每一个阶段都是用金字写在红纸上。军官正确地从波兰文翻译道：

“一九四三年五月六日……国防委员会决定……建立塔杰乌什·科斯丘什柯第一波兰步兵……师。七月十五日……在梁赞近郊……全师宣誓……我宣誓……维护……忠于对苏联的联盟，是苏联给了我手里的……武器来同我们共同的敌人作斗争……”

马上打听一下，还是等一下？

谢尔盖一会儿看着陈列柜，一会儿瞧着士兵，因而总是转动着头。

军官指着两张照片说：“这是我们的你们国家的英雄。”

苏联英雄（死后荣获的），波兰人维索茨基和科希旺。他们是在奥尔沙区列宁诺近郊的战斗中牺牲的。这是科斯丘什柯师的第一次考验。那时，波兰还在法西斯的铁蹄下，在华沙某地的地下室里，叶日的父亲在擦拭缴获的自动步枪，以便去帮助解放者。

“而到柏林……”谢尔盖忽然问道：“科斯丘什柯战士打到柏林吗？我父亲曾经和波兰人在一起……”

军官明白了，点点头：“帮助俄国人拿下了柏林，完全有可能同您父亲认识的……”他不知为什么象对自己人似地看了一下谢尔盖，谢尔盖于是突然肯定，这个文雅的波兰人毕竟是上了年纪了，也许甚至比父亲还老。

军官走近陈列台，寻找着什么。

“瞧！”他自豪地说道，好象展示某个独一无二的东西。“最有象征意义的照片。波兰士兵们在苏联坦克的装甲板上，沿着沙尔洛登大道进入柏林……”

瞧那个不戴钢盔的多么象父亲的朋友啊！

于是谢尔盖马上感觉到他们在兵营里走的时候那种时刻妨

碍着他的拘束，从他身上减少了。在他周围，可以说，都是他父亲的结义兄弟，而他……他看到佩带缝带的军官以后，却羞怯起来了。可为什么不马上问一下，就说，叶日是否在你们这儿服役，他姓什么呢？佩季……佩季玛克，佩季舍克？

“嗨，不必顾虑啦！‘请告诉我，同志……’”谢尔盖突然害怕了，马上闭住嘴：他不知道波兰军官的称呼！“请告诉我，同志，”谢尔盖停了一停，以此表示句号：要知道“同志”可以认为是国际称呼。“叶日是不是在你们这儿服役？……他是华沙人……不记得他的姓了……”

“有谁从华沙来的吗？”军官对着周围站着的十五六个波兰人问道。

“有！有！有！”三个人举起了手，并且期待地盯着谢尔盖。

“有叶日吗？叶日举起手来！”军官装作用严厉的声音命令道。

又举起几只手。

“好，”军官笑起来了。“我们可以举行检阅，检阅从华沙来的叶日。”

不，在这些士兵中没有谢尔盖的朋友，甚至无论在他们中的哪一个，一点都无法揣测出那个站在树旁、戴着圆顶礼帽的孩子的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特征。谢尔盖不知所措：真是愚蠢的处境！萨什卡也在旁边低声嘶哑地埋怨，踏着他的一只脚：“你怎么，发疯了？”但是退缩已经晚了。谢尔盖解开军便服上的小口袋，脸一直红到耳朵。他取出一包东西，打开来。

“哈尔采尔的领巾？”军官惊讶地说。

“是的，是你们少先队的领巾。”谢尔盖毫无必要地证实说。“我和叶日讲妥了……他也有领巾……我们的，苏联的……”

谢尔盖不连贯地，挑字拣句地叙述他是怎样同叶日认识的；

怎样互相通信；怎样交换红领巾和讲好见面的。他忘记了大家都是能听得懂他的。

军官的眼睛没有离开他，直接瞧着他的嘴巴并且马上翻译给听众听。波兰士兵听了每一句话都理解地点点头，带着这样的柔情望着红领巾，好象它是属于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的。

“暗号，懂吗，暗号！”谢尔盖一口气说出来，以毫无希望的眼神扫视若尔涅什们。“波兰语暗号怎么说？”

军官又用自己的语言讲了些什么，于是有一个留着小胡子，黑眼睛，象个茨冈人的若尔涅什大步走到谢尔盖那里，拍拍他的肩膀：“一会儿！一会儿！”然后从帐篷里跑了出去。

“请稍等一会。”军官要求说。

真的，那个黑头发黑皮肤留小胡子的士兵很快冲进了帐篷。

“普罗舍巴纳！”他说着，在发了呆的谢尔盖面前打开一条少先队红领巾，我们的红领巾。

军官同那个士兵讲了几句话，随即解释道：“在他们学校里，半个班级都有苏联少先队红领巾，也是交换做纪念的。”

“纪念，纪念！”波兰士兵眉开眼笑，摇动着头说。接着把红领巾紧按在胸前，自我介绍道：“阿达姆·列姆巴契。”

这里萨什卡一声不吭，只是两手一摊，就象《钦差大臣》里的市长。

从那时起阿达姆没有离开谢尔盖一步，在波兰士兵食堂里在一起，看电影也在一起，阿达姆象招待贵宾似地，请谢尔盖坐在第一张凳子上。

要是父亲看到该多好！

休息以后，阿达姆以老相识的权利把谢尔盖领到自己的坦克那里。他老练地用手掌拍拍装甲板、履带节，仿佛要使人确信，自己的战车是有力量的和坚固的。“巧尔克，巧尔克……”他走

到驾驶舱那里，微笑起来，立刻就变成孩子了。他两手动着、做着制动杆的样子：“弗尔 弗尔—蒂—蒂—蒂。”谢尔盖已经知道了，阿达姆·列姆巴契是机械师—驾驶员。坦克真好！炮塔上写着白色的号码“1235”。

分别时大家不慌不忙地抽着烟。在暮色里，在香烟的闪光中，阿达姆的眼睛就象煤炭一样黑。“叶日大概也是这样，”谢尔盖想道。“在什么地方碰上我们的人，他找我，可是找到了别人。真是奇怪的事情！”

萨哈罗夫连的士兵们在熄灯号以前回到了驻地。在他们准备睡觉的时候，萨什卡嘲弄地说道：“可你，卡什塔诺夫，原来是个浪漫主义者。红领巾，花结……”

“各人有各人的东西。”谢尔盖回答说，他一下子找不到适当的词。对萨什卡他并不生气。

可是毕竟正是为了昨天的事，为了红领巾和花结，他今天向他提起了关于“乌拉”的事并且敲了他的钢盔。

“加强观察！”维亚佐夫的声音传到了谢尔盖那里，他从回忆中清醒过来。

无论我们怎样等待着战斗，它总是出人意料地开始的。突然猛袭早晨还沉睡着的土地的惊雷，是无法预报的。

萨哈罗夫大尉的摩托化步兵连同别的单位肩并肩地集中在山岗上的小松林里。下面，缓缓流动的河水，象一面镜子反照着几乎是列维坦式的景色^①。几棵孤独的、过早黄了叶的柳树倒影在水里，浸湿了自己的辫子，仿佛这些树是从云端里长出来的。周围是这样的静，听得到芦苇里鸭子的叫声。

但是对军人来说，这不是一条河，而是水障碍，只有通过战

① 列维坦是俄国的著名风景画家。

斗才能渡过它。

谢尔盖和萨什卡同时看见的绿色火箭，冷淡地划出了寂静和轰隆声之间的界线。它还没有来得及着地，还在冒着烟，开始熄灭，与此同时，在左面，象是被火箭点燃似的，从松林里亮起了强烈的火光，以如此巨大的力量震动了空气，以致装甲运兵车也在轮子上颤动、颠簸起来。有一种东西吼了一下，尖叫起来。空气又被撕裂了，好象它并不是无形体的和轻盈的，而象一大块巨大的透明的冰块，现在它就被撕裂成了碎片。

谢尔盖的耳朵塞住了，他立刻感到热。

“瞧，给我们点香烟了！”他听到萨什卡说，还是那个淘气的声音。

在前面一公里左右的地方，在对岸平坦的田野中间，爆炸的黑色浓烟越来越多。“敌人”隐蔽在战壕里，而炮兵们竭力要把他们从战壕里逼出来。但是“蓝色”也没有空着两手不干。大炮的火光也反射到这边岸上，就象从淘气的孩子用小镜子把太阳光反射到别人家的窗户里去一样。应当估计到，在几百只“敌人”望远镜的注视下，他们对我们这一岸也是了如指掌的。

谢尔盖非常了解战斗任务，顺便说一下，其他的士兵们也是如此。在制服水障碍以后，他们的连应当“用比一个步兵排多些的力量”消灭N高地上的敌人。就是这个萨哈罗夫用命令的口气说的“多些的力量”，尽管有些奇怪，使谢尔盖很喜欢。这些字里面隐藏着无法简单地用俄语说出来的某种东西。而他们的装甲运兵车首先应当在约定的建筑物旁解决掉一个火力点，这是他们班的最近的任务。

“其余的事情让将军们去干完它。”萨什卡又忍不住了。

“土林！……”大尉温和地警告他。

“早些开始呗。”谢尔盖伸出由于坐了太久而发麻的脚，抱怨

地说。

他还没有明白，他所等待着的已经开始了。

在对面岸上，竖起了一堵密不透风的火和烟的墙，超音速战斗机轰炸机飞得很低，差一点没有把松树的树梢刮去。一瞬间，它们不见了，在后面留下了发动机的轰隆声和爆炸的卷曲的散落物。火箭炮弹象彗星一般沿曲射轨道飞去，落在从这里看不见的目标上。

在这轰隆声、叫啸声和吼叫声中，波兰坦克仿佛完全没有声音地从松林里开出来，向河边驶去，树枝编成的伪装物从坦克身上纷纷向四面掉下来。从远处看来，坦克的炮筒就象长矛，这些穿着怪里怪气的铠甲的勇士们就摇动着它们，走进水里。坦克毫不迟缓地一辆接着一辆开向河底，挺起象潜望镜那样的接长的排气管。履带、备用油槽已经不见了，水没到了炮塔，于是河上只留着管子的尽头。变成潜水员的坦克手们现在怎么样了啊！

第一辆从水里跳出来的坦克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机械师—驾驶员没有算好速度——对面的岸上有非常陡的小山岗。这一辆看来是最灵敏的坦克没有能一冲就立即爬上这小山岗去。它绊住了只半分钟，马上急向左转，斜开过去，就象这句谚语说的：“聪明人不爬山走，聪明人绕山走。”

这半分钟却使另一辆坦克处在十分复杂的境地，这辆坦克几乎是靠在头一辆的车尾上，它开始是刹车，但是当头一辆车转向右边时，第二辆除了直接爬上山去，就别无他法了。

所有在“我们”岸上的人都木然不动地等待着：不知能否爬得上去？在履带下面象喷泉似地飞出黄沙、淤泥和石子。大炮象高射炮那样向上面掀起。坦克不顾一切地向山上爬，它咬住土地，履带象活的一样抓住地面。一定得爬上去，后退是不能

的。不仅坦克手们懂得这一点，所有看着渡河的人也都很理解这一点。有些军官和士兵甚至喊道：“加油，驾驶员，加油！……”

坦克仿佛听到了，他蜷缩起来，象飞禽竖起了羽毛、变得短了，终于跳上了陡峭的山岗！

就在这时，当它又恢复自然的水平状态时，它稍稍转了点弯，选好目标就从炮身里吐出火焰来，兴致勃勃地、轻松地吐着。在炮塔上大家看到了刚才无法看到的号码：“1235”！

谢尔盖·卡什塔诺夫从自己的装甲运兵车上也马上看到了这个号码。“1235？嗯，是的，1235！就是说，操纵杆后面是阿达姆·列姆巴契！”

“萨什卡！”谢尔盖惊叹道，他身子转得这么急，以致他们的钢盔象锅子那样真的撞起来了。“这是阿达姆呀，萨什卡！就是那个有红领巾的……”

“乌拉——拉——拉——拉！”萨什卡在装甲运兵车上欠着身子叫喊起来。“打，打，阿达姆，快！”

“停止‘乌拉’。”中士严厉地说。

但是“乌拉”声已经象波浪那样从这辆车到那辆车此起彼伏，传遍全岸。也许，并不是萨什卡第一个叫，可能是别的什么人。

许多嗓子齐声喊叫还没有平息下来，不知是谁的响亮的声音插了进来：

“冲啊！前进！”

伪装的灌木林摇动了，跌倒了，只有灰白色废气的尘埃旋转着，好象有人在沿岸的灌木林里站起来，凶猛地吼叫着。

普罗霍洛夫上校的摩托化步兵部队跟在波兰坦克后面向河里开去。

“开始了！”谢尔盖高兴地说道，每一块肌肉、每一根神经都紧张起来了。

第三章

“我常常梦见那些伙伴，
战争年代的朋友，
我们的有三层木盖板的掩体，和它上面
的烧坏了的青松。
我仿佛重又同他们在一起，
站在陌生的村边，
无名高地的
火线区里。”

(摘自普罗霍洛夫上校喜爱的歌)

普罗霍洛夫(他只有一个营参加战斗)同领导们一起站在观察台上，这块高地有某种东西象十月革命节时红场上的观礼台。这里那里都可以听到各种语言的谈话——七国军队的代表们在交换感想。

一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人民军军官，外表整洁端正，穿着十分合身的制服，用指示棒在一张大地图上比划着，解释演习的现阶段情况。

指示棒顺着红箭头一划，把昨天隔断。这些红箭头象扁平的钢铁弹簧一样，弯曲地顶住标志着敌人的蓝色箭头。现在这些红蓝箭头在一条浅蓝色的带子——一条大河旁边对峙着。七国兄弟部队面临着在广阔的战线上相互协同强渡河界。捷克斯洛伐克空降兵将乘苏联的直升飞机在对岸左面降落，普罗霍洛夫上校的摩托化步兵分队在中央跟着波兰坦克强行渡河；在右

边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人民军的部队，他们将通过匈牙利工兵架设的浮桥到对岸去。在这一切之前先由保加利亚飞机轰炸袭击。

从这里、从高台上望去，使人觉得战区就象是战地画家精致地描绘的一幅全景图。弯弯曲曲的河流象玻璃般透明，两岸丛生着芦苇。在河的后面，伸展着一片高低不平的长着带有白色斑点、淡红黄色的草的平原，这是为了展开进攻而目前必须占领的一个据点。在小山岗上，贴近地平线，可以看得见一座旧的早已被废弃的水塔。塔就是塔，普普通通的，同几百座同类的水塔一样。对摩托化步兵来说，今天它只不过是一个方向标，也意味着是“敌人”的假想火力点。

然而对普罗霍洛夫来说，现在这座水塔却高如灯塔耸立在灰色的田野里，它把二十五年前的遥远的往事从遗忘中唤起。如果上校从另一个方向去看它，也许他就不会去特别注意。但是从这条世界闻名的河流的弯曲处看过去、从伸展到山岗上的小松林方向看过去，这座旧的水塔就在普罗霍洛夫的记忆里巍然站起，比奥斯坦基诺电视塔更高。不但如此，这座水塔还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在普罗霍洛夫的许多恶梦里出现。

二十五年前，一个多雾的、四月的早晨，中尉普罗霍洛夫渡过了这条河，同自己冻僵了的一排人爬到岸上。给他的任务是消灭非常顽固地盘踞在水塔里的敌人的机枪火力。

现在，他不是突然认出这座水塔的。当参加演习的部队把所有的力量——坦克、装甲运兵车、反坦克导弹、迫击炮集中到河边的时候，普罗霍洛夫当然就明白了，这是重复一九四五年走过的路。不是全部路程，而只是它的一段，最值得纪念的一段！但是他怎么也不能料到他的士兵们恰恰会跑到河边的这块地方，在战后的最初一段日子里，这块地方使他每夜睡不着觉，而

在以后四分之一世纪里，他还是经常梦见到它。

就象一切职业军官那样，普罗霍洛夫深深懂得：新的战争常常给自己选择过去战争的路线——同样的道路、同样的桥和渡口。但是他还是没有想到过有这样绝对的巧合，并且，看来也没有料想到会这样面对面地同青春相遇。在那次过去的战争中，这样的信念是太强烈了，这就是伴随着战斗和无可挽回的损失所走的每一步，不应当再重复了。

可是现在，演习战斗又打破了这块地方的静寂，在这块地方，你只要挖得深一些，也许还能碰到生了锈的炮弹的碎片或者发了绿的子弹壳。

细节在记忆里磨灭了。留着的只是一些片断的情节，就象穿插在故事片里的一段段纪录片，活动的速度一会儿慢、一会儿快。

……机枪从水塔狭窄的小窗里瞄准地打着，控制了整个河岸地带。普罗霍洛夫的士兵们刚刚伸出头来，从那个山岗那里，今天一辆波兰坦克勇猛地爬上去的那个山岗那里，铅弹就从上面倾泻下来。四个人马上倒在草地上，留下躺着，而其余的人，尽管号称一个排，他们一共只有两个班，爬着向后退去。冒险是徒然的。显然，在那边岸上等待着的人也明白这一点。于是大炮就对准水塔打。第三颗炮弹打掉了盖瓦的圆塔顶；第四颗打得稍稍下面一些，恰恰在碉堡枪眼旁边。砖瓦的尘埃扬起的红云掩没了水塔，于是机枪不响了。第五颗炮弹炮兵们就节约了。下一步怎么办，显而易见，他们认为，这是步兵们的事情了。谁能知道，在厚厚的墙壁后面有多少党卫军躲着。

从岸边到水塔伸展着一片象足球场的、平坦的地方。“前进！”普罗霍洛夫声音嘶哑地喊道，并且第一个从土堆后面跳出来，头也不回地向水塔跑去。十五个人，这是全排留下的所有的

人，跟着他猛冲。跑起来很方便，脚下的草有弹性。要不是硝烟的焦糊味使鼻子发痒，那么这不是攻击，而是体育活动——周围是这样的安静，这只有在兵营旁，在起床以后的最初几分钟，才有这样的安静。

这一时刻中发生的一切，普罗霍洛夫后来记得非常清楚，仿佛是在慢动作的电影里看到一样。卡什塔诺夫中士气喘吁吁地同他并排跑在一起，他可笑地掀起两只脚，好象害怕给只有他一个人看到的什么东西绊倒似的。他的脸从侧面看是这样的近，这样分明地勾画出它的轮廓，以致普罗霍洛夫甚至看到面颊上剃胡子刮破的刀伤，也不知为什么他注意到的恰恰是这个刀伤。

普罗霍洛夫后来梦见，他们精疲力尽，在一个地方跑着。跑着跑着，一步也没有前进，只有这个刀伤在闪烁——卡什塔诺夫不仔细刮的结果。

到水塔已经非常近的时候，法西斯机枪令人断肠的达达声突然又向他们射来。也许，我们的大炮只是把德国人震昏了，而现在他们清醒过来了；也可能，炮弹根本没有打到他们那里，机枪手们藏起来，等待着俄国人站起来，当瞄准点上没有闪现由于奔跑而发红的脸时，他们沉住气放他们来得近些。

最前面的一排中弹死去，当普罗霍洛夫扑倒在地时，他还来得及瞥见列兵西穆什金捧住了头；利亚比宁稍稍弯着身子，象个陀螺似地旋转起来；柯利亚金奇怪地摇晃着，由于惯性还朝前跑了几步。

“卧倒！我跟谁讲啊，卧倒！”普罗霍洛夫叫喊道，他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子弹在各处击中士兵，有的在左面，有的在右面，而以后，在恶梦中浮现的记忆却把他们连在一起，连成一组可怕的环舞。

这是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离胜利还剩下的天数就象到

水塔的步数一样多。可现在……完了。在全人类节日的前夜，当你迎着枪林弹雨跑过了一千多公里，后面是竖着方尖碑的几千座坟墓，而你还活着，你还年轻的时候，突然你就化为乌有。

这是到后来，普罗霍洛夫才开始觉得，当他一动不动地伏在地上，竭力要緊贴着土地时，他平心静气地估量了走过的道路，认为在胜利前夜牺牲掉是愚蠢的。实际上，当时胜利虽已在望了，但是还没有谁知道，胜利的庄严钟声是在五月九日敲。

普罗霍洛夫无能为力地、头脑空虚地看着由子弹搅起的活跃的尘土烟浪，他想到在这地狱般的冲锋中，是他自己，排长的罪过。本来应该等待，应该在掩蔽处里好好考虑一下，从哪一个地方去接近这该死的水塔。

他同十个还活着的士兵（还活着吗？）目标很大地卧在纳粹们的视野里，直挺挺地作为靶子。法西斯只要不断地打就是了，一会儿打中这个，一会儿打中那个，就象在打靶场或射击场里。

趁着这鲜红的血浪还没有从你自己和你的同志们的身上涌出来的时候，普罗霍洛夫，站起来，马上站起来，去带领人们往前冲，因为如果你能冲到这塔的脚下，那也许可能，可能……

普罗霍洛夫跳起来，叫喊着。但是他没有按规定叫士兵，没有用这样的命令喊：“出击，跟我上！”普罗霍洛夫就是现在也不记得他叫的什么，是一种奇怪的、象是某种没有言语的叫声。

但是大家都懂了。他又感觉到左面和右面是自己的士兵，接着便跳跃着扑向水塔。普罗霍洛夫没有听到机枪象嘴巴张大的链条上的猎狗，又在狂吠了。

往旁边一跳，对直一跳！又一跳，就用两手抱住了水塔；紧贴在凉飕飕的粗糙的墙砖上。卡什塔诺夫飞步来到，自动步枪

发出咯咯的声响。“上，上！”士兵们紧贴住水塔，向上面张望，象在下雨时一样——上面已经没有铅弹落下来了。

“用手榴弹，往门里丢！”普罗霍洛夫命令道，他清醒过来了，感觉到好象是没有信心的背叛状态消失了。

在急促的脚步下，螺旋形的楼梯咯吱咯吱地抖动着。一梭子自动步枪子弹在墙上激起了回声，又是一梭子，接着，卡什塔诺夫不响亮的声音从上面，从昏暗的垂直的深处传到普罗霍洛夫那里：

“你们为什么杀死我们这么多人……他妈的……”

接着，突然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灰烬四散洒落。

而不可抗拒的、摧毁一切的进攻巨浪，已经从河边开始全线向前推进，最高的、九级巨浪。但是在这巨浪的火峰里，跳动着、连结着一些小的、班、排、连的波浪，他们大家都有自己具体的战斗任务。其中之一就是由普罗霍洛夫中尉和他的士兵们在执行。

水塔上的火力点消灭了。在它的脚下，中尉无需集合战士点损失了，战士只剩下了六个。

……普罗霍洛夫上校举起望远镜，水塔跳了过来，好象它驶到了观察台的面前。这真是奇迹——他的士兵又重新向着作为目标，作为“敌人”假想火力点的这个仿佛被时间的魔力禁锢住了的塔跑去。

然而最令人惊奇的事情不在于儿子们走父辈的道路来到这个渡口。这不是战争重演，不，一九五一年出生的士兵们现在去投入演习战斗是为了使谁也不敢投出真的手榴弹来破坏这个安静。他们学习打仗不是为了去跨越别人的边界，而是为使那些有时想要跨越别人边界的人，别迈出冒失的步子。年轻的小伙

子们继承的不仅是有五角星的钢盔，而且继承了父辈们为了地球上的生命去争取胜利的意志。

在时代的范围里，四分之一世纪是多少呢？秒针的一圈？不，问题不在于时间。成长起来的不仅仅是士兵们。在这个时期里，出现了在法西斯的枪林弹雨下扑向水塔的年轻中尉普罗霍洛夫所不能想到的某种重要东西。这个“某种”东西现在清楚地反映在巨大的、用油彩画着战斗活动示意图的胶合板上。它不是艺术家画的，它是时代画的，历史深信不疑地画出了这些集中在一点上的红色箭头。一个箭头是苏联军队的摩托化步兵部队；另一个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人民军的摩托化步兵部队。按照演习领导的设想，俄国人和德国人应当相互协同进攻敌人，就是通常说的肩并肩地去战斗。

快些转吧，快些转吧，时针，向相反方向转吧！就停在那一天，停在那一刻，这一刻通过可怕的水塔的形象，仍然老是出现在普罗霍洛夫的梦中……呜呼，那组在四月份德国的枪林弹雨下被打死的战士们的可怕的环舞！……还有离莫斯科一千俄里，离胜利二十步的合葬墓地上的粘土小坟堆。忧伤的礼炮，六发从自动步枪里飞出来的子弹壳，六发齐放。

“任何时候我都不饶恕……任何时候！”卡什塔诺夫擦干眼泪，说道。

而火箭手已经在柏林等他了。只有偶然性（它不知为什么常常在无可挽救的时刻帮助人）才把卡什塔诺夫从不可避免的牺牲中拯救了出来。就这样，战争在他身上，对法西斯分子无限仇视的人身上，留下了永久的纪念——在腰椎骨旁的一块弹片。

转吧，转吧，时针……但不管你转多少，时间，这就是我们。尽管头发变白了，退入预备役或退伍了，但终究还没有离开生活

的战场。时间，这是年轻的，刚刚由学生装换上军装的小伙子们。现在该由他们担任第一梯队了。

于是普罗霍洛夫突然极其敏锐地感觉到了，看到了继承性的美——他记起了，卡什塔诺夫的儿子在萨哈罗夫连里服役。这就是说，这个小卡什塔诺夫现在在那里，在下面，在一辆装甲运兵车上。想到这里他高兴了。你看，这就是接班人。小伙子同父亲一模一样，就是高过一头。现在的士兵都是又高又大。现在在连里，就象一个熟识的班长开玩笑道：“殿后兵不够了：工厂里不生产矮个子了。”

普罗霍洛夫收起了笑容：“而这个小卡什塔诺夫是个遵守规章的人。‘可以走了吗’……”

但是突如其来的高兴的感情被难过的感情扑灭了——有点对不起老卡什塔诺夫。他同他儿子的会见是被普罗霍洛夫打断的，在家里两个老战友之间的谈话也谈得不好。谢苗身上的创伤很深，可以说，弹片波及心田，心里也在刺痛。这样的情况下，医生们也只能走到一边去。

对卡什塔诺夫来说，最好的疗养院，大概就是出席他们这种或类似的演习。最好能有那么一次让老战士们都聚集到这个观察台上来：“你们瞧，亲爱的同团战士朋友们，你们什么时候看见过左翼是一个国家，右翼是另一个国家吗？这才真正是和平保卫者。士兵们从战壕里跳出来，马上就遮住了半个地球，就象遮住半个地球仪一样。”

“要，一定要为卡什塔诺夫想出点什么来，”普罗霍洛夫坚定地作了决定。

他放下望远镜，现在就是肉眼也能看到，穿着深绿色军衣的人们从渡过河的装甲运兵车里出来。

“杀——啊——啊——啊！”从那边岸上传来。

“要短促！要短促跃进！”普罗霍洛夫失望地皱着眉头。有一瞬间他似乎觉得，在水塔里就象二十五年前，目镜凶猛地闪着光。

“卧倒……卧倒……”他内心的声音命令现在在对岸挺直身子跑的人。普罗霍洛夫仿佛在这些急急忙忙的身影中看到了西穆什金、利亚比宁和柯利亚金，于是他战栗了一下。他的伙伴们、他的排急着跑向水塔。

接着，士兵们服从不知是谁的命令，躺下了。普罗霍洛夫吐了一口气，擦擦军帽下的额头。然而这是什么？或许这是一种错觉？旧水塔的小窗户里有机枪在射击。

第四章

“在九点零五分，我把班长从队伍里撤出，士兵们没有惊慌失措。”

（摘自大演习仲裁人的记录簿）

装甲运兵车咚咚开进水里，好象一群笨重的鸭子，大胆，但有点笨拙。接着急急忙忙，成群地不知害怕什么似的游向对岸。

河很深，河中心水流湍急，当装甲运兵车驶到河中心，水流就开始明显地冲击它们。

“小心点，要不然我们会糊里糊涂地淹死的。”中士半开玩笑地警告机械师兼驾驶员说。

萨什卡搓了搓手，蜷缩了一下：

“弟兄们，我们可不是走着去进攻，也不是乘车去，而是游着去！就象乘在劈柴斧头上！”

谢尔盖想象着秋日的水流，于是寒气就钻进了袖子管。瞧，如果这好几吨的装甲车沉入了这样冰冷的深水里，手脚就会立

刻抽筋。

他感激地望着装甲运兵车坚固的外壳。河水沿着装甲车的两侧，在一条没有标明但可以推测出来的正常吃水线的高度上激荡着分开，就象沿着快艇的船舷分开一样。机械师—驾驶员斯拉夫卡·皮亚特洛夫也是值得尊敬的，他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比远洋大轮船上的船长还要神气。

现在在部队里谁最受尊敬？炊事员和驾驶员。

确实如此。如今没有装甲运兵车，兵就不成其为兵了。就因为现在总是有“装甲车”的有劲的脚伴随着士兵，所以便叫做摩托化步兵。但是装甲运兵车不仅有很快的轮子，它还好象一面盾牌，它还有机枪。

在战士们“下马”以后（在摩托化步兵的日常生活里有骑兵的用语），装甲运兵车应当象保姆那样跟着他们，用火力支持他们并且准备在任何时候把自己亲爱的孩子接进车里，这就是装甲运兵车！

而现在他们的“装甲车”顽强地同水流搏斗，向对岸驶去，岸上已经到处被坦克履带翻得高低不平。坦克象许多巨大的蜥蜴，从河里爬上来，留下自己的足迹，忽然向某处消失了……

装甲运兵车终于用轮子抓着了河底，满意地噗噗一响，加快了速度，也向岸上爬去。谢尔盖觉得，这是斯拉夫卡·皮亚特洛夫这样高声地喘了一口气：最危险的已抛在后面，现在只要前进，只要及时变换速度就行了。

“任务清楚了吗？”维亚佐夫问道，由于颠簸，嗓子也颤动了。他完全知道，任务早已清楚了，并且坐在装甲运兵车里的每一个人都已经几次在心里“扮演”在预定的战斗中自己的角色。但是谁也没有回答他，于是这个沉默被他认为不是同意的标志，而是不懂的标志。

“请重复一下！”他命令卡什塔诺夫。

“目标：第一是灌木丛，第二是土岗，第三是水塔。在水塔上有机枪。全班必须向第三个目标攻击敌人，消灭无后座力炮以及栽入地里的一辆坦克。接着……”

“接着不需要了，好样的！”维亚佐夫赞扬说。

萨什卡也以毫不掩饰的钦佩看了一下谢尔盖：

“嗯，你真行！”

“空话！”维亚佐夫皱着眉头，打断说。

他瘦长的身子，好象从来也没有弯过腰，而只会迈着战斗的步伐，现在由于皮带扣紧，显得更加精神抖擞。在颧骨上，两块肌肉明显地突出来。中士竭力控制住激动：他面临的任务是不容易的。

在河和打算要去进攻的旧的水塔之间的空地，原来并不是从远处看去那么平坦。工兵和做礼炮的匠人作了一番努力，现在这一块地方好象真的经历了一场战斗的风雷，到处是坎坷、弹坑、倒塌的绕着带刺的铁丝网的电杆木，常常有使人心惊肉跳的爆炸震动土地和出人意料的火焰以它颤抖的氯气的亮光照耀空地。

斯拉夫卡·皮亚特洛夫把车刹得使谢尔盖和萨什卡的钢盔又撞了起来，撞得头里嗡嗡响了一阵。

“公民，别推推撞撞，我要下去了！”萨什卡埋怨说，接着，不等维亚佐夫的命令就机灵地跳到地上。

于是大家都不等命令，开始从装甲运兵车上下来：如果预先约定的地点到了，干吗还要等命令！这是习以为常的事情，练习到自动化的程度了——徒步走走吧，象布琼尼的骑兵那样。

“全班准备进攻！”维亚佐夫急忙命令说，而且这个命令也好象下得迟了。

战士们已经自己在做在这个场合下应当做的事情了。

“全班进攻，前进！”维亚佐夫仿佛对谁不好意思似地半是喊叫着命令道，于是战士们就小跑步向水塔急急冲去。

“前进，前进！”谢尔盖自己赶着自己，竭力不落后维亚佐夫一步。孩子的欢乐、顽皮控制着谢尔盖，他总是以这样的顽皮开始喜爱的游戏。而这场战斗要知道也是独特的游戏啊……

他们一边走一边就把手榴弹掷向“无后座力炮”，没有停顿。谢尔盖这样高兴地把铁块扔向从战壕里露出的象征凶猛的炮身的一段管子，以致维亚佐夫看了他一眼，并且威胁地说：“轻些。”

就这样，士兵们一面相视而笑，互相开玩笑地推撞着，一面又跑了大约五十公尺，此时，眼前打来一道象是从强烈的电筒里射出的闪光。

“卧倒！”维亚佐夫喊道。于是战士们不慌不忙，竭力不使自己碰疼，准确地按照操典：左手撑地，接着几乎是同时左膝盖蹲下，这样才开始扑到地上。

干吗要慌慌张张呢？现在维亚佐夫班去进行的攻击，完全是假定的，这每个人都知道。机枪从水塔上连续射出的子弹都是空的。

然而，中士发现意味着火力增强的过于频繁的闪光后，他以敏锐的士兵的嗅觉预料到增长着的危险性。“这是开阔地带，就是说在真的战斗中敌人的机枪会把我们毫不费力地宰了。”

结果是这样，在法西斯的机枪曾经瞄准扫射好象把手脚钉在已经发绿的草地上的活的目标的地方，土地对没有经验的、年轻的战士们产生了磁性。

维亚佐夫的战术课是“五分”，他很好地确定了地点的方位，而且当他命令全班卧倒而自己也扑到草地上的那一刻，他已经

来得及预先看定了下一次冲刺可以冲到什么地方。在前面三十公尺左右的地方，有一个土岗或小丘高耸着，它在这几乎是平坦的空地上显得非常奇怪。“很好的掩体，可为什么地图上没有标出”，维亚佐夫很惊奇。躲在这小丘后面可以安安稳稳等待着，不慌不忙地看清水塔上的机枪，把射界调整得更准确并且选择进攻的有利时机。

如果不是从地里钻出一个军官的身影，这个军官还在对岸就给萨哈罗夫大尉一张投入战斗的命令，那么也许，结果就会是这样，并且中士也会顺利地实现正在成熟的计划。这个袖子上套着白色袖章的陌生军官是大演习的仲裁人。

“您被打死了！”军官以这样的语调对维亚佐夫说，好象一早晨一直盯着他，现在终于逮住了。这个军官完全是一副阴险来的死人面孔：盖到眉毛的军帽下面，一张用军帽皮带束紧的苍白的脸，皮带使尖尖的下巴更加突出，不禁使人想到挂在高压电线杆上的铁板上画着的骷髅。

“这不可能！”维亚佐夫瞪着眼睛。“少校同志，我一切都是按规定……”

“您被打死了。”少校平静地、象是念咒似地又讲了一遍。

“在这样的时刻吗？……不，我不可能被打死。”维亚佐夫坚持说。

“您要抗命吗？”军官温和地威胁道。

维亚佐夫被认为是好小伙子，他只是“在执行任务时”，才故意作出严厉的姿态和领导者的一本正经。而现在，他刚被打死就已经完全成了一个朴实的人了——伸手到口袋里去摸香烟，因为能够借烟浇愁是“死人”在活人面前最大的优越性。

“谁代替？”死人面孔问道，虽然这是可以不必问的。任何一个士兵在类似的情况下都可以勇敢地挑起指挥全班的担子。

“谁？”军官重复道。

大家都默不作声。

“让卡什塔诺夫领导吧。”萨什卡·土林没有把握地建议说。

“这就是，这就是表现出我不是个草包的机会。”谢尔盖激动得心脏也停止了跳动。

“全班！”他以童声的最高音喊道，接着立即控制住了，抑止了激动，咳嗽了一声，说：“听我的指挥！”

“这已经是另一回事了！”萨什卡从旁边吃吃地笑着说。

“停止讲话，土林！”谢尔盖没有转身向他，打断他说。

死人面孔象突然钻出来那样，突然消失了。

接下去怎么办？谢尔盖满怀希望地看了一下维亚佐夫，但是对方一语不发，真的，象死人那样，藏在袖管里的香烟微微燃烧着。

不远的地方一辆无法辨认的陌生的装甲运兵车象变聋了似地停着。战士们无忧无虑地躺在草地上，甚至萨什卡，朋友，他也转过脸去，用嘴唇把一根草揪来揪去，好象没有什么事似的。

而从水塔上，机枪不停地扫射着，越打越凶。

谢尔盖转身向右，那里应该是第二班——一个人也没有！仿佛钻到地里去了。

一切都停顿了！从军官对维亚佐夫宣布判决那时起……不，从卡什塔诺夫担当了指挥责任那时起，一切突然都停止不动了。战士们安静的脸，装甲运兵车死气沉沉的轮廓……前面三十公尺的一个土岗……只有象灯塔一样不断发出闪光的水塔还活着，并且在行动着……

谢尔盖把手贴在耳朵上，听到表的走声，现在每一秒钟都拉长到一分钟，一分钟拉长到一个钟头。他明白，如果现在不作出任何决定，不给自己找到赶跑这个沉默、这个停滞状态的力量，

那就可能出现自己想象不到的某种更加可耻的事情。当然，进攻是不会中止的，不会由于几个战士不行而改变战斗的结果的，任何东西也已经不能阻止全师的突击。但是对他们的班来说，一分钟的惊慌失措就等于失败，而在他们这块小小的战线上，“敌人”将取得胜利。

但是，不仅是这一点使谢尔盖害怕，他知道，从观察台上有几百双用望远镜和潜望镜武装起来的眼睛注视着战斗。那里现在站着佩带七国不同样子的将军领章的领导者们。某处，普罗霍洛夫上校站在挑剔的、内行的观察者们中间。从那里，从观察台上可以了如指掌地看到躺在空地上无所作为的战士们。想到这里，一阵寒战在谢尔盖背上通过。他甚至觉得望远镜都集中到他的后脑勺上。他并且清楚地想象出有各种颜色的军服和制服裤子镶条的观察台，几百双射向空地的眼睛。普罗霍洛夫上校满脸通红，竭力掩藏着窘迫，这是他的部队做出这样的错事。

谢尔盖在一瞬间想象出由于羞辱而无处躲藏的普罗霍洛夫茫然若失的脸孔以后，他可以发誓，他听清了远在一公里半之外的上校的话：

“你们干吗拖拖拉拉？喂，上吧！卡什塔诺夫，上啊！”

应当想办法把自己同志们的这种石头般的沉默、这种冰块样的停滞状态打翻。

“全班投入战斗！目标小土岗，前进！”谢尔盖喊道，随即爬了起来，准备跃进。

他的意图是明白的，跑到土岗处，卧倒，接着……

但是仍然没有人动一下。

“你疯了？”萨什卡从旁边开始翻动。“当我们快要跑到时，我们大家都被打中了……这个仲裁军官……”他小心地张望着，补充道。“要跃进……一个个上。”

“向右，一个个地向土岗跃进！”谢尔盖重复说，并且对战士们竭尽全力开始执行他的这一命令感到惊奇。他们弯着身子一个跟着一个，拼命地跑向小丘，并且在那里卧倒，准备射击。谢尔盖和萨什卡碰在一起，小心地从掩蔽物后面探出头来。这个小丘很怪，不知怎么很平整，好象用铁锹在边上削过似的，它本身不可能这个样子出现在空地上的。

谢尔盖发现，在小丘面向水塔、正在受到射击因而不能伸过头去的坡面上，有一块石碑，边缘满是缺口，长满了青苔。

“听着，这不是纪念碑吗？”他对萨什卡低声说，而萨什卡也已经在望着石碑。

“也许是，”萨什卡同意说。“以后我们会弄明白的。你瞧，瞧水塔！”

机枪不停地扫射着，用什么东西塞住它的喉咙呢？

“有主意了！”萨什卡就在谢尔盖耳边热烈地呼吸着并且四下张望，大概还是担心仲裁军官把他“弄成死尸”。“反正我们一个班拿不下‘火力点’，让我们的人从这儿射击，我回到装甲运兵车那儿去，试着绕过去……”

“可同谁呢？第二班在哪儿？”谢尔盖由于委屈而差一点哭出来了。

萨什卡同意地不作声，眼睛斜视着右方，在二班战士们应该在的凹地上空无一人。可能仲裁人已经把他们都消灭了？

那里，在凹地后面，默默地延伸着战斗前夕挖的战壕。但是在这样远的地方，第二班是无事可做的……然而，战壕里毕竟还是有人在的，萨什卡发现在粘土胸墙上面有钢盔在移动。

“瞧，那不是他们！”他高声说道。

但是萨什卡错了，那不是第二班的战士们，总之，不是我们的士兵。钢盔的形状同我们的不一样。

“德国人！”萨什卡兴高采烈。“嗯，是的，德国人！他们的步兵应当在右面走。”

“那怎么？”谢尔盖失望地翻来翻去，“他们有自己的任务。”

“什么叫自己的！”萨什卡反对说。“我们是在战斗，而不是在食堂里！”

于是立即（谢尔盖甚至没有来得及清醒过来）萨什卡一下子跳到右面去，弯弯曲曲地向德国战壕匍匐前进。

机枪不知为什么不响了。大概，“敌人”从上面看到萨什卡了：这个战士干什么去？而萨什卡在装甲运兵车旁把身子弯得很低，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说：发动起来吧，接着又噗的一声扑倒在地，象蛇一样地向德国战壕爬去，装甲运兵车驯服地慢慢跟着他走，好象被他用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拖着一样。

德国土兵们好奇地迎面钻出头来，有人忘记了，整个身子都站起来，但是立刻（现在已经对着德国战壕）机枪又扫射了，于是许多钢盔会意地藏了起来。

萨什卡也屏息不动，拖延了一下就一下子跳过胸墙，消失在德国人的战壕里。

谢尔盖期待地望着那个方向，并且突然看到一个穿着德国军服的士兵从战壕里钻出来，接着也伏在地上，用臂肘爬起来。他几乎完全重复萨什卡的路线，只不过是相反方向。

于是水塔上的机枪又不响了，好象感到惊奇：真是难得的巧事——一个士兵爬到那儿去，另一个士兵从那儿爬出来，这意味着什么呢？可是德国人继续爬着，就象有听不见的命令在督促他，从一个弹坑到另一个弹坑，从一个土坑到另一个土坑。他穿着有斑点的黄绿色花纹的衣服，有点象工作服。用深色布包着的钢盔没有反光，不闪烁，使卡什塔诺夫觉得象蘑菇的圆顶。在蘑菇的旁边竖着一枝自动步枪。

谢尔盖没有机会在类似的场会见过德国人，因此，慌乱变成了好奇。

然而他还没有来得及仔细端详闪现出来的身影，后面不知哪一个战士吃惊地呼出一口气道：

“坦克！”

谢尔盖的目光这里那里乱瞅着，并没有马上看到在远处赤杨树丛后面，仿佛在一个地方蠕动着的装甲巨物。为什么喊“坦克！”时用了复数形式，谢尔盖不明白，因为坦克只有一辆。显而易见，这辆坦克就是他们班应当消灭的。而它跑着，看样子直接向他们，向他的班驶来，似乎要拦住急急爬来的德国人的路。

真是就缺这个了！好象是专门，好象是故意一切都向谢尔盖身上压来，仿佛即使不是整个世界，至少也是整个战场都压到他们班上来了。谢尔盖气恼地，接着又转变为委屈地想着，萨什卡跑到侧翼德国人那儿去，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现在可安稳……

尽管卡什塔诺夫明白，十分明白心里想的是胡说八道。在这样的时刻萨什卡是不会出卖他的，他不可能预先知道坦克进攻。但是委屈情绪还是不能平静，而谢尔盖也不想使它平静，因为他不想承认，他是在对自己，对自己的迟钝生气；他不想承认，现在他只不过是感到害怕，因为萨什卡不在一起而害怕。

“班长，我们怎么办？”又传来不知是谁的惊慌失措的声音。而谢尔盖甚至没有回头看一下，他根据这个没有信心的腔调，就马上认出是列兵捷明。当他向左右转过身去时，看到其余的士兵——苏利金、克罗利、利亚明、别洛夫、帕申。士兵们象埋在地里似地躺着，眼睛盯着驶近来的坦克，它已经近得使人觉得发动机的隆隆声在钢盔里发出回响。

接着，为了不仅让捷明，而且让大家都听到，谢尔盖以有点甚至是漫不经心的语调用低音说道：

“准备！”

但是他知道，这个命令还没有讲出最主要的东西。捷明问过“班长，我们怎么办？”以后，等着的是另一种回答。他也不是白白地插上一句“班长”的，不是为了奉承，也不是为了挖苦，就象萨什卡五分钟前那样。谢尔盖的指挥权在面临的处境中并不意味着形式上有权命令，而有着某种更多的东西：现在只有他谢尔盖有权决定，谁去迎击坦克。说得更确切点，是谁爬去。这一点使捷明特别感兴趣的原因是，他最害怕坦克，这大家都知道，但是没有嘲笑他，也没有认为捷明的恐坦克病是胆小。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十米高的塔上跳到水里，正如不是每个人都能双膝毫不发抖地躺在咣咣作响的象钢牙齿那样的坦克履带中间。在战术课中，只有几个人对这个称为“滚坦克”的练习感到高兴。

第一次练习正是由于捷明而使人记忆犹新。当坦克开近战壕的时候，无论是排长的劝导还是威吓，都不能对他发生作用。看起来，并不怎么困难，你蹲下，把身子弯得低些，等那么五秒，就算十秒钟吧，于是坦克从你头顶隆隆开过，粘土从上面撒落下来。于是你马上跳起来，用手榴弹炸它！如果你炸中了，你就得到“优秀”，大家满意，文书，你记上，嘉奖。就那么五秒，就算十秒钟吧……

不！没有那样的力量能迫使捷明留在战壕里，尽管他亲眼看到，班里的所有战士象萨什卡所说的俏皮话那样，通过了“装甲手续”以后，都好好地站着，也没有受到损伤。

那天下着令人厌烦的细雨，土地膨胀起来，而年轻的中尉穿着新的、纽扣闪闪发光的军大衣，他刚刚从军校里来。他小心地在战壕旁交替换着脚，深怕弄脏了擦得光亮的皮鞋。大家都可惜这一双大概是中尉军官生活中的第一双皮鞋，这个中尉由于一个什么捷明，无缘无故地在雨里淋着。而坦克已经第四次，也许

是第五次转弯，开向战壕，捷明站在里面，充分准备着从那里跳出来。现在他比鬼还怪，弄得浑身是粘土，直到军大衣的领子上。而这粘土看来甚至淌到额头上，大约是从钢盔上流下来的。

“捷明，你好象脑子流出来了。”萨什卡忍不住嘿嘿地笑道。

捷明疲乏地等待着新的命令并且仿佛以自己所有的表情表示屈服，好象在说：去你们的吧，那怕压死我也好，只是别再纠缠了。

这时，上校乘了“嘎斯”来了。中尉踏着污泥，正步迎上前去报告，上校只是向他挥挥手道：“继续进行！”他在稍远一点的地方站住，观察着。可是捷明又没有及格，在最后一分钟可以说不仅在上校面前丢了自己的脸，而且丢了全班的脸。他从战壕里跳出来，差一点没有压在履带下面。

“停止！”上校生气地命令道。接着他叫中尉过来。“几次了？”他目光盯着排长问。

“第四次，上校同志！”中尉回答说并且耸耸肩膀，好象暗示这与他无关。

“而您自己做了几次？”

“什么？”中尉不明白。

“我问，该怎么做，您示范过几次？”

“一次也没有。”中尉不好意思地说，接着马上连忙辩解道：“有详细的说明……他们都是有文化的。”

“得了，到战壕去！”上校粗暴地打断他说。

中尉的脚掌由于沙粘土滑了一下，差一点没有摔倒，但是他顺从地跳进战壕。于是大家看到一颗闪闪发光的钮扣从军大衣上掉下来，陷在胸墙的污泥里。

“给中尉再开一次！”上校以温和一些的口气要求坦克手们。

中尉按规程一切都做完了。而当他拍打着身上的污泥，从

战壕里爬出来时，他的样子同捷明几乎没有两样。

“就这样，”上校微笑一下。“亲身示范……您看到了吗，捷明？”

于是捷明没有等命令就顺着粘土滑到战壕里，他终于在滚过来的坦克面前蹲住了。他成功了！

“你怎么，每一次都要部队首长来鼓劲吗？”中尉温和地抱怨道。

大家都通过了炸坦克——在战壕里，甚至也在野外，在平坦的地方，按照规程，当坦克开到离你七、八米远的地方，你就应当急急退向一旁，并且还要在它后面把手榴弹猛丢过去！大家都知道怎样做，做什么，大家也都试过了，但是愿意再重复一遍的人，你试着去找找看吧，甚至是空降兵，对什么都满不在乎、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就是他们也会毫不为情地承认：“宁可从飞机上跳五次，也比在坦克下钻一次好……”可是又必须去做，这是士兵的事业。

“我问，是谁去呀？”捷明完全失去了耐心，现在他已经坦白地问谢尔盖了。

离开坦克还有三百米。“掷弹筒！”谢尔盖忽然想到。“我怎么没有早想到呢？”

“利亚明，用掷弹筒！用掷弹筒！”

“让它再开得近些。”利亚明镇静地回答，一面把自己的武器配得更方便一些。

“快点！……快点！……”谢尔盖恳求地低声说道，不安的目光从利亚明身上移到坦克，又从坦克移向利亚明。接着他忍不住了，从包里抓起反坦克手榴弹。

“唉，你的长号见鬼去吧！前进！”谢尔盖给自己下命令，接着把双脚收缩在一起，一蹬跳了出去，仿佛钻进暗色草丛里去迎

击坦克。

他没有听到后面对他喊什么，在他耳边、在他胸前只有一个声音：开近来的坦克的钢铁的吼声，它震动了整块土地，好象土地里面是空的。谢尔盖除了疯狂旋转的履带外，已经什么也没有看到了。这履带象二把巨大的铣刀，切入草里，切入地里，以贪婪的欲望势不可挡地向他开近来——要把他磨碎，掺和，压死。

坦克已经不是坦克了，从地上透过草丛看去，它象是一个活的东西，从别的星球来的怪物，它散发出烧了几公里灰的焦糊味。谢尔盖透不过气来，他咳嗽着，为了喘一口气，他喊着什么，但是在坦克的轰鸣声中他甚至自己都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于是他喊得更响一点，好象竭力要盖过迎面滚来的轰鸣声和金属撞击声。由于这声叫喊似乎使他更勇敢了，他猛然一冲迎着坦克爬去。他握紧手榴弹，把所有的力量，所有的意志和所有的仇恨都转移到紧紧握着手榴弹柄的手指上去。

两把铣刀——履带已经完全在近旁轰轰作响了。谢尔盖不知道离开它们有多少远——十米、八米还是五米。现在对他反正都一样了：用手榴弹打击怪物的非常勇敢的决心已经超过了他的清醒的估计。无论如何要打击，只要扔得到，来得及。

而当谢尔盖向后仰着准备扔时，他完全忘记了现在正是急急退向一旁的时候。好象从远处，盖过履带牙齿的撞击声，传来维亚佐夫的声音：

“到旁边去！到旁边去，我对谁说啊！”

身体不由自主地听从这声中士的叫喊，谢尔盖准备好，蜷缩着，象弹簧似地跳到一旁。就在那时，当维亚佐夫的命令使他从坦克那里跳开时，在谢尔盖的面前闪过从炮口里伸出来的机械师——驾驶员惊慌失措的脸。这使他快活起来：“小伙子吓坏了！”这也使他不再发愣。他扬起手，以所有的力量投手榴弹，但

是没有扔到。第二颗手榴弹不知为什么摸不到。正当他瞧着泰然离去的坦克，在无能为力的懊恼中抓着一把草，差一点没有哭出来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不知是谁的手榴弹啪的一声落在炮塔的“后脑勺”上，接着另一颗手榴弹马上从坦克后面的装甲板上响亮地弹开去。

只是在这个时候，谢尔盖发现维亚佐夫几乎同自己并排在一起。

“嘿，你真急躁！嘿，任性！”中士冷笑着摇摇头。

“您被打死了呀……”谢尔盖提醒说。

“是被打死了。”维亚佐夫同意说，一面躺着抽烟。

“那手榴弹呢？”

“这不是我。你看，那不是德国人吗？是他扔的……”

关于德国人，谢尔盖已经完全忘记了。

“你瞧，你瞧！”维亚佐夫把手臂猛然撑起来，转身向左，张大了嘴惊呆了。

在一公里半外面，在芦苇和灌木丛后面象打破的镜子碎片一样闪闪发光的河流上空，天忽然暗下来了，好象由巨大的翅膀遮盖了似的。这是从森林后面钻出来的直升飞机，差一点没有把树梢给打掉，它们伴着欢乐的轧轧声降落在被水淹没的草地上，同一群奇怪的蜻蜓毫无两样，由叶片转动的环闪烁着云母的光采。

“空降兵！”谢尔盖赞叹地说。“我们的！”

在直升飞机的表面，五角星红光闪闪。门打开了，穿着有斑点的伪装服的人跳到地上。大炮从一架大一点的直升飞机里推出来；一辆汽车从另一架，也是大而笨重的直升飞机里推出来。就在汽车上，一面红、白、蓝色的旗子在飘动。

“捷克斯洛伐克人！是啊！在我们的直升飞机上的是捷克

斯洛伐克空降兵！”维亚佐夫断定说。

而空降兵已经在奔跑了，一面射击着，传来激烈的呼、呼、呼的枪声。在“我们的”直升飞机上飞来的“不是我们的”士兵，这个事实有着一种仿佛是隐蔽的、因而是特别严厉的含义，莫斯科附近一个叫什么伊凡·彼得罗夫的人让布拉格附近一个叫什么卡列尔·希帕克的人下了飞机，也许，他们甚至没有来得及好好认识，或许只是在起飞以前一起抽过一支烟。就这样互相连名字也不知道，而现在比亲人还亲，点头告别。接着便是前进，去战斗！就算是演习，但是手里拿的是自动武器，而不是玩具；直升飞机也不是文化和休息公园里的娱乐设备。

谢尔盖还是怎么也不能从与坦克相遇中清醒过来，耳膜还在震动，由于排出的废气，嘴里塞着一团东西，但是他已经不感到自己是这样的受压、这样的孤独，就象几分钟以前那样。现在同他在一起的有直升飞机飞行员、捷克斯洛伐克空降兵和自己的班，而看了一下对面，右面一点，在另一个河流弯曲处，谢尔盖看到了一幅引人入胜的画面。当你从陡峭的岸上看着宽阔的河流的远方，而这辽阔的远方又仿佛把辽阔和安静倾注到了你身上时，就常会产生这样的感觉。一种无法解释的、胜利的节奏。

在左边，坦克、装甲运兵车、汽车，大胆地沿着保加利亚浮桥兵架设的、象梳子似的插在两岸之间的桥上开过。新的、大概是最大的动脉加入了战斗生活。从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代替车身的火箭轮廓耸立在汽车上，从这些汽车上可以感觉到无法抑止的力量。这些轮廓本身是清楚的和流线型的，好象吸附了整个装置，因此，似乎不是火箭乘在履带上跑，而是所有钉在火箭下面的东西，稍稍震动着轻便桥，同它一起浮动。

“好家一家一伙！”谢尔盖拖长声音说，并且已经完全欠身站

了起来，正当他忘乎所以的时候，机枪重新扫射的哒、哒声又使他想起水塔上的机枪。

“这个德国人在哪儿？”谢尔盖忽然想起。

“我被打死了，我怎么知道？”维亚佐夫用一双眼睛冷笑一下，又摸出下一支香烟。

第五章

“古登 塔格——白天好。沃尔连 维
尔 津金——咱们来唱一支。弗罗因沙弗
特——友谊。弗尔维尔茨——前进。楚柳
克——后退(希望不记)”

(摘自士兵会话手册)

在离谢尔盖班的士兵们隐蔽的小土岗几步远的草地上，露出了一顶象蘑菇圆盖一样的钢盔，谢尔盖看见了一张涨得通红的脸。两颊布满一道道沾满尘土的汗水污渍，嘴唇干裂，只有两只眼睛没有污染——灰绿色的，好象藏在叶子底下的一对醋栗。德国人激动地喘着气，微笑着。

“卡麦拉德，卡麦拉德……萨什卡莱赫茨。维尔格拉德阿乌斯。弗伊叶尔！”^①

“什么萨什卡？……我什么也不懂……费尔什泰尼希特！”^②

小伙子太激动了，激动得话也讲不清楚。其实他懂俄文，也许甚至比谢尔盖的德文还好。

① 同志，同志……萨什卡向右。我们向前。开火

② 我什么也不懂

“那边怎么样？喂，怎么啦？”谢尔盖钉着问。

德国兵用手指触触胸部：

“马因 纳迈伊斯特库尔特①。”

“库尔特？这很好……可是那边萨什卡怎么样了？”

库尔特抓起身边的一颗弹壳，在草地上划起来。喏，这儿是谢尔盖和他的士兵们。而这儿是德国兵的壕沟。那边是水塔、机枪。萨什卡要他转告，让谢尔盖用火力掩护，吸引注意力。而他，萨什卡，把德国人装在自己的装甲运兵车里，从右面迂回过去。明白了？

“伊希费尔什泰叶！”谢尔盖点点头，心里暗自感到惊讶，萨什卡多么简单地就想出了摆脱他们在十分钟前所陷入的困境的办法。

十分钟！自从惊慌失措的谢尔盖命令全班在小土岗后面躺倒起，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分钟。或者是相反，不是整整十分钟，而是总共只花了十分钟，萨什卡就到了德国人那儿，而库尔特就爬到了俄国人这儿。谢尔盖是无意中注意到这一点的：当他在象雷雨前乌云一样沉重的寂静中听到自己手表走动的声音时，表面上指着九点零五分，而现在是九点一刻。

“全班！……”谢尔盖鼓足力气，企图重新掌握自己的不听使唤的喉咙。“全班！向敌人火力点……短促连射……”

“弗伊叶尔！”② 库尔特突然喊道，并且第一个扣动了扳机。

自动步枪仿佛互相鼓励似的，不怀恶意地向水塔顶部射去。

“开火！”谢尔盖重复。于是射击过的空弹壳又冒着烟纷纷滚落到草地上。

水塔上没有回击，仿佛在思考，在猜测。用自动步枪向水塔

① 我的名字是库尔特

② 开火！

射击是毫无意思的，就让小伙子们闹着玩吧，反正子弹还没用完。但同时“蓝色”的人们显然感到不解：这里面是否藏有什么诡计？为以防万一起见，他们决定吓唬一下这些自动步枪手。塔上的小窗口闪了几次火光，空地上空重又传过来机枪的咯咯声。

“好，好！我们就要你这样！”谢尔盖高兴了，急切地向德国人的壕沟那边望了一望。亲爱的装甲车已经向右面开去，仿佛完全无视塔边的交火，用自己的全部姿态表示出这事与它无关，它另有任务。“萨什卡真狡猾！”谢尔盖钦佩地想。

办法是谁想出来的，这无关紧要。结果是正如连长喜欢说的那样：对头！也许，水塔上的机枪手终于也想到了，可是已经迟了：他已经怎么也无法用机枪火力去打到装甲运兵车了。即使他开的不是空枪，而是实弹，也已无济于事。

水塔上的小窗口火光熄灭了——机枪哑了。也许，它被搬到别的地方了？也许是全机枪班都集中去挡住了楼梯，不放任何人上去？

这样的时机不能错过——该站起来冲锋了。

“全班！”谢尔盖半跪着抬起身来，到这时他才感觉到泥地上的湿气。

士兵们跳起来，冲向水塔。

“乌拉—拉—拉！”响起了一个人的顽皮的声音。

“齐一些，齐一些！”谢尔盖督促着，突然感到脚上一阵剧痛，停住了。他用靴子后跟在地上一扫。奇怪，地上很平坦。但好象有人用一块热的煤块从他脚后跟一直烫到他心里。扭伤了脚底板？……懊丧的感觉压住了疼痛。真该死，恰恰发生在这种时候，简直要坐到地上哭出来。三年前也是这样，在足球场上，已经贴近球门了，前面只有一个守门员……

谢尔盖跛着腿走了两步，又停了下来。

“向前，伙计们，向前！我马上来！”他恳求式地向赶过他的士兵们喊了一声，又感到脚跟上一阵刀割般的剧痛，痛得他脸也歪了。

有个人从后面跳过来，从腋下把他搀住。

“不要紧，不要紧……一切都会古特，阿列斯古特①……”

“是库尔特？”

灰绿色的眼睛从钢盔下面鼓励地望着他。

“轻轻地，轻轻地，开步走……”

谢尔盖估计了一下：离开水塔约有一百米。一百次痛苦。

“丹克，丹克②，库尔特。不要紧，能走到……”

谢尔盖握着库尔特的手，突然感觉到他仿佛早就认识了这个库尔特。就好象他是隔壁连队的一个小伙子一样。可是他们其实还只刚刚认识。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服役的一年半里，谢尔盖当然会见过德国兵。他曾多次到过他们的兵营和俱乐部。谢尔盖热心地学习德语，因为用学校里学过的那些“丹克”、“比泰”、“古特”是说不了多少话的。可是对一切同“德国人”这个字眼有联系的东西还是常常在他心里引起模糊的反感，特别是在初期。而且这个字眼不知为什么最经常地是同关于战争的影片联想起来，而在这种影片中德国人是敌人，因为他们射击我们的人，吊死共青团员，烧光城市和村庄。对谢尔盖来说，“德国人”这个字眼还散发出绷带碘酒的气息。自从他懂事起，他的父亲从未和绷带分离过。

谢苗·达尼洛维奇从来，至少在儿子面前，从来不曾骂过德

① 古特——好，阿列斯——一切

② 谢谢，谢谢。

国人。但是在他身旁的气氛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诅咒，这种气氛也影响到谢尔盖。有趣的是，那个当年用火箭筒射击的德国人现在是否活着？他是谁，外表如何，现在在做什么？即使他已经在国会大厦附近的某个地方被打死了，可是他毕竟还是活在父亲的不眠之夜里，在这种时候，通常是下雪或下雨之前，这位前中士就咬紧牙关，在床上辗转反侧。他的呻吟声是一次致命的射击的回声，这次射击在二十五年前打倒了给了谢尔盖生命的这个人。

姑且假定，父亲那时被打死了。这一点在谢尔盖的脑子里简直连假定也没有地位。可是还是来假定一下！假使那个德国人打死了父亲，那就是说，谢尔盖就不会出世！这是简单的、简单得可怕的生与死的逻辑。而象父亲这样的人，在从莫斯科到柏林的战士公墓里，有多多少少啊！这些士兵本来也能成为父亲。就是说，被埋葬的不仅仅是被打死的人。就是说，战争不仅仅打死了两千万人。即使两千万被打死的人每人只增加两个生命，这个数字将是多么惊人。一个大国的居民！而且在法西斯的子弹下倒下的不仅仅是士兵，而是昨天的工人、农民、设计师、作家、地质学家——有着最美好的创造性的职业的人。而孩子们可能比父亲们更好。

尽管这不可思议，但是一片小小的、象蜜蜂一般大的弹片在一九四五年四月的一天里完全可能不仅打死父亲，而且打死谢尔盖。这样，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五日，在土拉州别列夫斯基区伊凡诺沃村，就不会生下一个同老卡什塔诺夫相象的男孩子。然而最奇怪的事还在另一方面。那片使父亲受到重伤的弹片，过了多年之后也碰伤了儿子。也许，那个扣动扳机的法西斯分子已经不在了。但是谢尔盖在这个世界上首先认识到的东西，就是灰色的象三月的溶雪一样的绷带。它们散发出一种刺鼻的气

味。而他第一次清楚地听到的字眼，就是在父亲弯曲的背上换绷带时的母亲带着哭声吐出来的：

“该死的德国人！”

谢尔盖当然不能肯定，这一些就是他童年时最最早的印象。而且谁能记得成年人嘴里发出来的、有时象密码一样难以理解的、简直象鸟叫一样的句子呢？孩子们所记得的自己幼时的事情，其实往往都是父母亲在后来告诉他们的，而他们也就相信了，还以为是自己亲自记住的。

母亲有一次带着忧郁的微笑告诉谢尔盖他在幼儿园时代提过的一个天真的问题：“妈妈，什么是该死的，什么是德国人呢？”

“那你当时是怎么解释的？”十七岁的谢尔盖问。

“我正确地解释了，”母亲叹了一口气。

那时候对十年级学生谢尔盖·卡什塔诺夫来说，“德国人”这个字眼已经不是一九四一年六月向着我们全国和每一个家庭扑来的那场不正义的灾祸的概括了。而后来发生的情况是，谢尔盖第一个看到的活的德国人是个士兵。

他丝毫不象孩子的想象所描绘的德国人，也不象战争影片用特写镜头映出的德国人。那还是在服兵役的第二周，普罗霍洛夫上校组织了一次两国军队的士兵们——邻居们的聚会。

谢尔盖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天。他和同志们一起站在营房门口等待客人。谢尔盖在等待奇迹，因为历史将进入这扇大门……

但是奇迹没有发生。德国土兵从容地从敞开的大门口走进来，就象我们的连队从外面参观回来一样。他们显然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他们走过来向他们认识的苏军士兵问好，就象昨天刚分别一样。谢尔盖畏缩地站在一旁，不敢迎上前去。但是萨什卡——他对一切都满不在乎——却不见了，忽然和一个德国

兵手拉手地从人群中钻了出来。

“认识一下吧！”他带着一种意味深长的样子，好象领来了一个姑娘似的，说道。“谢尔盖，彼得！”

谢尔盖害羞地伸出手去。

如果这个彼得不是穿着灰蓝色的德国兵制服——口袋缝在外面的上衣，白色的罗马字形状的领章和高高的有红色帽徽的制帽，——那么人们就可能以为他是萨什卡的老朋友。他甚至在某些方面同他有些象。也许是睫毛象，都是白色的，就象上面落上了雪没有溶化，而那个德国兵就老是眨着眼睛，想把它抖落。这频繁的眨眼动作使他的脸部表情善良而讨人欢喜。

谢尔盖竭力想起几个德国字，笨拙地说道：

“伊希谢尔盖。^①”

“伊希平彼得。^②”德国人高兴得脸上发光，摇摇谢尔盖的手。

“弗罗因沙弗特！”谢尔盖想起了在这种场合下十分常用的一个字，说了出来。

“友谊，友谊……古特！”彼得同意地点点头。

“谢尔盖，你不要开群众大会好不好，”萨什卡挖苦了一句。接着就毫无拘束地把香烟塞给德国人：“拉乌亨齐？”^③

吸了一会儿烟，沉默了一会儿。微笑一直没有从他们的脸上消失，仿佛另外有第四个人站在他们中间，引起他们高兴。萨什卡带着微笑同彼得下了一盘棋。彼得带着微笑在列宁室里看了照相簿。谢尔盖用手风琴演奏了圆舞曲《在满洲的山岗上》和《我爱你，俄罗斯》。不错，他在演奏时变得稍稍有点忧郁，然而毕竟还是用嘴角在微笑着。

① 我是谢尔盖

② 我是彼得

③ 吸烟吗？

他努力地按着琴键，深怕出错，同时不断向彼得投去小心的、带有难以掩盖的好奇的目光。尽管是卡姆拉德，可是毕竟是个德国人啊。而且是个德国兵。他的衣服的式样尽管现在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了，但也还是有点象谢尔盖多次在电影和彩色图片中看到过的那种制服。也许是因为颜色都是灰的，也许是因为肩章的形状……

正是在那个时候，象被鸟啄着心头一样，回忆起了散发着父亲绷带上碘酒气味的童年。在那四月的一天，当父亲跌倒在勃兰登堡门附近的时候，他能够想象过了二十五年后他的儿子将会和一个德国兵坐在一起，无忧无虑地拉着手风琴吗？而且，也可能这就是当年从水塔上瞄得准准地并且肆无忌惮地扫射普罗霍洛夫排的那个德国人的儿子。好吧，就算他不是那个德国人的儿子，那也是另一个曾经瞄准我们士兵的德国人的儿子。……

谢尔盖看着彼得，感到自己在下意识地，不由自主地竭力要从彼得身上找出与那些“父亲的”德国人那怕稍微有些相似的地方。不仅如此，谢尔盖还试图设想，这个眨着白色睫毛的小伙子如果用自动步枪瞄准他谢尔盖，又会是什么样子。

但是不论他怎样竭力想象，这张善良的脸和柔和的褐色眼睛无论如何也不能同银幕上看到过的那些戴着阴沉沉钢盔的凶恶嘴脸联系起来。相反，谢尔盖和他并排坐着拉手风琴以及彼得出神地用脚尖和着圆舞曲节拍这样的事实，使得他们相互亲近，消除了本来就很脆弱的隔膜。所以谢尔盖丝毫也不会感到惊奇，如果彼得忽然用纯粹的俄语说出焦尔金式的话来：“喂，谢连卡，别拉圆舞曲了，来一支那个……”

但是彼得沉默着。骑在椅子上的萨什卡也沉默着：他双手抱着椅子背，在全神贯注地思考着什么问题。这时谢尔盖特别

清楚地，仿佛眼睛突然增加了灵敏度似的，看清了他们两个人。他看到的不是彼得和萨什卡，而只是两个士兵，德国的和我国的，他们并坐在一起沉思着。彼得崭新的灰色制服上欢乐地闪耀着银色的纽扣。萨什卡身上也穿着崭新的上衣，不过是另一种颜色，砂土色的；金色的纽扣上五角星闪闪发光。在这不相象的制服中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可是究竟是什么，谢尔盖不知道。萨什卡和彼得并肩坐着，这里面有某种深远的意义。

谢尔盖多么想把自己同德国兵的首次会见告诉父亲！坦率地谈谈，交流交流思想！但是在家信中谢尔盖也是克制的：他害怕父亲会误解他。家里至今还存在着对战争的痛苦回忆，而他却——“德国兵万岁！”

但是，在谢尔盖的信中，这些隐藏着的电流大概还是冲破了绝缘体，——父亲总是通过半句话就能理解他的全部意思。尽管没有教训他，父亲还是劝告他要仔细。在有一封信里甚至相当明白地暗示说，友谊嘛，当然很好，可是士兵的友谊要通过战斗来检验。

谢尔盖只好笑笑：在最近的将来预见不到有战斗。

而现在这样的事竟发生了。尽管不是彼得，但库尔特也一样……

“萨什卡赢了，”谢尔盖说，但库尔特没有立即弄清楚这话的意思。直到装甲运兵车庄严地从水塔后面开出来之后，他才懂了。

事情办好了！穿着灰色制服的士兵——德国兵不慌不忙地从装甲运兵车敞开的座舱里走出来，他们是萨什卡给运来的。维亚佐夫班稍微迟到了一点点，只是一点点！如果谢尔盖没有扭伤了脚，是能够赶在前面的。

懊丧的感觉重又压住了疼痛。如果和假使……

谢尔盖撑在库尔特的手臂上，直起了身子。萨什卡挥舞着脱下来的钢盔，匆匆地迎面跑来。头上的淡白色头发很蓬乱，好象一棵向日葵离开了田畦，在田野上奔跑。

“你这是怎么啦，谢尔盖？”萨什卡的眼睛里的瞳人在狡猾地跳动。“您，班长同志，怎么搞的？您伤在哪儿啊？”

“算了，萨什卡，顾不上和你开玩笑，”谢尔盖阴沉地咕哝说。

他们三个人一起走到塔门旁边的一条长凳前。萨什卡帮助谢尔盖脱下靴子。

“有整骨医生吗？”他转身向聚在四周的士兵们问道。

“试试看不要紧！”库尔特用俄语说道，向谢尔盖俯下身子。他长久地摸着脚，用手指捏着。然后轻轻一扭脚底板。谢尔盖“喔唷”叫了一声。

“达斯维尔克洛勃特登马伊斯杰尔！”库尔特微笑了。

“事怕行家！”萨什卡翻译了出来，骄傲地向周围望望。

“泽尔古特！”库尔特满意地说，又把谢尔盖的脚板摇了摇。
“恩杰古特，阿列斯古特！”库尔特笑着说。

这句德国俗语连谢尔盖也听得懂：“结果好的一切，都是好的！”

驾驶员兼机械师皮亚特洛夫走过来。他胸前和背上都湿淋淋的——流了无数的汗水。他并不针对任何人地问道：

“塔墙上这些洞洞是哪儿来的？我怎么也想不通：我们不是打的空枪吗？”

大家都抬起了头。砖墙上乱七八糟地布满了子弹和弹片的发黑的痕迹。

“也许是战争遗留下来的？”一个士兵猜测。

“打得真厉害！”另一个补充。

“有趣的是，当时谁在这塔里，是我们的人还是德国人？”

“当然是德国人……”

“也可能是我们的人吧?”

“多伊切卓尔达坚①……”

“卓维也季舍②……”

大家重又沉默了。皮亚特洛夫翻翻衣袋，摸出一只子弹壳。不是亮晶晶的，刚刚射击过的——这种弹壳这里地上多得很，——而是老的，生着绿锈的。他把它放到了手心上。

“看，”他说：“装甲车在刹住时，轮子把它从土里翻了出来。不知道是我们的还是不是我们的？”

于是大家又看看弹痕累累的砖墙。

他们还不知道一九四五年四月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到后来，七个排——每个兄弟国家的军队各出一个排——列队站在一座老的士兵墓旁边。这就是在列兵谢尔盖·卡什塔诺夫指挥下的维亚佐夫中士的班在遭到机枪火力封锁时赖以隐蔽自己准备进攻的那座小土岗。在这次仪式中，普罗霍洛夫上校命令萨哈罗夫大尉的士兵们代表苏军。谢尔盖和萨什卡并肩站在第一排，面对着小土岗。

这时他们才知道，普罗霍洛夫对刻在大理石墓碑上的名字：“西穆什金，利亚比宁，柯利亚金，扎伊宁，巴林……”有着多么直接的，甚至名副其实的个人的关系。只不过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上校是个年轻的中尉时的样子。

七个排，七国军队的全权代表，穿着不同的制服，在不同的军旗下一动不动地站着。谢尔盖怎么也瞧不见波兰人；他觉得，在侧翼那边，阿达姆·列姆巴契在张望。远远看去，他的暗色钢盔同其他钢盔混在一起，非常象叶日。

① 德国兵

② 苏联的

“不要伸出头来，卡什塔诺夫！”萨哈罗夫大尉生硬地喝住谢尔盖。

几乎与此同时，乐队慢慢地演奏起来。根据最初几个音符就可以猜到——这是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仪式严格地遵守俄文字母表的顺序：下一个国歌将是匈牙利的，接下去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依次排列。在演习的日子里，士兵们几乎每天都听到这庄严的音乐交流。谢尔盖现在能准确无误地听出，乐队在歌颂哪一个国家。不论这强有力的旋律是多么庄严，甚至是一本正经，它们毕竟以某种东西表现了一国人民的活的灵魂。不论在欢乐的时刻，还是悲哀的时刻，人民都用统一的呼吸重复唱着这些旋律。

谢尔盖仿佛学会了“看到”这种音乐。但是看到的不一定是保加利亚，或者比方说，波兰。他想象出盖满绿色森林的高山，山谷中水流湍急的河流，城市的街道两边栗树上盛开着白花。还有人们，人们——脸色愉快开朗的人们在山谷中走，在河岸上走，在春天的城市街道上走。在经过日晒风吹的脸上写着一种对生活的异乎寻常的爱和欢乐。仿佛他们全都面向着太阳。随便走到这些人中哪一个的前面，他们都能了解你，即使不懂语言。他们会了解你，会向你微笑，并伸出手来——坚实的手，手掌干而发糙……

只有苏联国歌谢尔盖是用具体形象来领会的。随着第一个音符自由活泼的流动，谢尔盖的眼前出现了红场——半夜里的红场，克里姆林宫上空的宝石星发着神采奕奕的光芒。他有一次曾经想到，如果音乐不是已经用音符来表示，那么我们的国歌本来可以用克里姆林宫永恒的宫墙和列宁的陵墓来记录，没有列宁墓的雄伟沉静的侧影，就无法想象红场以及红场上闪现出从过去流向将来的那条大河的钢铁色波纹的方形巨石。谢尔盖

把这一切想象得如此清楚，以致他觉得听见了有礼貌的汽车喇叭声，——当它们还没有被禁止的时候，全国都能在半夜前安静的时候听到它们从红场上传来。根据这些谨慎的、仿佛用孩子的喇叭吹出来的声音可以断定：莫斯科还没有睡。

谢尔盖用眼睛斜视着乐队，欣赏着起劲地挥舞戴白手套的双手的乐队指挥，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各国国歌连起来演奏，它们听起来就会象是一支统一的国歌——有一种异常光明的基本调使它们非常一致，象用一根线把不同的旋律联结了起来。于是他的心里就象过节一样。

谢尔盖用立正的姿势站着，甚至扭伤了的脚也没有松劲过一秒钟。当乐队指挥仿佛是压灭了铜铙抖动的余音，向士兵队列急剧地转过身来时，谢尔盖只是松了一口气。

“稍息！”萨哈罗夫大尉迅速作出了反应。

军官们慢慢地向墓碑走来。萨什卡的敏锐的眼睛立即就辨别出了肩章上的各种星星。

“全都是首长，”他向谢尔盖低声地说。而谢尔盖已经发现了普罗霍洛夫上校。

脚又痛起来了。它马上又开始发痒，仿佛故意配合他回忆起冲锋时的失败。不错，伙伴们没有说什么，但他们大概是对他的失望的，他们本来对他的期望要大得多。如果不是萨什卡，如果不是他爬向德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一切会怎样结束。最可能的是仲裁人会把整个班都取消掉。

这个精神上的痛苦比脚上的痛苦更剧烈，使得他心神不定。普罗霍洛夫肯定已经知道了他的失败。办事认真的萨哈罗夫简直不能够也没有权利隐瞒这类事情。而且上校也可能从高地上亲眼看到了这一切。

但是更使谢尔盖感到不知所措的是萨哈罗夫的行为。他既

没有用语言，也没有用神态来指责谢尔盖。相反，在塔旁的时候，他走近谢尔盖的身边，握了握手说：“好样的！当机立断，太好了！”这些话使得谢尔盖简直浑身不舒服。索性还是骂他一顿或者给他一个处分倒更好些。

……军官们在离士兵合葬墓十步左右的地方停了下来。普罗霍洛夫上校向前走出来，用眼睛扫视了一下由七个排组成的队伍。

谢尔盖低下眼睛，深怕与上校的目光相遇。

“同志们！”普罗霍洛夫嘶哑地，不是用指挥官的声调开始说话，大概他激动了。但是了解到后排的人可能听不清他的话，他提高了声音：“同志们！在这里，就是这个地方，一九四五年的四月里曾经发生过一次战斗，这次战斗中牺牲了……”上校转向大理石板，他的眼睛扫过一行行的姓名。“这次战斗中牺牲了许多非常好的小伙子，他们和你们现在同样的年龄。”

在静静地站着的各个排里，象根据命令一样，同时响起了翻译的声音。上校好象害怕他们会吃掉他的话，就停了一会，接着用更慢的、更从容不迫的语调继续说下去：

“他们那时候的年龄，同你们现在的年龄一样。他们也象你们一样年轻、强壮和漂亮，但是法西斯……对，正是法西斯夺去了他们的生命。”

上校停顿了一下，好象突然警觉起来似的，急忙向翻译们说：

“不完全是这样。不是那么回事……请你们翻得更准确些：他们……”普罗霍洛夫指指大理石碑。“他们在同法西斯主义斗争中献出了生命……至于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你们是知道的。应当知道，有责任知道……”他又沉默了一会，寻找着字眼。“三十年前法西斯分子想要征服全世界。你们的父亲们中间有许多人

亲眼看到过希特勒怎样实行自己的吃人计划。而你们则至少可以根据法西斯给自己树立的‘纪念碑’在这方面作出判断。虽然那时候法西斯自己并没有想到是在树‘纪念碑’。我指的是布痕瓦尔德、马乌特哈乌森、达哈乌、奥斯维辛……”

上校激动起来，翻译们现在勉强才能跟上他。

“但是结果，社会主义拥有更强大的武器来保卫自己。侵略的第一步就已注定了希特勒的灭亡……他想扭转历史的车轮使之倒退，而结果恰恰相反：各国人民的手使这个车轮向前滚动得更快了。而现在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一个国家，而是许多国家，一个巨大的大家庭，劳动者的兄弟联盟。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阶级的兄弟联盟。而你们则是这个兄弟联盟的盾牌……”

普罗霍洛夫又看了看墓，变得忧郁了些，用发抖的声音说道：

“要是这些伙伴们活着的话，他们看到你们该会是多么高兴啊……让我们记住烈士……”

从七个排里各走出一个士兵，他们用整齐的脚步走近墓碑，排成一行。从肩上脱下自动步枪，枪口向上举起。

七支枪象七支蓝钢色的蜡烛，枪筒上吐出热的火舌，枪声同时响了起来。又是一响，又是一响……射过的弹壳碰到大理石板，发出叮咚的响声。……

军官们从右侧开始检阅队伍。当他们走近萨哈罗夫大尉的排时，谢尔盖只有一个唯一的愿望——钻到地里面去。

普罗霍洛夫上校和一个从肩章看来十分高级的德国军官一起走着，并且直盯着谢尔盖看。

萨哈罗夫大尉立即飞出队列，向前迎去。

“稍息，稍息。”普罗霍洛夫让他冷静下来，站停了，用注意的目光盯住谢尔盖。

谢尔盖感到，自己的脚，特别是痛的一只脚，真的开始向地里沉下去了。上校叫了他的姓。而且不仅是叫了姓。谢尔盖最害怕的正就是这个——叫出队列。

“列兵卡什塔诺夫！”好象塞了棉花的耳朵里传来了声音：“出列！”

谢尔盖机械地，好象在队列操练课上一样，用背熟的动作双脚不弯地向前跨了一步，立即全身僵硬地向后转。

“多么难为情，多么可耻……真的，能钻进地里去现在真是最大的幸福了！”

但是耳朵简直不能相信听到的话了。这是在说谁？哪一个卡什塔诺夫？普罗霍洛夫的话好象是从河的对岸传到谢尔盖这里：

“由于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由于主动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人民军的分队组织协作，我宣布向列兵卡什塔诺夫致谢意，并授予他上等兵军衔……”

“这是什么？怎么可以？应当立即解释！”谢尔盖的太阳穴上突突跳。

“上校同志！搞错了！”他想这样说。可是挤出来的是操典规定的话：

“为苏联服务！……”

并且笔直地伸出手去握上校已经伸过来的手。

“好样的，卡什塔诺夫！”普罗霍洛夫双眼放光，说道。“好样的，要保持这样。可惜你父亲没有在这儿。”

上校的背后出现了德国军官的肩章。

“古杰尔卓尔达特伊斯特卡什塔诺夫，古杰尔卓尔达特伊斯特施坦因加尔特①，”他说。

① 卡什塔诺夫是个好兵，施坦因加尔特是个好兵。

谢尔盖抬起眼睛，忽然看见库尔特就难为情地站在旁边。他怎么没有立即就发现他呢？还是库尔特刚刚才走过来？

这样，在普罗霍洛夫、德国军官和库尔特的目光面前，谢尔盖觉得他的退路被切断了。现在不可能再说出真相，因为真相会破坏这三个人的欢乐和大家的情绪。

只有谢尔盖一个人能看到的他和他的排之间的鸿沟裂得更宽了，当上校感动地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你们要象卡什塔诺夫和施坦因加尔特一样服役，你们要象谢尔盖和库尔特一样友好相处……就不会再有这样的方尖碑……”

这时谢尔盖忍不住了：

“上校同志！”他说，竭力使声音变得坚定。“我在这里面毫无作用。一切都是列兵土林组织的。是他向德国人爬去……还有施坦因加尔特……”

上校称赞地笑了笑：

“当然，你没有忘记别人，这很好。土林完成了你的命令，应当得到荣誉和赞扬。归队吧，土林的问题由连长考虑。我不想剥夺他的这样做的可能性。”

谢尔盖向排跨了一步，几乎就顶住了萨什卡的胸部。萨什卡的脸是这样贴近，以致于只看得清他的两只眼睛。眼睛特别大，瞳人象两只黑色的小雷达，发射出快乐的光芒。

“解散！”萨哈罗夫的声音不象命令，而是好象在唱歌。

第六章

“整个世界发出
被蛆虫蛀蚀的白骨的响声，

整个世界在我们的
进军面前发抖。”

(摘自库尔特的父亲在1941年唱的歌)

“我宣誓：作为国家人民军的士兵同苏联军队和与我们联盟的社会主义各国军队肩并肩地随时准备保卫社会主义免受一切敌人的侵犯，为达到胜利不惜自己的生命。”

(摘自库尔特的军人誓言)

不论是战争还是演习，通常都用检阅来结束。区别在于，在前一种情况下用欢庆的步伐通过的只是胜利者。而演习后的检阅则对全体参加者来说都是节日。

这个节日，对谢尔盖和萨什卡来说，从萨哈罗夫大尉向他们信任地透露了一个消息之后就已开始了，那时他看来刚从理发室里出来，容光焕发，散发出一种名牌花露水的香气。

“看来是结束了。上校命令接待客人。而后天就是检阅。”

在搭起了帐篷的营地里，将要有保加利亚人、捷克人、波兰人来到。当然还有德国人。而且据了解，将从库尔特所在的那个分队里来。就是说，老相识！而接待朋友比一般地接待客人要愉快得多。

但是在自己部队驻地接待是一回事，那儿有俱乐部、食堂和一切所需要的东西，而在帐篷营地里接待又是另一回事。这里没有多少施展的余地。

“总之是这样，”萨哈罗夫仔细地听了这些议论之后说。“哪怕鼻子流血，客人一定要好好接待。一定要安排：第一——障碍赛跑，第二——文娱余兴节目。在接近于战斗的环境里也要善

于搞这个。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有个想法！”萨什卡叫起来。

这个想法几乎是天才的，因为解决了俱乐部的问题。萨什卡建议利用帐篷，更准确地说，是利用帐篷前的空地作为舞台。而帐篷本身则充当后台——拉开帐篷布，出台吧。

“嘿，土林，你真是个合理化建议者，”萨哈罗夫大尉夸奖道。

至于观众厅，他在同一个方案里也用最经济的办法考虑到了。在帐篷前面埋下一个个树桩子，桩子上铺上木板条——就成了正厅池座，你要多少排都可以。

“我同意！”萨哈罗夫说。“开始执行吧。我任命土林为工地主任。”

“是！”萨什卡狡猾地向谢尔盖那边瞟了一眼。“我有权指挥上等兵卡什塔诺夫吗？”

“根据工作需要去解决。”大尉挥挥手……

自从在战死士兵的墓碑前的那次仪式之后，在谢尔盖和萨什卡之间确立了一种奇怪的关系，这种关系使两个人都感到不称心。表面上一切同过去一样，可是某种说不出的惭愧感觉压迫着谢尔盖。萨什卡感到了这一点，也默不作声，等待着他们之间将要进行的一次十分重要的谈话。因此每个人都由于各自的原因下不了决心互相靠近。

土林的方案被委托给维亚佐夫班来完成。但中士本人因别的事情离开了，让新上任的工地主任享受拥有全权的欢乐。

小伙子们干得很欢。全部十二排长凳都已钉好，剩下的只是，用萨什卡的话来说，清扫绿色的地毯——乱糟糟的沾满泥土的草被他想象成地毯，——这时突然出现的维亚佐夫中士用邮递员的腔调命令道：

“卡什塔诺夫！跳舞吧！”

谢尔盖莫名其妙地转过身来——开什么玩笑呢，邮件早就来过了，没有他的信。其余的人都丢下了斧头和铲子，也很感兴趣地看着中士。

“跳舞吧，跳吧！”维亚佐夫重复说，他停顿了一下，在这种场合下照例都要卖卖关子。他看到谢尔盖完全没有准备跳舞的意思，就透露了自己带来的意外喜讯：“你的父亲要来了，卡什塔诺夫，和上校一起来。部队值日的人说的。刚刚从城里来了电话。”

谢尔盖脸上放出了光彩，但什么也没有回答。有个人羡慕地拖长声音说：

“小伙子真走运……”

斧头重新响了起来。

有什么可说的呢，在这一点上谢尔盖的确是运气好。一星期前，当他和父亲分别时，他没有希望能和父亲在这儿德国作第二次会见。前面有演习，任何人，甚至普罗霍洛夫上校也说不出结束的日期。在这段时间里谢尔盖已经向家里寄了两封信——根据他的计算，这两封信将恰好在父亲回家时收到。因为谢尔盖确切地知道，根据旅行证上的期限，父亲要在后天离开柏林。就是说，他们之中有一个人设法找到了另一个——也许是父亲找到了上校，也许是上校找到了父亲。最可能的是上校俘虏了自己的老朋友，用自己的汽车把他带到这里来。否则老卡什塔诺夫没有任何途径可以到儿子处来。

“谢连卡，丢掉铲子吧！”萨什卡说。“拿起手风琴，练一练。在这位观众前面不应该把音乐会搞坏。”

萨什卡不带点挖苦是不行的。……

“你怎么，是真的吗……关于手风琴的话？”谢尔盖不信地追

问了一句。

“对你说过了……”萨什卡的脸上是一本正经的。

这时，他们之间仿佛又有什么东西断了——两人都不再作声。萨什卡大概想到了同一件事情，于是就象继续着没有说出来的思想一样，随随便便地说道：

“库尔特也走运。离这儿两公里处有一个小镇。你记得吗，我们曾经过……还给装甲运兵车加过水。这地方就是库尔特的老家。他的父母亲都在那里。好象还有一个妹妹。也许他们也会到我们这里来。”

普罗霍洛夫的“小嘎斯”在“音乐会”的帐篷旁边打了一个猛烈的急转弯。在谢尔盖旁边象钉住了一样停下。车门格吱一响，父亲呼哧着从汽车里爬出来，而上校在前座上没有动：

“谢苗·达尼洛维奇，你去归你的儿子领导。我等开音乐会时再来。”

谢尔盖激动地跨上前去，但还是不敢拥抱父亲，怕难为情。全班象根据口令一样一齐向他们转过身来，甚至把铁铲举在手里，就象仪仗队一样。

“喏，咱们又见面了，儿子，”谢苗·达尼洛维奇说，眼睛闪着光芒。“你们就把我编入名册吧。也许，收我做个超期服役的兵，啊？”他向士兵们说。

“这个，您得向您儿子打个报告，他现在是我们的大首长了，”萨什卡向朋友们眨眨眼睛。

老卡什塔诺夫只是到现在才注意到谢尔盖的肩章上有新缝上去的横道道。

他用手在肩章上摸摸，——完全还是新的，没有在枪皮带下面压过。

“立了什么功劳，儿子？”

谢尔盖一时想不出话来回答：

“这个……由于演习……”

“好吧，”谢苗·达尼洛维奇摇摇头，“我自己是个士兵，我知道，不论是横道道，不论是星星，不论是勋章，都不会是由于眼睛生得漂亮而发给的……”

当人们还在继续做长凳的时候，谢苗·达尼洛维奇站在一边，一根接一根地抽香烟。他感到自己很拘束，就象那一次在普罗霍洛夫家的餐桌上一样。而且谢尔盖走掉了。他在父亲手里塞了一包香烟，抱歉地说：

“爸爸，你坐一会，休息休息，我要去准备音乐会……”

土林走过来，象老相识一样亲近地说：

“您最好坐下来，谢苗·达尼洛维奇，趁现在位子还都空着。我作为俱乐部主任给你第一排第六座。”

当然，并没有标明任何座位号码。但是老卡什塔诺夫满意地接受了这个玩笑。

他还没有坐下，就听到了一个人的兴奋的声音：

“哎，又有客人来了！请进，同志们，请进！”

一群穿着崭新灰制服的士兵——几乎有一个排——大声地说笑着从最边缘的一座帐篷后面转出来，走上了营地内的小路。他们看上去甚至有点故意打扮，卡什塔诺夫从他们说话的嘈杂声中听到了一种熟悉的，很久以前就听到过的东西。而且在这些士兵的整个外形中也有着一种这样的东西……

谢苗·达尼洛维奇解开了衬衫领，松了领带。

士兵们不是排着队伍，而是完全象老百姓一样成群走着。前面的回过身去，明显地表示出愿意给某个人让路。当他们走近的时候，卡什塔诺夫明白了，他们这样亲切地四面包围着的是个什么人。他看见了一个穿深蓝色西装的上了年纪的人。从外表

看来将近六十岁。稀疏的，梳向一边的灰色头发不能盖住秃顶。在浓密的已经有些花白的眉毛下面是疲倦的、水汪汪的蓝眼睛。男人慌张地微笑着，用没有自信的步子走着。卡什塔诺夫往边上让了让，退向帐篷。但这时萨什卡象一条破冰船一样冲进人群，一个个地同人握手，接着在卡什塔诺夫的对面就已经立定了两个人——穿着德国士兵礼服的小伙子和穿着深蓝色西装的男人。萨什卡象在拳击场上站在拳击选手中间的裁判，拉住了他们的手。

“认识一下，谢苗·达尼洛维奇！这位是库尔特，谢尔盖的朋友。而这位是库尔特的父亲——汉斯。”

“卡什塔诺夫，”谢苗·达尼洛维奇伸出手去。

不由自主地他暗暗发现：库尔特的握手是软的，客气的；而汉斯的握手是紧的，信任的。

“谢尔盖的父亲！”萨什卡尊敬地强调说，看了库尔特一眼，点点卡什塔诺夫的胸口。

“古特，古特！泽尔古特！”库尔特和汉斯一齐点头，用整个姿态表明他们非常明白萨什卡介绍他们认识的是个什么人，而且不仅明白，同时对这次相识非常高兴。

“你们坐在一起！”土林建议。“就在这条凳上。马上就开始了。”

他们坐在第一排。老卡什塔诺夫被夹在库尔特和他父亲当中。谢苗·达尼洛维奇不灵活地撑起肘部，碰到了邻座的汉斯，抱歉地看了他一眼。

当他们目光相遇的一刹那，卡什塔诺夫抖了一抖：他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副眼睛。不，不是眼睛，而是眉毛——笔直的，在鼻梁上面连起来，象飞鸟的翅膀一样向两边伸开。但是在什么地方呢？什么时候？不过，生着这样的眉毛的人可多着呢——

谢苗·达尼洛维奇挥开了这个奇怪的念头。

但同时在脑子里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有趣的是，这个汉斯在俄国作战过吗？如果作战过，那么，在什么地方？”

萨什卡的声音打断了卡什塔诺夫的思路。他宣布，音乐会要稍晚一些举行，现在建议客人们观看克服障碍的竞赛。

这条障碍地带显然是临时造成的。卡什塔诺夫好奇地仔细看着壕沟，坑，坑上面架着一条木头，铁丝桩，墙。较远的地方矗立着象被炸毁的桥的桥架一样的东西。

看着这些匆忙搭成的、象某种不同寻常的马戏场的建筑物，卡什塔诺夫发现，自从他复员以来，“冲击地带”的长度增加了许多，而且难度也更大了。

“技术归技术，”谢苗·达尼洛维奇想。“可是对活的人摆上了这许多带刺的东西，仿佛明天要带着长矛到丛林深处去打老虎……原来，那怕你有三硝基甲苯炸弹，那怕有氢弹，可是一切还是压在士兵的双肩上。肩上和腿上的力气还是象以前一样需要。”

障碍地带在等待自愿参加的人。在堑壕旁边放着早已准备好的自动步枪，小桌子上秒表在闪光。

“谁愿意，请！”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士把秒表放到自己的巨大的手心里，似乎在掂着份量。

虽然大家知道，竞争者早已预定，在各排座位上还是开始骚动起来。冠军们是大家知道的。不错，他们和一般的凡人的差距不过是几秒钟，可是这是什么样的几秒啊？

“谁愿意？”中士重复自己的号召，不知为什么看了库尔特一眼。

“有！”库尔特用俄文说，不慌不忙地、摇摇摆摆地向堑壕走去。

“小伙子要把制服弄脏了……”卡什塔诺夫不安起来。但中士塞给库尔特一套工作服，这套衣服看来已不止一次地派过这种用场。库尔特立刻把它套在身上。

汉斯吸着了一支香烟，咳嗽起来。

“瞧，瞧……”卡什塔诺夫感兴趣地说。

库尔特已经齐胸立在堑壕里，等待着。

中士举起手，走向前面，就象音乐会上的报幕员一样，宣布道：

“列兵库尔特·施坦因加尔特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人民军表演！”

各排里发出赞扬的鼓掌声。

“准备！”中士喊了一声。

等了半分钟，捏住秒表的手一挥：

“前进！”

库尔特从堑壕里冲出来，而与此同时，汉斯焦急地从观众人丛里向前跨了出来。虽然只跨了半步，但卡什塔诺夫注意到了这一点。

库尔特开始得很敏捷。他轻松地跑过坑上的横木，就象芭蕾舞女演员一样，靴子只是稍微接触木头。然后高抬两腿，越过了所谓“鹿砦”，一次也没有碰到带刺的铁丝……囁地跳过了一条小沟，扑倒在地上，钻进一条曲折的坑道，爬了过去。

“机伶的小伙子！”卡什塔诺夫作出评价。

士兵们不知不觉地伸向前去，期待着。

“议事日程上的问题是——谁战胜谁，”萨什卡企图说句俏皮话。“或者是障碍地带战胜库尔特，或者是库尔特战胜障碍地带……”

但是卡什塔诺夫似乎没有听到他的话。不知从哪儿来的一

层薄膜遮住了眼睛，使他看不见障碍地带和库尔特。在他眼前出现了勃兰登堡门。“如果在那里也是这样，俄国人和德国人……在门附近也是这样，在给水塔附近也是这样……把机枪放在一边，而谁战胜谁——在障碍地带来解决……不，到那时候组织体育竞赛已经晚了。留在后方的城市和乡村的废墟不允许，在三夹板做成的红五角星下面的千万个坟墓所发出的沉默的‘报仇！’号召禁止这样做……那些德国人是不能宽恕的。”

当然，德国人是各种各样的……谢苗·达尼洛维奇在这里的各处地方已经旅行了一星期，德国已经认不出来了。从前，德国在他面前只有一种颜色——士兵军大衣的灰色，只有一种声音——炮弹和地雷的声音。而现在，土地好象仍是这一块，可是人是另外的人了。仿佛一下子把可怕的部落赶走了，清除出去了，搬进了完全另一种——愉快的、勤劳的、生气勃勃的——人民。但是其实关键正在于，人还是那些人，其中有不少的一部分曾经在军乐声中前去征服俄罗斯……究竟是什么样的毒药迷住了他们的头脑和心灵呢？

一星期的游历——当然是少的。可是卡什塔诺夫终究还是看到了一些东西。人们说得对：对于双手不回避劳动的人，是用不到花很多时间去解释的。有一件事好象是个细节，但不论你走到哪里，到处都有一个词来欢迎你，这个词是老少皆知的。

他们的一组人来到发电站的汽轮机大厅。大厅里从一部发电机到另一部发电机之间的整个空间挂着用俄文和德文写成的大横幅：“友谊——弗罗因沙弗特！”这个标语不是昨天才挂上的，不是为了迎接旅行者。工厂是德国和俄国工人共同建造的。

厂长长时间地陪同他们参观车间，热情地介绍情况，仿佛他们是来这里工作的一样。好人！所以尽管谢苗·达尼洛维奇有一个早就在折磨他的问题在舌头上打转：那个厂长是否在东方

战线作战过——根据年龄来判断，这是完全可能的——可是他不敢问。好象提这样的问题不对头。地点不对头，时间也不对头。

可能是库尔特迟缓下来了，可能是他滑了一下——观众立刻有了反应，人群里传过一阵嗡嗡声。但是卡什塔诺夫的眼光好象从旁边滑过，他什么人也没有看见，什么声音也没有听到。

……在一个合作社里，谢苗·达尼洛维奇也不敢问一个和自己年龄相同的人，他在战时做过什么。这人名叫保尔，是个农民，同所有的人一样，好象是住在邻近的村庄里。大概是叫斯内霍夫村吧。他身上发出机油的味道，一俄里外也能闻到。一直在拖拉机上工作。

谢苗·达尼洛维奇忍不住了，求得同意后就自己坐上了拖拉机，——这事是他做惯了的——在收割过的田地里耕出了三条犁沟。痛快！而且犁下面的土地同从前挖战壕时工兵铲子下面的土地完全不同。这是和平的土地，亲切的土地，就象我们的一样。而那战时的土地是凶恶的——它保护有的人避过子弹，有的人则不保护。

合作社的土地是好的，在这样的土地上只要不吝惜劳动，什么东西都能长出来。因此，在它上面，在这块最最善良的土地上面，怎么能问起战争的事来呢？

德国人各有不同，这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在前线上也各有不同。一种人向着你开枪，在雪地上拖着赤脚的小姑娘——女共青团员走向绞架，而另一种人……

只是在这里，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谢苗·达尼洛维奇才得知，原来有过这样一个人——苏联英雄弗里茨·什缅克尔。他

是个德国人，可是是我国的英雄……

在飞机上和卡什塔诺夫坐在一起，后来在旅馆里也住在一起的那个小伙子，在什么地方搞到了一本用俄文出版的小册子，给了卡什塔诺夫。谢苗·达尼洛维奇通宵没有合眼。

一九四一年秋某一天，当法西斯分子已经准备在红场上阅兵的时候，希特勒陆军第四军第一八六步兵师第一炮兵团的上等兵弗里茨·什缅克尔脱离了自己的部队，参加了“消灭法西斯”游击队。弗里茨翻译成俄语，几乎就是费多尔。他的父亲叫保尔。因此，这样的人应该称呼为费多尔·巴维洛维奇。但在游击队员们中间弗里茨成了伊凡、瓦尼亚、瓦纽沙、伊凡·伊凡诺维奇。

卡什塔诺夫最感到惊奇的是什缅克尔的洞察力和他的无产阶级觉悟——没有别的原因。红军在后退，而他，什缅克尔，却掉转枪口对着胜利者，在一个钟头之前他还和他们在同一队伍里。就是说，他看到了自己的真正敌人不是俄国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这些人和他一样是工人，他的真正敌人是希特勒，戈培尔，以及他们的走狗们。而奇怪的是，游击队员们也真的相信了他，称他为伊凡，仿佛在精神上同他结成了兄弟。瓦尼亚，什缅克尔成了机枪手。

法西斯的战地宪兵团悬赏收购什缅克尔的头，任何俄国人凡拿什缅克尔的头来献的，将得到八公顷土地、一座房子和一条奶牛，而任何德国人将得到二万五千马克和两个月假期。可是没有用……瓦尼亚也不怜惜敌人。他用手提机关枪工作着，象真正的游击队员一样。不止一次地把队伍带出陷阱，用最后一发子弹掩护同志。当什缅克尔得到红旗勋章时，他骄傲地回答：“为苏联和我的祖国的解放事业服务！”

卡什塔诺夫在一个德国小城里的什缅克尔街上走过。在行

人中间他可能迎面碰上这位英雄的儿子和孙子们……

德国人是各有不同的，非常不同。在同一个城市里，卡什塔诺夫从报亭里买了一份我国报纸。有一篇小小的报导《密林中的变形人》，可是其中每一个字都象战时的警报声。

“包哥大（塔斯社）。一个象希特勒刽子手博尔曼的人昨天在离厄瓜多尔边境不远的密林里被哥伦比亚警察逮捕。把战犯的照片同这个在密林中被扣的人的照片仔细对比，发现了许多相同之处：他们都是中等身材，脸部特征实际上一样，如果考虑到这两张照片相隔了二十五年以上的话，两个人的右眼上面都有一条伤疤。据认为，这个顽固的纳粹分子曾不止一次地做过改变外貌的手术，可是人们估计，他始终不能摆脱掉伤疤。”

四分之一多世纪来一直在找寻这个被纽伦堡法庭判处死刑的人。卡什塔诺夫希望能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把他放进笼子里，对整个地球上的人说，特别是对青年们说：“你们看，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化石！”而在笼子上，就象在动物园里一样，要钉上一块有简短说明的小木板：吃什么，想什么，住在什么地方。作为例子，可以从博尔曼亲手制订的纳粹的纲领中摘出一段：“斯拉夫人应当为我们工作，如果他们不再为我们所需要，他们应当死。斯拉夫人不应生育。教育是危险的。只要他们能够数到一百，就足够了，只有把他们变成有用的奴仆的那种教育才是能够接受的。我们把宗教给他们留着，作为一种解脱的手段……我们德国人是主人。我们应当处在第一位……”

“停！”中士叫道。“时间！”

库尔特满脸通红，浑身沾满泥土，仿佛是他自己挖了这许多坑和沟一样，向人们走回来，竭力保持着均匀的脚步。但是胸部在宽大的工作服后面起伏着，看得出他很能控制呼吸。

“达到我们连的纪录，”中士用难以掩盖的遗憾表情下了结论，为了更有说服力还用一只手指敲了敲秒表的表面。“恰恰一样……”

“下一个谁来？”他用搜索的眼光扫视着士兵群，问道。

谢苗·达尼洛维奇也向四周看看，惊讶地发现人多了。他分不清外国军队的区别标志，但猜到了周围立着的是保加利亚和波兰的士兵。他们吸着烟交谈着，样子好象都是从同一个营房里来的。

“下一个我来？”卡什塔诺夫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从人群中走出已经穿上工作服的谢尔盖。

“您的孩子！”汉斯碰碰他的手臂。“您的孩子，”又重复了一下，仿佛是要让卡什塔诺夫高兴，因为他认出了谢尔盖。

“是的，这是我的儿子！”谢苗·达尼洛维奇说，同时心里想：“这个德国人怎么俄语说得这样好，从哪儿学的呢？”

谢尔盖跳下堑壕，立定等待口令。

“何必呢，谢连卡，”萨什卡这时又钻过来立在旁边说。“何必呢……他的脚扭伤过。”

“怎么扭伤过？”谢苗·达尼洛维奇不安起来。

“这个么，是劳伤……总的说来，当然没有什么了不起，”萨什卡企图刹住这个话题。

可是卡什塔诺夫却激动起来，甚至连中士发出的“前进！”口令也没有听到。他看见谢尔盖时，谢尔盖已经在曲折的坑道地爬了，用皮靴的后跟抵住滑溜溜的、潮湿的草。谢尔盖弯下身子，象一条爱顶撞的小牛，仿佛是真的要去撞墙似的，忽然冲过去一脚踢在墙的板上，趁势飞了起来，轻轻地跳到另一边去了。

“加油！”萨什卡又跳又喊。

但是在象征被破坏了的桥梁的木头前面，谢尔盖不知为什

么放慢了速度，好象胆怯了似的。

“故意的，这坏蛋，在拖延，”萨什卡说。“拖延时间，为了不赢库尔特。”

“你不是说，他的脚……”卡什塔诺夫不相信。

谢尔盖真的不慌不忙地瞄准着向一座木板房子的正面丢了颗手榴弹，跳进窗口，用刺刀捅了一个假人，跳进了终点的壕沟。

“卡什塔诺夫输给施坦因加尔特六秒钟！”中士用电台广播员的声调无情地宣布。

“要知道脚有伤啊！”谢苗·达尼洛维奇差一点出来干预，但及时控制了自己。

谢尔盖走过来，情绪丝毫没受影响。他迎住父亲的目光，耸耸肩，好象在说：不要紧，爸爸，不要难过。

“好样的，谢连卡，”萨什卡用骄傲的语调说。——接着又不知是向老卡什塔诺夫还是向着汉斯补充说：“他是我们的障碍赛跑冠军。暂时是连一级的。不过如果练一下，可能成为全军的。”

“很好，”汉斯突然回答说。“谢尔盖和库尔特是古特兄弟……”

谢苗·达尼洛维奇闻声转过身来。不久前的一种想法重新又活动起来。是的，他当然是遇到过这个德国人。而且确切地记得在什么地方：在沃洛科拉姆斯克附近，一九四一年冬。就是这两条浓密的、好象有点在点香烟时烧焦的、向两边笔直分开的眉毛，就是这个低沉的、带着孩子般的喉音的“好”字……

“休息和音乐会！”中士宣布。

当士兵们分散在长凳上坐下，库尔特和谢尔盖跑去洗脸的时候，大约有十分钟里面卡什塔诺夫和汉斯都没有说一句话。萨什卡不知又往哪里去了……

开始感到难堪——好象是认识的，可是相互无话可说。

终于来了！从拉开的帐篷里出现了萨什卡——混身崭新，光滑，不带帽子。非常平民化。甚至额发也没有翘起来。

手风琴响了，库尔特走到场上。后面还有两个不认识的士兵——看样子是波兰人和捷克人。

谢尔盖坐到萨什卡殷勤地端过来的一张小方凳上，试了一下琴键，以准备的姿势静止不动了。好象是在说：一切顺利，可以开始。

萨什卡向观众走了一步，宣布：

“古老的战争歌曲《火光》！”

“是的，对你来说，这支歌大概是古老的。”谢苗·达尼洛维奇暗中同意地想，一面欣赏着儿子，障碍赛跑后的兴奋神情还没有从谢尔盖的脸上消失。

很久以前的、悲哀诀别的旋律笼罩了他的心，从遥远的远方某地传来了少年时代的声音，这位前近卫军中士仿佛是听到了自己本人的声音。就在这一分钟里，卡什塔诺夫完全清楚地看到了，他是在什么地方和在什么情况下遇到汉斯的。

为了心爱的姑娘，
为了亲爱的火光，
小伙子更厉害地
把可恶的敌人打……

四个人都努力地用过份遵守语法规则的外国人的那种听起来不自然的俄语唱着。“小伙子们唱得很齐，”卡什塔诺夫猜到了，“看起来不是第一次唱了。”

“唱得好，”汉斯赞许地点点头，卡什塔诺夫又从旁看了他

一眼。

“是的，是他。”现在谢苗·达尼洛维奇几乎没有怀疑了。“当然是他……不过，也许不是他……是他！”一个内心的声音坚持着。“你仔细地看看。任何人也没有这样的眉毛，也没有这个在鼻梁上的这样深的皱纹。就这样——你们两人面对面地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在林中道路的岔路口相遇了。蓝色的枞树，蓝色的雪橇痕迹。甚至四周压迫人的、令人警惕的寂静仿佛也染上了蓝色。”

在那一天早晨，卡什塔诺夫以及另外两个战士侦察回来。侦察不完全成功：始终没有抓到“舌头”。离我们部队的驻地大约还有两公里的时候，侦察员们在森林里，几乎靠近林边的地方，突然碰上了德国人，看来也是侦察员。双方都没有来得及开枪，因为都是突然地走到一条路上来，已经额角碰到额角，好象护林员或者猎人们一样。我们的侦察员还受到一个希望的吸引——终于能抓住“舌头”了。于是就三对三地打了起来。起先用自动步枪象长矛一样对打，后来枪都飞到了雪地里，就互相抓住对方的胸脯。

卡什塔诺夫的对手是一个结实的矮个子，双手象铁钳一样会抓。当双方缠在一起跳来跳去躲避对方的绊脚时，他们立刻就明白，谁也不能轻易取胜。他们紧紧地抱着对方，不敢松开一秒钟，因为每个人都会在任何一个空隙里拔出刀来。

卡什塔诺夫用足力气压迫德国人，合抱的手慢慢向下向下，以便摸到和折断德国人的腰部。他的脸颊甚至已触到了德国人的没有刮过的脸颊，头颈也使足了劲。当他的双手看来已经要完全抱拢，只要再用力压一下的时候——突然滑了一脚。这个只有一刹那的“突然”，对德国人来说已经足够利用来使之再延长一点了，他对另一只穿棉鞋的脚使了个绊腿，再用双臂一压，于

是卡什塔诺夫感觉到自己要倒下去了——不可挽回地，背向后，永远倒下去。他想喊叫，求援，但喉咙里只发出一种嘶哑声。谢苗·达尼洛维奇后脑着地跌倒在雪地上，手已经不能动了。就在那个时候他看清了这张脸：笔直分开的有点烧焦的眉毛和鼻梁上的皱纹。看清了并且恐怖地想到，这就是他，卡什塔诺夫的死神的形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死神像。卡什塔诺夫的死神不是张着黑色的眼眶洞看着他，而是用着一种活生生的、热烈的、充满剧烈憎恨的目光。

这一切都在几秒钟里闪过，而且也许不到一秒种，接着，死的恐怖就被耻辱感和一种痛苦的、现在已经无可挽回的委屈感所代替了，因为他感到他将死得多么愚蠢：躺在德国人下面，伸直手脚，象钉十字架一样被处死在雪地上。而且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而是在家里，在俄罗斯的城市沃洛科拉姆斯克旁边。谁邀请过德国人到这块土地上来，到这座树林里来呢？去年夏天，人们还在这座树林里你呼我喊地采蘑菇。根据什么德国人允许自己这样做？不，当卡什塔诺夫感到德国人把手伸向刀鞘的时候，他害怕的不是死。一种好象是疯狂的感觉向中士袭来，一刹那的昏迷紧接着变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仿佛卡什塔诺夫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根弹簧，在被压紧之后突然伸展开来，用自己钢铁的弹性把德国人弹开了。他记不得把打倒的敌人压了多久。直到听到了准尉的说话声时才松开。

“你快放开他。别扼死了。哪怕送一个有气的到司令部里也好。”

德国人勉强地站起来，开始拍掉身上的雪。然后把手伸向背后，转向卡什塔诺夫说：

“好，好……”

究竟什么是“好”，谁也不懂。但卡什塔诺夫的记忆中永远

刻进了这个在当时情况下十分荒唐的“好”。

“难道就正是那个德国人？”卡什塔诺夫小心地向汉斯瞟了一眼，拍起手来，因为歌唱完了。“一定要问一问，一定！”

士兵们在台上诵读一首诗，这诗引起哈哈大笑，使钉得不牢的长凳也摇动起来。卡什塔诺夫老是看着帐篷的幕布，等待儿子再上场。现在又出现了熟悉的四重唱的四个人。

“歌曲就叫这个名字，”萨什卡向观众报告。“《四重唱》”

谢尔盖低下头，习惯地起了个音。四个士兵——德国人、捷克人、波兰人和我们俄罗斯人，——拥抱着，唱了起来。“这个歌用来行军很好”，谢苗·达尼洛维奇也随着令人振奋的节拍摇晃了一下，暗中想道。歌词也是这样，使人想跟着它们迈步：

穿上军人制服，
面向世界走路，
四个战斗兄弟，
属于同一队伍。

歌手们和谐地踏着脚，看得出来，他们早就熟悉并且喜欢这支关于四个小伙子的歌：来自列宁格勒的巴维尔，来自什切青的弗拉杰克，来自布鲁诺的雅罗斯拉夫和来自柏林的汉斯。歌的内容是，虽然他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生身的城市和从童年时起就心爱的地方，可是他们一起忠诚地保卫着一个名叫“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

姑娘们含笑望着，
我们和谐的四重唱。

她们知道我们最可靠，
在这整个地球上。

“真理，千真万确的真理——没有比这些士兵更可靠的了”，卡什塔诺夫带着一种有了新的但尚未成形的发现的欢乐想道。而由于在这些小伙子中有他的儿子在内，他感到特别的愉快。

“不过，在舞台上不是还有那个德国人的儿子吗？”卡什塔诺夫突然把四个人作了对比：自己、汉斯、谢尔盖和库尔特。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他和汉斯——就算不是那个“沃洛科拉姆斯克的”德国人吧——几乎在森林里互相扼死对方，而现在却若无其事地并坐着听业余音乐会。在舞台上是他们的成了朋友的儿子们。世界上最可靠的小伙子。这怎么能够自圆其说呢？

“音乐会结束！”萨什卡双脚一并，敬礼说。“下面的节目，就是说第二部分，在食堂里进行。请全体出席。”

“去喝红菜汤去，走吧，”谢尔盖说，拉起卡什塔诺夫和汉斯的手。

汉斯摸出香烟，擦的一声打开了打火机。

“好样的，”他用清晰的俄语说。

“现在问问怎么样……不过，算了……”卡什塔诺夫又忍住了。忽然象被人推动了一下似的，出乎意料地问道：

“请原谅，汉斯，您在东方作战过吗？”

“是的，”汉斯停住脚步，鼻梁上的眉毛象翅膀一样抬起来又落下来。

卡什塔诺夫觉得，德国人在继续走时甚至有点发窘。

但是一个看不见的人又推动卡什塔诺夫。

“沃洛科拉姆斯克呢？您知道这个城市吗？到过吗？”

“沃洛科拉姆斯克？”汉斯反问。皱了皱眉头，脸上好象落上了一层阴影，然后又褪去了。他无力地微微一笑，皱起眉头，又一笑。“纳因……没有。奥勒尔……日托……日托米尔……被俘！”汉斯摊摊手，好象在道歉。

“到食堂去，到食堂去，”萨什卡来催了。

谢尔盖和库尔特走过来。他们情绪激动，还处在音乐会的影响下。

“爸爸，”谢尔盖说，“我们被邀请去做客。是库尔特请的。他们就住在附近，大约两公里。”

“对，对，请，”汉斯频频点头。

第七章

“三粒子弹从我的胸膛出来射进了士兵们的卡宾枪的枪筒里，这些士兵们安详而坚决地倒退行走着，用嘴巴从空气里吸着歌曲。”

（摘自丘恩杰尔·库涅尔特
的诗《反方向的影片》）

在战地士兵食堂吃饭时，老卡什塔诺夫没有盘问汉斯关于俄国的事情。这方面，不管你怎样使用外交辞令，终究会使人想起也许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甚至一个问题也能触痛人。

谢苗·达尼洛维奇刹住了谈话。他没有想到，他已经在汉斯的心中掀起了多么大的风暴。

汉斯在卡什塔诺夫身上没有看到与那个把他的双手反剪到背后的俄国人有任何相象之处。而且他也没有去找寻任何熟悉的特征，因为没有记住那个苏联士兵的脸。谁知道呢？……战争

中，什么意外事件不曾发生过啊！

他们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吃着发出诱人香气的红菜汤，什么话都谈，就是不谈过去的一次战争。谈是不谈它，可是不能不想它。卡什塔诺夫解开了自己的回忆的线团，汉斯也是。

当一个穿着雪白的炊事员罩衫的士兵往汉斯的盘子里盛上山一样高的淌着油的羊肉抓饭时，他想起了一只盛着黄米粥的饭盒子。这是很久之前的事了，仿佛是在另一种空间和时间里：一个俄国战士用自己的饭盒子请战俘汉斯吃。眼睛简直不敢相信了。军官们威胁过，说什么俄国的“不洗脸、不梳头的野蛮人”从后脑枪毙俘虏。而眼前“伊凡”就坐在对面，穿着整洁的军服和刚洗过的衬领，象对待来作客的亲戚一样，不断地给他添粥。

几个钟头前，汉斯同他，同这个最善良的人进行了搏斗。残酷地、拚死地搏斗。俄国人是灵活的，但汉斯精通日本拳术，毫不怀疑自己能压倒对手。汉斯必须尽快地解决掉他，以便去帮助伙伴们，他们也在同别的伊凡们肉搏。这些伊凡们是突然跳进他们的战壕里来的，好象从天而降。

这恰巧发生在新年前夕。汉斯从早晨起就好象预感到，那一天对他来说将是战争的最后一天，可能也是生命的最后一天。不过，沉重的预感那时不仅压迫着他一个人，而且大概也压迫着别尔哈尔德中尉的整个连队。在俄国两年半来，他们对俄国人的风俗是了解得太清楚了——一定要在过节前准备某种礼物。在这一次，俄国土兵们完全可能立下了保证，要把例如日托米尔这样的城市作为新年礼物献给自己的人民。也就是说把它从德国人手里解放出来。

早晨，传单和轻飘飘的新年前的雪花夹杂着落进壕沟。汉斯向四周张望着，偷偷用刺刀从胸墙上拉来一张传单，揪在墙壁上，就这样始终没有拿到手里，远远地读完了。

“德国士兵们和军官们！投降吧！你们所有的顽抗企图都是无效的！这不过是多余的牺牲，多余的血。

想想自己和德国的明天吧。最后，想想你们的亲人们和朋友们吧，他们在等着你们活着健康地……”

汉斯没有来得及读到底。传单被一只擦得很干净的靴子踢掉了，眼前出现了中尉的身影。在修剪整齐的毛茸茸的小胡子下面，牙齿象老鼠一样露着。

“你对传单感兴趣，混蛋？忘记了克柳格尔是什么结果？”

中尉用自己发亮的靴子把传单踢进雪里，用这样的一种眼光打量了一下汉斯，使得他从心里感到发冷。不，他没有忘记上等兵克柳格尔的结局。两天前，这个克柳格尔在战斗的混乱中企图向俄国人投降。他被当着队伍的面枪毙。告发他的是列兵季维尔特——一个不引人注目的沉默寡言的人，从外表看来，他好象连苍蝇也不会欺侮。

事实就是这样，在中尉别尔哈尔德的连里可以信任的只有自己。而且难道只是在他的连里？

由于读俄国传单，汉斯受到的惩罚是被派去和另外三个士兵一起巡逻。他们中间当然也有沉默寡言的季维尔特。“派了看羊狗一起去”，——汉斯看着这个拱背的士兵想道。季维尔特的沉默寡言现在已被看作是一种凶兆。

他们在黄昏中到了一条废弃了的堑壕，爬了进去。中士旋开了军用水壶的塞子，吞了一口白酒，把余下来的挨次传着喝。季维尔特连碰也不碰。轮到汉斯时已经只有很少了。当他把水壶还给中士时，咬了一口冰冷的饼干。就在这时，俄国人扑到了他们的头上——无声无息地，突然地，就象穿着白色伪装衣的幽灵。汉斯的口被堵住了，脸被铁一样的手指压紧，手指上还有热的羊皮气息，因为刚刚脱掉手套。汉斯伸手去拿自动步枪，但俄

国人先发制人，用脚把枪踢向一边，开始向他的嘴里塞东西，可能是抹布，也可能是绷带。

“他们想抓‘舌头’！”汉斯明白了。第一次恐惧的感觉立即消失了。“这是要活捉我啊，见鬼……”

他还没有来得及思考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突然感觉到有一道尖锐的目光在看他。可能这只是一种错觉，但汉斯直到现在还准备打赌，那时候他的目光确实是同季维尔特的目光相遇了，而季维尔特仿佛是特地把同俄国人的搏斗停了一秒钟，以便看一看施坦因加尔特的表现如何——是不是想要投降？

这条目光好象是命令汉斯鼓足全部力气。他推开了俄国人，自己扼住了俄国人的喉咙，开始向地面掀，同时越来越相信自己能压倒对方。雪无情地、凶恶地在他们脚下发出响：日维克一日维克……活——不活……汉斯节约地使用力量，等待着机会。当时机来到，也就是那种只有角斗运动员用自己的本能才能抓住的时机来到时，汉斯只做了一个短促的、用劲不大的动作，俄国人就跌倒在雪地上。

现在，俄国土兵的睁得很大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汉斯。眼睛里面没有恐惧。从瞳孔深处仿佛在不断地发射出光辉，这种光辉使得汉斯自己感到无限恐惧起来。他看了这对眼睛之后，突然好象是用它们看到了自己：他在这块别人的土地上需要什么东西？他怎么敢于把这么多的灾祸、这么多的痛苦带到这里来？

这时候汉斯明白了，他在失去力气，他已经没有足够的力气去结果自己的对手。俄国土兵没有被打倒，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被打倒，因为这是他的土地，这土地是广阔无边的、强大的和不朽的。

汉斯不能肯定，正是这些思想使他放松了手，忘记了季维尔

特。那时没有时间思考。显然，那是在后来，在做俘虏时，所有发生过的事才都得到了思考的机会。不仅仅只是那次夜里在雪壕里的搏斗，而且是战争中全部漫长的年月，全都出现在汉斯面前，就象已被打死的士兵在大火的摇曳而凶恶的火光中复活了一样。他从一九四一年六月思考起，从值日的下级军官给每人分发双份的伏特加的那一刻思考起。就在那时，下级军官对开始忧郁的、脸色发白的汉斯说：“你太软弱，小伙子，应当做个男人。”司务长也当即接上去说：“应当做个德国人！我们的历史使命就在于此。谁没有杀过人，谁就不是真正的汉子！”

过了一小时后，指挥官就在喝得醉醺醺的灰色的队伍面前宣读了元首给德国武装部队的命令。血在血管里凝结了，手握紧了步枪：“布尔什维克的阴谋！布尔什维克威胁着从东方进攻！”

在黎明时，汉斯和别的人一起跟在一大队飞机之后出发，飞机在自己身后的地上留下了一片片火和烟……

但是最可怕的不是俄国人用来迎接他们的炮弹和枪弹。不能忍受的是他们的目光。不论是谁向你看——不论是被俘的红军战士、被吊死的游击队员还是被打死的孩子。甚至是玩具娃娃……汉斯永远忘不了他作为抢劫者走进去的第一座俄国房子。还保留着和平生活的暖意的房间，仓促中丢弃的东西。其中有一个躺在沙发上的玩具娃娃还完全是新的，可能是刚在上星期六买来。它象活的一样，用天蓝色的疑问的眼光盯住了走进来的汉斯。

胜利的进行曲高奏着，可是汉斯在别人的土地上象个贼一样走路。越是深入到别的国家，罪行就越可怕，共同参加这个犯罪就越是不可饶恕，报复就越是不可避免。在恶臭的浓烟后面，微微地闪现着家里窗口中亲切的灯光，那里有他的妻子和孩子。

不是她们派他来作战的……

在那里，在日托米尔附近，他的心中有某种东西折裂了。汉斯用记忆回到了那些日子去，一切都是从那些日子开始的。记忆可以使一切从头开始，可以使一切人复活。而现实是确定不移的，不可遏止的。没有任何东西能把弟弟还给汉斯，他的弟弟已死在莫斯科城下。甚至没有人能指给他兄弟的墓在哪儿，因为他是作为一个侵略者死去的。要是生活能够象电影胶卷一样向反方向倒转，那该有多好啊，就象丘恩杰尔·库涅尔特的诗一样：“我醒来了，在又闷又黑的箱子里醒来了。我听见：土地在我头上裂开。土块纷纷向铁锹飞回去。盛着我这个宝贵的死人的无价的棺材冲天而起。盖子落下了，我站了起来，立即感觉到：三粒子弹从我的胸膛出来射进了士兵们的卡宾枪的枪筒里，这些士兵们安详而坚决地倒退行走着，用嘴巴从空气里吸着歌曲。”

不，生活不是影片，不能使它向反方向转。汉斯不光彩地回到了家里。他没有带回任何奖赏：唯一的一枚铁十字章还在俄国时就被他丢在途中的树丛里了。而比任何审问都更使他害怕的是，他怕正在长大起来的孩子们会问：“你在什么地方打过仗，父亲？和谁打？”但奇怪的是，从孩子们开始懂事的那时候起，他们中谁也没有向汉斯问起过这一点。

当然，许多事情已经由学校向孩子们解释过了。但是家庭照相簿是孩子们了解父母生平的最初向导，而施坦因加尔特一家的家庭照相簿中却有一大段空白。它的灰色的、用古旧的带花纹的硬纸做成的簿页好象忽视了整整六年。汉斯和他的妻子卡特琳拍的最后一张照片下面注明是在一九四〇年，那时他们正在一个风景如画的郊区湖边野餐。前线的照片汉斯没有保留，而他从明斯克城下寄给妻子的那张唯一的照片被卡特琳自己丢

掉了，因为它使她想起的不是她想要想起的东西，不是她心爱的人，而是一座大城市的苦难。以后就是两年俘虏生活……全部六年就都在这里了。有什么可以给孩子们看的呢？看被烧得精光、只剩下一根根烟囱残骸的白俄罗斯村庄和它的苦命的爆竹柳吗？看在莫斯科城郊停滞不前、裹着妇女的头巾、冻得发抖的帝国的骑士们吗？还是看默默无言的、弯腰曲背的、仿佛复仇的全部重量都压到了他们肩上的大队德国战俘？……

这个使汉斯如此害怕，而他的子女不论是盖尔达、库尔特还是玛尔塔，随时都可能提出的问题，一直在空气中存在着，象达莫克尔剑一样挂一根头发丝上。但是孩子们是在战后很久生出来的，他们好象是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他们出生前已在世上发生的事情。父母亲们经过多年、经过许多疑惑和错误才达到的真理，对他们来说却是十分浅显的。

汉斯可能因为他企图阅读俄国传单而被枪毙。而十年之后小库尔特高兴雀跃地跳到父亲面前：

“爸爸，你看，什么样的礼物！”

他松开小拳头，露出了贴在掌心上的一枚搪瓷的小红星，这种星俄国人常常钉在帽子上。这是苏联士兵送的——留作纪念。

是的，孩子们看待历史，就当它是按年月排列起来的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在这方面他们仿佛比自己父母年纪大，——过去的一切对他们来说，已经用另一种光线来照耀。他们默默地同意不向父亲问起战争的事情，这是否表明他们对父母的错误和迷惘抱着儿子们的宽大态度呢？

卡什塔诺夫——这是另一回事。卡什塔诺夫是他的同龄人，也是那次战争的参加者，过去的士兵。于是就以士兵的方式问起了。归根到底，趁着还活着的时候，自己对这个议论议论，弄

弄清楚，是不坏的。

萨什卡的热情的声音把汉斯从沉思中拉了出来。

“水果汤！谁要添？”他把铝制的带柄杯子弄得叮当响。“我们有个传统：我提议为勃鲁杰尔沙弗特干杯！”

“瓦芬勃鲁杰尔沙弗特，”库尔特纠正。

“瓦芬勃鲁杰尔沙弗特，”谢尔盖重复。

“是个好的祝酒，”谢苗·达尼洛维奇表示支持。

“好，好，”汉斯频频点头。

萨什卡用勺子舀起水果汤，给大家都添上。

“不满的杯子不能碰杯，”他权威地宣布。

于是大家都拿起了满满的杯子。

……但是，在到汉斯家去作客之前，卡什塔诺夫决定先同普罗霍洛夫商量一下：方便吗？

“有什么使你不好意思的呢？”普罗霍洛夫惊讶地说。“相反，你可以认为你运气好：去向一个工人进行所谓非正式访问，你将更好地了解现在的德国是什么样子”。

所以，卡什塔诺夫、谢尔盖和萨什卡现在一个接一个地跟在专门前来接他们的库尔特后面走。

在小镇的打扫过的街巷里很空旷。“喜欢待在家里，”卡什塔诺夫笑笑。“在我们那儿现在一定是电唱机高声叫着，可是这里却是这样风平浪静……”

“达斯伊斯特翁捷尔哈乌斯，①”库尔特突然在装有嵌花金属网的便门边停住了。

在种满丁香和茉莉花的院子深处有一条用各色石子铺成的小路，在小路尽头卡什塔诺夫看见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急忙

① 这是我们的房子。

迎面走来。他立即认出了汉斯。

“父亲和母亲！”库尔特低声说，推开了门。

“古登莫尔根！”女人含着笑悦耳地说。她眨着眼睫毛，完全象库尔特一样。

谢苗·达尼洛维奇鞠了一躬。

“弗拉乌卡特琳·施坦因加尔特，”汉斯介绍妻子，并轻轻抱住了她的肩膀。好象是在说，看吧，我们就是这样。

从远处看来施坦因加尔特太太可能被当作一个小姑娘，但走近以后，立刻露出褪了色的、受过折磨的脸来。

“这个是我们的玛尔塔！”汉斯指指台阶前。

一个年约十七八岁的瘦瘦的金发姑娘倚着栏杆站着，她有点发窘，因为不知道是下来迎接好，还是不下来好。在期待地抬起的眉毛下面，明亮的眼睛警惕起来了。

“妹妹，”库尔特不无骄傲地说。

玛尔塔用嘴角微微一笑，摇动一下梳起的头发，头发散落下来，披散到肩上，拖在绿地白点的无袖连衫裙上。这件连衫裙明显地不合季节。

谢苗·达尼洛维奇看了看房子，用有经验的眼光估量了一下这是战前还是战后造的。房子象是战前的。也许，屋顶换过新瓦，也许房基补过。但战争没有触动这所房子。

他们还没有走上台阶，从丁香花丛里奔出一个还不到上学年龄的小男孩，他穿着红色的绒布外衣，说着一些含糊不清的话，扑到施坦因加尔特太太的脚边。

谢苗·达尼洛维奇感动起来。他是喜欢小孩的。

库尔特向小孩扮了一个鬼脸，解释说，这是家里最主要的男人——外甥小马克斯。姐姐和她的丈夫——他们今天不在——通常在休息天把马克斯整天交给老人。

“这可真难为情，”卡什塔诺夫十分伤脑筋地拍拍衣服的口袋。“没有带礼物……”

“不要紧，”汉斯安慰他。

施坦因加尔特一家生活得不坏。如果用乡下的说法，卡什塔诺夫会这样来说：生活得结实。但并不摆阔。这立即使谢苗·达尼洛维奇感到喜欢。他不用详细询问，就“毛估估”地确定：中等收入的工人，收支相抵。他猜对了。

房子的主人们显得拘束。库尔特就担当起了主导的角色，他脱下士兵的上衣，只穿着薄薄的天蓝色的球衫，于是他在谢苗·达尼洛维奇看来就完全不是什么库尔特，而只不过是一个邻居小伙子，谢尔盖的好朋友。他让所有的人都坐下——有的在沙发上，有的在圈椅里，扭开了收音机，把调波器转来转去，抓住了一种不知是进行曲还是圆舞曲的音乐。

“等一等！”库尔特说着消失在厨房里。

卡什塔诺夫已经克服了通常在进入陌生的人家时产生的不自然的感觉，现在自己感到惊讶：为什么谢尔盖和萨什卡的举止这么羞怯，与士兵这么不相称。这一对朋友好象变成了木头——每一步，每一句话都不对头。“瞧，姑娘可真是能够把我们男人俘虏过去”，谢苗·达尼洛维奇想着，一面观察着玛尔塔，她已经完全摆脱了不自然感，象燕子一样在他们面前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而他们则在看着一本有鲜艳图片的书——好象是一本柏林的风景图。

明亮的阳光从窗帘半掩的窗口照进来，所以卡什塔诺夫也不多费脑筋去想新奇的话题，就赞美起天气来，正象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常做的那样。

“啊，是的！”汉斯作了响应。“十月是个古特的一月。但四月更好。”他把手指捏成一撮，就象拿着一朵花一样伸向脸旁。

“四月是雪花，五月是栗树花。这些花都象蜡烛。”

“对，对！”卡什塔诺夫也同样同意了他，虽然一次也没有看见过栗树开花的样子，并且认为他的姓同这种树木没有任何关系^①。

但现在他觉得，他好象已经欣赏过一次这种象烛台一样挂在枝头上的白色香花。也许甚至就是在这里，在柏林欣赏过。而且在德国人家里作客也不是第一次。如果他不是到了汉斯家里，他从来就不曾去回忆过这件事，而且也肯定回忆不起来。而现在，记忆忽然把他带到了一九四五年四月的一天，带到了一个他早已忘了其名称的德国小城里。正是在那里，卡什塔诺夫第一次走进了德国人的房子。他推开门，跨进门槛，停下来，平端着自动步枪倾听着。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主人们一定还没有从防空洞里出来，战斗刚刚在街的另一头平息下来。看得出来，房子只是暂时地被抛弃一两个钟头。东西显然是照平常的老样子放着，放在各自应有的地方，没有任何慌乱的迹象。最使卡什塔诺夫吃惊的正是住宅里这种安宁的景象。一台古老的钟愉快地“的嗒、的嗒”地走着，青铜的钟摆擦得明光铮亮，透过酒吧橱的薄薄的玻璃可以看到带金边的大小酒杯闪耀出水晶般的光彩。在光滑的地板上铺着如此华丽的有花纹的地毯，使得卡什塔诺夫在踏上之前一次又一次地在门边擦靴子。谁住在这里，是什么样的人？从正式的角度说来，他们是敌人。他现在是在敌人的房子里，凶恶的、可恨的敌人。但这所住宅的景象与十分钟前用自动步枪向他瞄准的那个人是多么的不相调和啊。一个人不能够，也没有权利，从这所和平的、安宁的房子里走出来，去打死和自己相似的人。

……卡什塔诺夫记起了往事之后，就四面环视了一下，又一

① 卡什塔诺夫在俄语中的意思是“栗树的”

次用目光估量了一下施坦因加尔特一家的住所——这里和他在二十五年前到过的那所住宅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只不过窗前没有开着花的栗树。

“咖啡，白兰地？”汉斯看着从厨房跑到客堂里来的库尔特，问道。

“咖啡，”谢苗·达尼洛维奇迟疑地说，回头找寻谢尔盖和萨什卡的支持。

“我们随便！”萨什卡代表两个人爽气地回答……

坐到桌子后面，移动着椅子，互相推让着，谈话慢慢活跃起来。玛尔塔坐在谢尔盖和萨什卡之间，她的明亮的头发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这就是说，她把苏联士兵掌握到了自己的领导之下，殷勤地注意着他们的盘子是否满着。

卡什塔诺夫欣赏着姑娘，把眼光转向谢尔盖：很好的一对。但立即就骂自己：在伊凡诺沃村里自己的姑娘有的是。当玛尔塔放上一张唱片，走近谢尔盖，行了一个屈膝礼，邀请他跳舞的时候，卡什塔诺夫当真激动起来了。

谢尔盖把身子一挺，好象变得高了一些，——真不知是谁教会他的。谢尔盖谨慎地用手挽住玛尔塔的腰，而她用自己明亮的大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他，同时象鸟儿一样飞着，飞着。看着他们，大家都微笑起来——汉斯、库尔特、施坦因加尔特太太、萨什卡——每个人都为只有每人自己看到的某种东西而微笑着。

“时间啊，”谢苗·达尼洛维奇摇摇头，没有收住笑容，向汉斯使了个眼色。

“是的，是的！”汉斯同意地点头。会意地摊摊手：“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变化……”

“那么，总的来说，生活怎么样啊？”卡什塔诺夫问他，同时对这些昨天还不认识的人越来越充满了善良和好感。

施坦因加尔特太太坐得更靠近些，把头伸向汉斯，意思是叫他翻译，说的是什么。

“好，”汉斯甚至用一种俄国式的坦率回答。“工作，孩子。”他把头向玛尔塔和库尔特点点。“活着不感到厌倦。”

“我明白，”谢苗·达尼洛维奇笑了一笑。“正如常言所说，孩子们小的时候——不让你睡，而长大了——你自己睡不着”。

汉斯把这些话译给施坦因加尔特太太听，她立即开心地笑起来：

“亚沃尔、亚沃尔①……”

“那您生活得怎么样？”汉斯问，并把头低向谢苗·达尼洛维奇，全神贯注地。

“也很好，”卡什塔诺夫微笑。“也是工作，孩子。我还有一个女儿，叫娜斯坚卡，而妻子叫格鲁尼娅。”

“格龙娅，格龙娅，”汉斯重复着，又再用德语向卡特琳太太重复了几遍。

“我是集体农庄庄员，”卡什塔诺夫认为必须解释。“我在养蜂场工作，就是说，我是放蜂的……”

他甚至没有发现，电唱机已经关掉，库尔特、玛尔塔、谢尔盖、萨什卡已经又坐到桌边上来，听他们谈话。

卡什塔诺夫想到，房子的年轻和年老的主人们大概都不明白为什么他干的是这行老祖父般的职业。由于这一点他仿佛有点感到局促不安，想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不当个，比方说，农机手，而当养蜂人。但没有解释——因为一解释就无论如何也不能不提到战争，重伤，残废。但是他很不好意思谈起这个。于是卡什塔诺夫略过自己生平的最主要部分，开始讲述，观察蜜蜂小城的忙碌的、充满了自觉性的生活是多么有意思。他讲得出神，

① 对，对。

显然忘记了这里能听懂他的话最多只有百分之几十，而施坦因加尔特太太也许是什么也没有听懂。

小马克斯脚步歪斜地走过来，爬到了卡什塔诺夫的膝盖上。谢苗·达尼洛维奇轻轻地摇着小孩，抚平他蓬松的头发。

“一切都很好，”汉斯吐了一口气，还想说些什么，但施坦因加尔特太太打断了他。卡什塔诺夫仔细听着她说，可是丝毫不懂。

“卡特琳说，只要没有战争，生活我们自己能使它美好起来，”汉斯翻译了，但又是有什么话没有说完。他几乎和施坦因加尔特太太同时突然转向挂在墙上的一张照片。卡什塔诺夫也抬起了眼睛。

一张顽皮的、下巴骄傲地稍稍抬起的少年的脸从黑色的镜框里看着大家。他的年龄很难确定，装出来的威风凛凛和无忧无虑的神情被军服和中士肩章冲淡了。

谢苗·达尼洛维奇早就注意到这张照片，但大致的推测使他不便去问这是谁。

“托马斯，弟弟，”汉斯的声音发抖。“死在莫斯科城下。”

施坦因加尔特太太把手绢拿向眼边。

“不要这样，妈妈，”库尔特不知为什么用俄语对她说。

卡什塔诺夫窘困地不响了，皱起了眉头：“这就是说，连这一座房子也没有被战争放过。唉，希特勒！……不过，现在希特勒不在了，托马斯也不在了，可是子弹还是在地球上空呼啸。每朵乌云随时都可能酝酿成又一阵暴风雨。但是武力可以用武力来对付。有伟大意义的是，现在面对暴风雨站着的已经不仅只有伊凡们了。和他们肩并肩地站着库尔特们、斯杰凡们，弗兰季舍基们……”

“请你们原谅，”汉斯打破了沉默。“不知怎么一来就回忆起

来了。”

施坦因加尔特太太也难为情地眨着眼睛，好象要驱散这短暂的悲哀，在桌子旁边忙碌着。

“谢谢，谢谢！”卡什塔诺夫站起来道谢。“我们该走了。孩子们要归队。上校要求过不要迟到。”无意中又说了句俏皮话：“该去阅兵了！”

汉斯、施坦因加尔特太太和玛尔塔送客人到院子的门边。告别了。卡什塔诺夫笨拙地踏着步，有什么话想说，但一直下不了决心。挥了一挥手：

“算了，以后……”

直到离开汉斯家的房子已有相当大的一段距离时，他才操心地问谢尔盖：

“你以为怎么样，谢尔盖，蜂蜜可以邮寄到国外吗？如果从伊凡诺沃寄出？”

“谁知道，”谢尔盖漫不经心地回答，他在想着自己的心事。

不论是谢尔盖还是萨什卡，以前都没有参加过阅兵。他们象千百万和他们同年龄的人一样，在红旗招展的节日里不仅热烈地羡慕那些以钢铁的进军行列在列宁墓前走过或驶过的人，而且也热烈羡慕那些站在红场观礼台上的幸运的人。

当然，德国小城的广场完全不象红场。但阅兵总是阅兵。所以这个词本身就象鼓声一样——巴尔一尔尔一拉特^①，——使全连在值日员发出起床口令前半分钟就起身了。

阅兵，阅兵：洗脸，把脸修得精光。阅兵，阅兵：钮扣象太阳一样发光，腰带的扣子亮得可以当镜子照。司务长大可不必再进行早晨的检查：人人都无懈可击。甚至挂在墙上展示军容典范

^① 俄语中“巴拉特”就是阅兵。

的宣传画，也在节日的队伍前黯然失色。

萨哈罗夫大尉就好象自己在过生日一样。他用骠骑兵的脚步走了一周，帽子稍稍压住耳朵。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几十双发光的眼睛里只有一个要求：“拖延什么呀？走吧！”

装甲运兵车象“儿童世界”里的玩具一样——簇新，发出油漆的气味。每个人按口令坐到了自己的位子上。

“当心，皮亚特洛夫！”

这是萨哈罗夫大尉对驾驶员兼机械师说的。意思是，当心，不要在检阅台前出了洋相：要严格保持距离，发动机的转数也是。

“行！”皮亚特洛夫向他保证。“保证一切正常！”同时却用不安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仪表板。

“起步走！”

去参加阅兵确实毕竟是比参加战斗愉快得多，即使是演习性的战斗。你自在地坐着，打扮得漂漂亮亮，慢慢地，比人行道上走的人还要慢，向着广场前进。周围的一切都是节日般的，欢笑的，所以真想整天都这样坐着，坐着，接受着向自己身上投过来的赞赏的目光。

似乎并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感谢你——你什么杰出的事也没有做出来过。当然，你射击了，爬了，少睡了，可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要知道这不是战斗，不冒生命危险。可是四周围的人这样看着你，好象你刚刚从城里赶走了不共戴天的敌人，现在凯旋而归。

不，在这些目光里，在这些欢迎的手势里也确实有你应得的东西。行人们也真的感谢你。不是由于你已经建立了功勋，而

是由于你准备去建立功勋。

广场已经看得见了，在普罗霍洛夫上校乘坐的驶在前面的“小嘎斯”上骄傲地飘扬着的红旗后面露出了检阅台。

“谢连卡！”萨什卡转过脸。“看。向右面看！”

谢尔盖转向右面：难道是真的？玛尔塔不听维持秩序的人的喝止，穿过马路向装甲运兵车奔过来。一束火红的枫叶在她的双手中轻轻摇摆。好象一颗茂盛多姿的小树跑过了马路。

玛尔塔跑近汽车，把枫叶直接丢在谢尔盖的手里，立刻往回跑去。

“谢谢，玛尔塔！”萨什卡追着喊，但姑娘已经钻进了人群。

枫叶束发出鲜艳的光彩，仿佛在宽大的叶子里面点燃着许多小灯。

这时候，谢尔盖和萨什卡大概同时想到了，在装甲运兵车上没有预先为花规定坐位。这里不应当有花。

维亚佐夫一定也想到了这一点。

“怎么办？”萨什卡问，看一看中士。

“作为居民的礼物留着！”维亚佐夫认真地回答。

检阅台已经好象自己向装甲运兵车驶过来，从旁边经过，金色和银色的肩章、一排排的勋章闪闪发光。

萨什卡屏息不动，谢尔盖屏息不动：“立正，向右看齐！”

士兵们和装甲车溶成了一体，自己也变成了钢甲。只有枫叶在温柔地抖动着。由七种旗帜组成的花朵在广场上开放，广场上的每一块石头都向乐队发出回声。

当装甲运兵车一开出“立正”命令的有效范围，士兵们仿佛从麻木状态中醒了过来，谢尔盖在五彩缤纷的来宾观礼台上看见了父亲。根据帽子认出了他。灰色的短舌帽。这里没有人戴这种帽子。谢苗·达尼洛维奇手里抱着小马克斯，还竭力举得

高些，以便让他看得更清楚些。旁边站着汉斯。

父亲是否认出了自己的儿子，谢尔盖始终没有弄清楚。从远处看去，大概装甲运兵车上所有的士兵都象孪生兄弟。只有根据旗帜才区别得出。

第二天谢苗·达尼洛维奇就要动身回家了。早晨他和儿子作了最后一次会见。普罗霍洛夫上校实现了诺言，让谢尔盖和父亲一起到柏林来。他们还有几乎半天的时间。

他们来到翁捷尔——登——林登大街只有一个目的——父亲还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就答应过要带谢尔盖到勃兰登堡门去，到他过去负了重伤的地方去。但在半路上谢苗·达尼洛维奇忽然停了下来，沉思地拉住帽舌，把帽子稍微拉点起来。

“其实，我们在往哪儿走啊？啊，谢廖尼？要知道那里什么也没有留下，那里一切都是新的，甚至那道门也装饰过了。咱们最好还是到特列普托夫公园去一次吧，啊？”

“去吧，”谢尔盖同意，心里想道：“父亲不想到勃兰登堡门去了，这甚至很好，何必又一次地让沉重的回忆破坏情绪，折磨神经呢。”

然而谢苗·达尼洛维奇另有一种想法：“就算我把谢廖加带去了，就算把那块地方给他看了。那又怎么样呢？难道我要抖威风——自己做自己的博物馆，自己做自己的讲解员。要知道主要的东西不在于此。主要的是要让他的心里记住……不是记住一块马路上的柏油，不是记住一座房子的墙，而是要记住那个我们过去为之冒着枪林弹雨前进的神圣的东西……”

卡什塔诺夫自己和自己争论着，自己向自己顽强地证明着某种东西。经过在这里度过的一些日子，他突然得到了安宁。多年来一直纠缠不休地折磨着他的一种想法，仿佛在这个安宁里

溶化了。这种想法是：“命运在他的道路可以说刚开始的时候，甚至比这还早，就摧残了他的生活，这样对待他是公正的吗？”

在士兵的音乐会上，当他看到我国的士兵和德国的士兵拥抱着站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这个问题得到了答案。原来，胜利的结果不仅仅表现在，敌人受了哪些损失，而且还表现在，在烧成焦土的地方，到明天，到一年后，到几十年后，到一百年后，将产生和发展什么样的生活。卡什塔诺夫的年龄已经达到这样的高度，从这个高度上已能看到道路的尽头，所以他不能不开始思考已经生活过来的那些年头。但是以前不论他怎么认为，不论他用什么尺子去量，一切都在那个五月的一天前面碰了壁。卡什塔诺夫深信，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一个顶峰，每个人实际上就是为了这个顶峰而活着。这个顶峰什么时候来到——在二十岁时还是七十岁时，没有人能猜得到——因为命运各有不同……

他们沿着翁捷尔——登——林登大街往回走。卡什塔诺夫忽然又停住了：

“施坦因加尔特家的电话你知道吗？汉斯和库尔特也在柏林。让他们也到特列普托夫公园去。”

……汉斯和库尔特比他们到得早，在公园门口等着。

“进去吧！”汉斯高兴起来。“您一次也没有到过？”

“一次也没有，”卡什塔诺夫悲哀地承认。

枫树夹道的林荫路把他们引到一个宽阔的广场上，从这里卡什塔诺夫立刻看见了一座从明信片上熟悉的雕塑。离开这座雕塑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看起来好象觉得这个石头的士兵齐胸立在土里。全组雕塑仿佛是放在一个凹地里。可是你每向前走一步，士兵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现在他已经齐腰看得见了，现在靴子也出现了，战士仿佛是被底座从土里顶了出来，他

一手紧握着剑，一手谨慎地抱着一个被救的儿童，好象在广场上空，在公园上空雄伟地高高飞起。

他们走得这样近，以致能看清雕像脸上的每一条皱纹，每一根线条。宽宽的颧骨，翘鼻子，剃着短发。

“象利亚比宁，和利亚比宁一模一样！”卡什塔诺夫惊讶地说，想起了永远躺在给水塔旁的朋友。

“和父亲有些共同之处，”谢尔盖仔细看着士兵雕像的石头的脸，心中暗想。“好象是根据他旧的前线照片……”

“象谢尔盖——年轻，漂亮！”汉斯说。

“的确，”库尔特按住帽子，向上看看。

谢尔盖不好意思地拉了拉上衣。

他们拾级而上，环视四周。从这里可以望出很远。秋天的日子在这里并不显得那么灰色。云彩在太阳下溶化，好象脆弱的春雪一样。卡什塔诺夫觉得，他闻到了雪花的依稀可辨的气息。空气中充满了金色和紫红色。这是特列普托夫公园在当地还十分温柔的十月阳光下散发出来的。

（齐戈译）

海浪上的花圈

(苏修中篇小说·梗概)

这个中篇小说原载苏修《青春》杂志 1971 年第 2 期，作者斯捷潘诺夫。小说通过描写一个青年一心想考大学而最后安心在军队里服役的故事，为苏修征召新兵、搜罗炮灰制造舆论。小说还利用卫国战争对苏联青年进行军国主义教育，并竭力为社会帝国主义炫耀武力。故事梗概如下：

新兵铁木申上了巡逻艇。原先他希望去的是火箭巡洋舰。这虽然有些不痛快，但他认为，不管怎么说，总是自己的舰艇，而且不仅“大舰能远航”，在小舰上好好干也是有前途的。上舰的第一天，就给了他一个拖把，一块抹布，要他擦洗甲板。他非常恼火，甚至跟顶头上司、中士雷达兵阿发那西也夫顶了嘴。他想，成天这样擦来擦去，简直成了“哥伦布的同时代人”，而别人竟还讲他擦得不好，把他说成是“在丈母娘家拖地板”。接着，他和水兵们一起来到又小又闷的底舱上专业训练课。副舰长、海军大尉指着地图讲解：“苏联和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把领海规定为十二海浬……外国军舰和船只必须得到许可，才能进入我国领海……。”铁木申想，这些内容在岸上受训时早就记熟了，干嘛还要反来复去讲呢？……

各种活动结束了，铁木申好不容易等到“属于个人的时间”，就给鲍利斯写信，不由地回忆起他俩以往的友谊。原来，铁木申和鲍利斯是好朋友，他们成天在一起，形影不离，显得很突出。这

引起了同学们的不满和妒忌，一个叫“卡甫东”的家伙带领了一伙人还把他俩教训了一顿。铁木申挨了揍，鲍利斯见了不救，逃之夭夭。铁木申十分生气，几乎把鲍利斯的行径叫做“叛徒”行为。这两个人从此不相往来，直到毕业考试时要相互作弊，才重新和好。中学毕业后，他们一起报考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因为记者可以“走遍国内外”，“成千上万的人读你的文章，知道你的名字”。但是两人都没有被录取。铁木申并不泄气，准备来年再考，而鲍利斯却对他说：“再过一年，你我都会被抓到军队里去当兵的。成天在那里‘一，二，一’。要再来考，起码也得等两年，甚至三年。”鲍利斯后来进了莫斯科食品工业学院，而铁木申真的当了兵，分配到海军。本来倒没有什么，可是想到上舰后的不愉快，……在给鲍利斯的信中，他写道：“说真的，鲍尔加^①，我羡慕你。大学，科学！我现在只得等待，挨过这些年头……”

第二天早晨，铁木申还没有起来，全舰就已经紧急集合，作好战斗准备，开往国境线巡逻。当巡逻艇开到某处时，舰长命令减速、下半旗。大家立正脱帽，他自己则把一个花圈抛到海里……铁木申疑惑不解。原来，这里有一个故事：在卫国战争期间，有一天，“神速”号巡逻艇上的水兵彼加，在岸上碰到一个失去双亲的九岁孤儿廖什卡，他就把廖什卡送上一条民用轮船，准备把他送到另一个城市的孤儿院去。正巧“神速”号为这条民用轮船护航。快要到达目的地时，“神速”号突然发现了敌人的潜水艇，一枚鱼雷正向民用轮船急速射去。情况非常危急。舰长当机立断，开足马力向鱼雷冲去。结果“神速”号触雷沉没，官兵全部牺牲，而民用轮船上的妇女、儿童都得救了。廖什卡长大后，看到杂志上登载这件事，就决心当个海军。而廖什卡不是别人，就是铁木申所在巡逻艇上的舰长、海军少校格雷宁。现在他

① 鲍利斯的爱称。

向海里丢花圈的地方，就是当时“神速”号遇难的地方。铁木申非常想把这个故事写信告诉鲍利斯，可是怎么也提不起笔来。为什么呢？这时他回想起了一件事。一次，他和鲍利斯一起到莫斯科附近的森林中去郊游。当时，铁木申站在卫国战争时期挖的掩体和堑壕边，对鲍利斯讲：“法西斯坦克开过来的时候，我们的战士就是守在这里的。”鲍利斯不相信，他反驳说：“算了吧！坦克根本没有到过这里，德国人离阿普列廖夫卡两公里就停下了。再说，就算这样，士兵站着去对付坦克又有什么用呢？子弹打装甲钢板，还不是鸡蛋碰石头？应该用坦克去对付坦克。”后来铁木申又问鲍利斯：“假如今天，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八日在阿普列廖夫卡森林里发现法西斯坦克，而且正在朝这个战壕开过来……它们离莫斯科只有四十二公里，那我们该怎么办？”鲍利斯倨傲地笑了笑说：“你真是个幻想家。难道现在还会让敌人跑到我们首都的鼻子底下？如果真的这样，那就火箭解决一切。只要一揿按钮——那就全飞了，整个城市可以毁灭，要是一个小国家，准叫它全部报销。战士操纵火箭发射台就象弹钢琴一样。”……想到这里，铁木申更提不起笔了。要是鲍利斯看到了“神速”号的事迹，他一定又会讲：“在这种情况下，舰长有权下这样的命令吗？本来是可以采取另外的……”

巡逻艇继续沿国境线驶去。铁木申被命令用望远镜监视附近海域。突然他发现一样东西在向前移动。他想报告，但又怕弄错，让人家耻笑，说他连一块烂木头也看不出来。就在这时传来了舰长的声音：“右舷 15 度发现潜望镜”。他命令全舰作一级战斗准备。原来这是一艘靠近苏联领海的敌潜水艇。铁木申担心因为没有及时报告而挨批评，但指挥员并没有责备他，而是要他加强监视。此时，铁木申想到，他们的巡逻艇可能被击沉，只要敌人的“鱼雷一放，老太太等儿子回去就成了一场空”。他怕

自己就这样无缘无故葬身海底，但又自我安慰：“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敌情已上报舰队，数十个观察站盯着敌人的潜水艇，数十枚火箭对准这个水域。最后，在铁木申他们监视下，敌潜艇离开了国境线，朝公海溜去。

返航时铁木申受到了表扬。这时他在想：“当水兵们听到战斗警报时，鲍利斯在干什么呢？”“为什么和他（鲍利斯）同年龄的人要多淋些雨雪，多过些担惊受怕的不眠之夜呢？”他便问阿发那西也夫：“你认为那些逃避兵役的伙伴们能捞到什么便宜吗？”中士回答他说：“这种人‘为数不多’，这些为数不多的人想在生活中抄近路，可是实际上，‘真正的距离要长得多’……”

巡逻艇在返回基地。铁木申又看到一只海浪上的花圈。这是其它战舰献的花圈。

（史峨山译）

苏修文艺动态

苏修俄联作协讨论 《勃兰登堡门旁》和《海浪上的花圈》

据《文学俄罗斯》一九七三年第四十七期报道，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作协最近召开“军事文学委员会”会议，讨论中篇小说《勃兰登堡门旁》和《海浪上的花圈》。会议由俄联作协书记阿纳尼叶夫主持。

报道说，所有发言者都指出，中篇小说《勃兰登堡门旁》的作者提出了“我们时代的重要的、有深远意义的问题”，描写了年轻的军人是如何“忠诚地”珍重父辈们的“金科玉律”的。而“国际主义”则是这本书的另一个“主题”。关于《海浪上的花圈》，与会者都认为小说中冲突“紧张”、海军生活“真实”、题材“意义重大”。

阿纳尼叶夫在会议结束时建议将上述两个中篇列入《功勋》丛书出版。

恰可夫斯基谈长篇小说《围困》

苏修《文学问题》杂志一九七三年第八期刊登对作家恰可夫斯基的长篇访问记，专门谈他的长篇小说《围困》。恰可夫斯基说，对于卫国战争的初期，存在着很大争论，他写《围困》的动机，就是要参加争论，联系战前国内生活的某些特点，说出他自己对这一“困难、复杂”的时期的看法。他在方面的“钥匙”和“根据”是“苏共中央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的决议”。

恰可夫斯基透露，有读者问他，为什么要写斯大林在战争的最初几天处在惊慌失措状态之中，他的回答是，这是“历史真实”。对于“历史事实”不应该“回避”或“沉默”。他自称对斯大林采取了“辩证的态度”。

恰可夫斯基还说，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到，《围困》会写得这么长，写了四部，还只写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如果以这个速度写下去，写到列宁格勒解围（一九四三年一月）还要再写四、五部。但他又说，一定尽力使第五部成为最后一部，即准备草草收场。

苏修发布一九七三年度苏联和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国家文艺奖金

据《文学报》一九七三年第四十五期报道，苏修中央和部长会议最近发布一九七三年度文艺、建筑方面的苏联“国家奖”。得奖名单如下：（建筑方面及部分艺术略）

诗人鲁科宁的诗集《必要性》。

语文学博士、教授麦特钦科的著作《亲生的东西、赢得的东西》。

诗人纳比·哈兹里（阿塞拜疆人）的诗集《海洋发源于山峰》和《诗歌与长诗》中的新诗。

“土库曼电影制片厂”的故事片《儿媳妇》。（导演、演员、摄影等均获奖）。

语文学博士佩尔佐夫的著作《马雅可夫斯基，生活和创作》。

*

*

*

据《苏维埃俄罗斯报》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廿一日报道，苏修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部长会议发布一九七三年度文艺、建筑方面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国家奖”得奖名单如下：(建筑方面及部分艺术略)

诗人瓦西利叶夫的长诗《尊严》。

作家阿纳托利·加里宁的中篇小说《战争的回声》和《回不得》。

作家霍杰尔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宽阔的阿穆尔河(即黑龙江)》。

鄂木斯克州话剧院的话剧《士兵的寡妇》(编剧安基洛夫及导演、演员等均获奖)。

剧作家索夫罗诺夫的话剧《飓风》和《遗产》。

故事片《从前线来的士兵》(导演、演员、摄影等均获奖)。

故事片《默哀一分钟》(编剧雷巴科夫、导演沙特罗夫以及演员等均获奖)。

苏修文艺界为柯切托夫举行葬礼

据《文学俄罗斯》一九七三年第四十六期报道，苏修文艺界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为“杰出的苏联作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柯切托夫举行葬礼。苏修作协、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作协、共青团中央、苏修武装部队以及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作家们送了花圈。参加葬礼的除死者亲属外，还有“著名的苏联作家、党的工作者、首都各界代表、列宁格勒作家代表团”。苏修作协书记、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作协主席米哈尔科夫主持了葬礼，他说：“在我们的文学里，苏维埃人创造性的劳动主题是同柯切托夫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是我们国家的英勇的工人阶级。”在葬礼上讲话的还有莫斯科作家组织第一书记纳洛夫恰托夫、苏军和海军政治部主任保尔佐诺夫上校以及《十月》杂志和列宁格勒的作家代表等。

叶甫图申科窜来亚洲活动后 发表新诗《日本……》

《星火》杂志一九七三年第五十一期发表反动诗人叶甫图申科的组诗《日本……》。在这组诗的前面，还刊登叶甫图申科自己写的一个前言。他说：“一九七三年我以《星火》杂志特派记者的身份到几个亚洲国家——日本、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度过了两个多月。

“在这次出访中，我到处有机会不仅接触到杰出的技术成就——特别是在日本，而且也遇见悲惨的社会不平；不仅同我们在亚洲的很多的朋友相逢，而且也碰到了敌人和那些不愿意了解历史发展规律、力图指望民族间分隔的人们。但是在我们的原子时代，所有国家的命运，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相互依赖的。所有的大陆，用共同的苦难、共同的斗争的海底电缆通过大洋联合在一起。”

《日本……》，这组诗由《古老的日本》、《东京》、《鱼市场》等十首诗组成。

苏修科学院新设普希金奖金

据《文学报》一九七三年第四十六期报道，苏修科学院文学和语言研究所将于一九七四年新设普希金奖金，其金额是二千卢布，由科学院主席团授予俄罗斯语言文学方面“优秀”著作的作者。参加竞选者由科研所、科学协会、高等院校、科研机关以及苏修和各加盟共和国的科学院院士和通讯院士推荐。

朝霞之诗

(日本电影剧本·摘译)

这个电影剧本原载日本《电影旬报》1973年10月号。作者：山内久、桂明子、熊井启。导演：熊井启。剧本通过开拓村的农民作藏及其一家的遭遇，反映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形发展下，日本的农业和自然资源正在不断地遭到破坏。现摘译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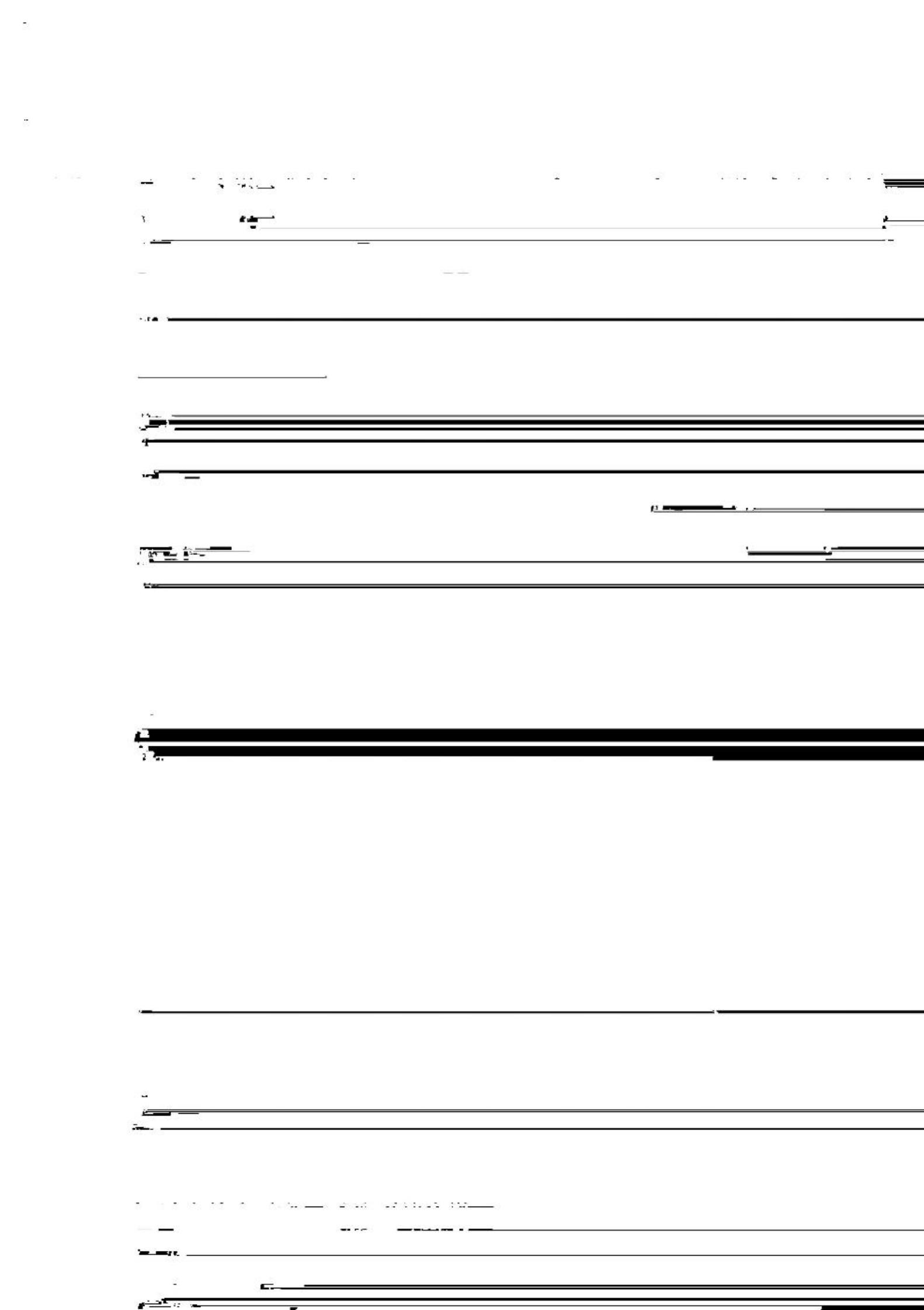
破晓前，满天星斗还未隐去。山坡下，一个人影正不停地挥舞着长柄镰刀，这是五十七岁的作藏在割牧草。他是开拓村的农民，当太阳从山峦那边升起的时候，割下的牧草已堆起了一座小山。作藏赶着马车朝家里走去。家里也是一派忙碌的景象。大女儿春子十九岁了，她和九岁的弟弟和夫在打扫兔子笼、收拾牲口棚。连七岁的小女儿道子也在草垛里拾掇鸡蛋。运草回家的作藏慈祥地注视着他们，从口袋里掏出野草莓递给和夫和道子。

朝夫是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石匠。他和春子相爱。这时他正在采石场上，举着铁锤，一下一下地往巨石打去。春子默默地坐在他身旁。朝夫歇下手来对她说：“……你的父亲真古怪。”

“本来我父亲也不会到这儿来。”

朝夫不解地望着她。

春子说：“父亲吃了很多苦，好不容易升到海军准尉……战争打败后，海军都解散了……”



她已准备把户口迁走。

“为什么？”春子吃惊地问。

八重子说：“过去的日子已经不会再来了。……从昨天的事就可以知道。不过，从前他可不是这样的人。”八重子回忆了作藏在海上的日子。接着又说道：“刚开始开荒时，我们还抱着美好的希望，以为从此就耕田、放牛，过着和平、幸福的生活。……我们决心要重新干一番，我也是拼命地干着，……可是事情并不那么如意，……贫穷使人也变了。”

春子说：“不过父亲一定会摆脱贫困的。现在他仍然抱着希望。他最爱干活，大家都说从没见过干活这样卖力气的人。父亲一定会把贫困赶跑的。”

八重子点了点头，但她已不想再回家了。

一天，作藏在耕田时发现了几片陶器的碎片，连忙叫春子送给博学家五味。五味发现这是七千年前绳文前期的文物，非常高兴。他立即动员了大批学生在作藏发现的地点继续发掘，又发现了不少文物。但是就在这时有消息传来，阿波罗观光公司准备出一百五十亿把这里的土地全部买去。

在小学校的仓库里，黑板上挂着收费的观光公路维纳斯路的远景规划图。前面坐着阿波罗的董事细木和塙越、县观光开发局课长饭沼和开拓村农协长虎平太等。在他们的对面坐着开拓村的村民们，打短工的为次、政春和军藏等赞成派坐在一角，边喝酒边啃着鱿鱼干在听饭沼讲话。

饭沼正打着官腔说：“本县享受着风光明媚的大自然，可是这样放着就白白糟蹋了。大自然只有向所有的人开放，才有它的存在价值。我们必须对城市生活的失去大自然的人们、为各

种各样公害所苦恼的劳动者、以及普通的市民们提供能消除他们身心疲劳的场所。这是本县的义务，也是我们进行观光开发的目的，我们必须建成维纳斯公路。”

饭沼的话刚一说完，坐在村民中的植物学家正木立即站了起来，朝黑板上挂着的地图走去，他在上面划了一个圈，说：“这儿是美峰的高层草原地带，如果公路通过，这儿的植物群落就要死亡。人们以观光为名，要把珍贵的植物群落从子孙那儿夺去吗？对此，我们许多植物学家正在担忧，……这儿植物种类繁多，超过八百多种，居日本首位……”

接着博物学家五味站了起来说：“大自然只有保存才有价值。人类也是属于大自然的，认为大自然从属于人类这种想法必须抛弃。大自然被破坏就意味着人类灭亡。这儿（他在地图中某处画了一个圈）是古代文物的宝库。如果计划实行，这儿就完全被破坏了……据今天报纸报道，有近百个观光公司正在物色地方。再过几年，大自然就仿佛被白蚁蛀过一样……”

农协长虎平太这时再也忍不住，向饭沼问道：“你们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开垦地搞成维纳斯游览地？”

饭沼被他出其不意一问，怔住了。

虎平太又说：“你刚才说的只是为城里人着想，那么我们呢？”

饭沼说：“人类和大自然、开拓村和高层草原地带以及古迹问题等，我们正在研究，会妥善处理的。”

他企图一句话搪塞过去，但立即遭到村民的反驳。

这时阿秀婆婆蹒跚地站起来说：“在战争时期，我们一家被打发到满蒙开拓团……在那里我失去了丈夫和两个孩子，好不容易又到了这儿开垦。我这次是第二次受骗了。就是死，我也不离开这儿的开拓村。”

阿秀婆婆一席话，使刚才还闹哄哄的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这时塙越乘机说：“好了，好了。阿波罗观光公司又不是恶魔。我们对补偿费还要仔细研究，尽量不使大家吃亏。今晚就到这儿……”

草草结束了会议。饭沼等人都走了出去。就在这时，刚从东京回来的稻城慎吾走了进来，他微笑着走到大家跟前说：“我是来听大家的意见的。你们相信这些人呢，还是相信我？”

大家没有作声。

慎吾说：“如果碰僵的话，你们二十五年的辛苦就白费了……还是先把阿波罗观光公司那点钱拿来好。”

大家闷住了。

慎吾笑着说：“用不着客气嘛。”他用温和的目光环视着众人，为次他们几个露出胆怯的样子。慎吾看到了春子，对她说：“听说你家的牛死了，很不幸啊。……你父亲好吗？”春子点了点头。

“……对他说，欠我的钱别放在心上，如果想再买牛，定钱我可以帮忙。其他人也是这样，和以前一样，无论多少钱，我都是肯帮忙的。”

为次说：“我们跟着稻城先生一定能胜利！”

慎吾走了以后，大家也都站起来准备回家。

“等一等！我还有话！”朝夫大声叫住了大家。他环顾众人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别去依靠稻城，他因农地改革成了穷光蛋以后，这儿干干，那儿干干，在国家出售国有林的时候，他从中捞到不少油水。这件事是众所周知的。”

村民直二郎说：“对啊……他过去和军部勾结，现在虽不出面，但在政界和财界中拼命钻营，赚了很多钱。这次他也是因为阿波罗的事匆忙赶回来的。”

军藏的老婆说：“你们嘴上说得凶，但光靠我们这些人能干什么呀，谁不是都借了一身债？”

为次对朝夫说：“你们家不也是这样？”又对众人说：“这里的人哪一个不向稻城先生借钱？大家加起来有几千万元呐。”他又转身骂朝夫：“你这个天杀的！”

朝夫气愤地说：“你这小子，借钱有什么不好！我可不象你对着稻城摇尾巴。”

朝夫的父亲与一慌忙喝住朝夫：“你胡说些什么？快回去！快回去！”

在家里，与一喝令朝夫，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能说稻城的坏话。并把以往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原来当初与一的妹妹在稻城家做女佣时生下了朝夫。朝夫的爸爸就是稻城死去的哥哥。

“那么现在我的妈妈在哪儿？”

“她已经死了。在东京的一个妓院里……”

朝夫呆呆地瞪着两眼，不一会在他的眼睛里就噙满了泪水。

一天，慎吾找到朝夫，要介绍他到阿波罗观光公司根尻办事处，去担任工地主任，并保证不插手开拓村的事。朝夫听后感到意外问道：“为什么叫我去？”

慎吾微笑说：“据我看来，熟悉这地方又有骨气的青年只有你了。你在那儿，对我也有好处。另外从长远来看，也是为你自己。总不能一直做石工，该考虑考虑结婚的事了。……”

朝夫没吱声。慎吾又说：“怎么样，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也对得起死去的哥哥了。”

朝夫听后，思想斗争得很激烈。

作藏自从死了牛以后，不久又从慎吾处借了三十万元买了一条小牛。他因养猪、种植果树和养蚕都失败以后，打算搞个牧场。他把牛牵回家后，春子、和夫和道子都欢呼着上来迎接。作藏脸上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当天晚上，春子和朝夫在公共仓库里幽会。朝夫已穿上了阿波罗的制服。春子眼望着远处说道：“二十五年前，这儿还是一片原始森林。父亲他们每天一棵棵地砍着树，每个人砍了几百棵，才成为现在这样……如果这儿铺上了柏油路，那么父亲他们二十五年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朝夫说：“……春，我明白你的心情。”

春子说：“我的真正的意思，你是不明白的。我一看到你穿着制服，就仿佛感到你的心也变成阿波罗的了。”

“别说傻话，春。如果我不去阿波罗，这儿就更糟了。”

春子不解地看着他。

朝夫充满自信地说：“我是想尽可能为被撇在一旁的开拓村做些事，才进阿波罗观光公司的。”

“可是，你也反对的话，应该和我们站在一起……阿波罗还是别去干吧。”

“我有我的想法……”

在开垦地上，作藏正在耕作。他突然发现山脊上红白两色的测量杆正在移动，他立即朝着测量员们奔去。在山脊上，为次、政春和军藏也在打桩。作藏从测量员手中夺过测量杆朝他们打去。不久村民们也闻讯赶到。人们分成阿波罗一方和反对派一方大打起来。正打得难分难解之时，朝夫他们乘坐的吉普车越过山坡驰来了。阿波罗的董事细木和司机跳下汽车往人群

奔去。朝夫却呆立着没有动。这时虎平太等人追着测量员甲、乙过来了。

“干什么？”细木说着，朝正在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的与一打去。与一被打倒在地。众人眼里迸发出愤怒的火焰，扑上前去揪住细木的脖子打了起来。

“住手！”朝夫高喊着奔了过来。

但虎平太他们对穿着阿波罗制服的朝夫毫不理会。朝夫抓住测量员甲的手道：“怎么回事，你们在测量什么？”

测量员乙、丙也被作藏追着逃来。

“这小子！”虎平太朝着他们扑去。

朝夫拼命喊道：“住手！住手！”

作藏狠狠地把测量杆的尖端对准了朝夫。

“朝夫！”作藏喊了一声。朝夫回过头来，就在这一瞬间，作藏把测量杆往朝夫刺去。朝夫慌忙躲开逃去。作藏紧追不舍。朝夫好不容易逃进了山上的山毛榉林里。他喘着粗气，回头向山下望去，这时只见测量杆呼啸着从崖下飞来，嗖地一声扎在树干上。

这次混战，阿波罗四个人受重伤。阿波罗观光公司的经理神山和董事塚越以及阿波罗观光公司根尻办事处所长清川来找慎吾。清川说：“当时您不是说过，开拓村的事一切由您包了吗？”

慎吾说：“可是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突然开始测量？”

清川说：“我们在工地上的办事处，总希望能早一天开工嘛……”

慎吾说：“所以说，你们不能轻视开拓村。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至今我为开拓村拿出那么多钱，不是无缘无故的。”

神山说：“对，在这个地方做事，还得靠稻城先生啰。”他装出

豪爽的样子说：“想冒昧问一下，需要几亿才能达成协议？……”

慎吾看了神山他们一下，冷笑道：“那个原大臣山本就任副经理的事，能确定吗？”

神山说：“我去问一下吧。”

慎吾说：“今天的事，如果警察大张旗鼓地搞一下，反对征用土地的运动就会高涨起来。……我也不愿意长期拖下去……不过希望尽可能快一些答复。”

清川说：“一切靠您了，稻城先生。哈、哈。”

神山等人走后不久，为次、政春和军藏三人卑屈地鞠着躬进来。他们请求慎吾：开发的事千万别吹了，希望能多给一些补偿金。……

朝夫愤愤地来找慎吾：“你说绝对不插手开拓村的事，我信了你的话……”

慎吾没有作声，朝夫又说：“你准备把我当作什么？”

慎吾说：“……我死去的老婆没有生男孩子，现在再要培养一个能顶用的兵也已太晚了。”

“你想把我当作你的兵吗？混蛋！”

“朝夫！”这时从隔壁房间里传来与一的声音。

朝夫站起来，迅速把门打开。与一和澄夫妇俩正端坐在一角。

与一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说：“不许乱说！先生为你一直在费心。”

澄接着说：“你知道你能进高中是托谁的福？学费全是先生……”

慎吾说：“算了，算了，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这时慎吾的嫂嫂绫温和地对朝夫说：“朝夫，请坐下吧。”

朝夫没法，只得坐下。

慎吾说：“不想做我的兵，那也没有办法。兵——不，养子，我另外再找吧。”接着他又说道：“可是你是唯一的有我们家血统的人。我代去世的哥哥照顾你是我的义务。我准备把遗产留给你，你和你父母亲就一生不用再干活了。如果你想和春子在一起的话，我立刻可以帮你的忙。”

朝夫没有作声。

慎吾说：“如果你不把我当作叔叔也没有关系。可是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心情。”

绫说：“……朝夫，我恳求你还是回到阿波罗去吧。你要体谅慎吾先生的心情。”

朝夫怀着复杂的心情望着绫，然后垂下了眼睛。

山被厚厚的乌云遮住了。濛濛细雨湮没了作藏家的房子。作藏刚从田里干活回来，突然从牲口棚里传出春子的惊叫声。作藏慌忙奔去一看，只见马躺在地上死了。在尸体旁边他发现有一个为次一直藏在身上的护身符。作藏拾起了护身符，他的脸色由惊愕转为愤怒，他把那硬硬的护身符捏得粉碎，直往为次家走去。到了为次家，只见为次站在猪棚边上。他猛地一把抓住为次的衣领，往他脸上打去。但为次并不还手。作藏的手突然停下，他发现猪棚里的猪已全部死了。作藏喃喃说道：“阿波罗……阿波罗……”踉跄地转身走了。

在政春的养鱼场里，近百条鲤鱼突然都死了。团团围着看的村民的脸上都露出疑惑的样子。政春从屋里出来，傻笑着往人们走去。就在这时，忽然有人在喊：“不好了，不好了，阿秀婆婆吊死了。”

政春狂笑道：“死罢，死罢，全都死光算了！”他抓起一条死

鱼，发疯似地对虎平太嚷道：“是你把我的鱼搞死的！”他把虎平太打倒在地。虎平太叫道：“不是我，这是阿波罗的阴谋！”

站在河堤上旁观的为次也叫道：“是你们把我的猪杀死的吧！”一下子众人都混战起来。作藏奔过来喊道：“住手！大家住手！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然后他放低声音对大家说：“知道吗？有人正在为我们吵架而高兴。”他沉痛地说：“……今晚我们大家给阿秀婆婆去守灵吧。”

几天后，塚越来找作藏，拿出一张纸，要他详细填写。作藏默默地接过纸，嚓的一声把它撕掉了。

塚越说：“嘿嘿，只存下你一家了。……”他翻着别家盖过印的纸说。“看吧，几乎都同意了。你好好合计一下吧……今晚十二时以前听你的答复，在这段时间里，办事处一直开着。”

晚上，作藏梦见从太空中象瀑布似地降下无数紫色的带子，把他捆绑起来。塚越在旁看着他发出了可怕的笑声。作藏被恶梦魇住，惊跳起来。房间里似乎还回荡着塚越笑声的余音，使作藏烦躁起来，逐渐在他眼里露出了杀意。他站起身来，打开箱子。这里放着他过去当海军准尉时的军服和军帽。他从衣服底下拿出一把短剑。他望了望正睡着的孩子们，眼里涌出了泪水。

作藏摸黑走出了家门，直往阿波罗观光公司的办事处走去。走了一半，忽见前面天空一片火红。那是办事处的所在地。他急忙往回走，耳边响起了塚越的声音：“今晚十二时以前……”作藏意识到这里有阴谋。他沿着田径小道往回走。大路上传来村民们奔跑救火的脚步声。这时只见朝夫也沿着小道迎面奔来。两人一下子停住步，作藏望也不望朝夫仍往回走。朝夫目送他远去，露出怀疑的眼光。在灌木丛里，为次和一个阿波罗的人正偷看着他们俩的举动。

在“山喜”小饭馆里。塙越、清川和神山通宵在打麻将牌。八重子不时给他们送来酒菜。

塙越说：“真被那个作藏弄得没有办法。让他在警察局关一段时期。这样开拓村也就一下子垮了。哈、哈……开拓村还是包给我吧。”

他对着八重子说：“你跟他断得好。可不用做放火犯的老婆了。”

八重子感到受侮辱，想要反驳，但终于什么也没说。

警察来找作藏，要把他带走。作藏拼命摇着警察的手问：“我是犯人？”

警察说：“有不少人见到你的。”

作藏愤怒地环视着众人。在角落里，春子正紧紧搂住和夫和道子。这时虎平太走上前说：“作藏，现在正是关键时刻，你干吗做这种事？”

作藏说：“虎……”

为次打断他的话，说：“你为什么那么晚在那地方徘徊？你已经不是晚上还到处游荡的年纪了。”

众人哄堂大笑。作藏感到村里人，就连自己的女儿春子都用怀疑的眼光望着他。他返身走进屋内。不一会，他穿着新衬衣、新裤子走了出来。他分开众人，慢慢地往警察的吉普车走去。警察慌忙赶上来给他戴上了手铐。

“是我！”就在这当儿，突然朝夫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他对警察说：“是我干的！”

众人都呆住了。与一和澄慌忙跑上前来。

与一说：“朝夫，你胡说什么！”

澄说：“你发疯了？”

朝夫说：“我没发疯，是我，是我干的。当事人已经说了，那是最确实的了。”

警察说：“你是阿波罗的人，会放火吗？”

朝夫说：“……你们……你们怎么会懂我的心情！”他是想以此来向慎吾报复。

警察没法，只得把他们两人都带走了。

“山喜”饭馆，神山、清川和塚越等正在频频举杯。

塚越高兴地说：“好了，这样工程马上就能上轨道了。哈、哈、哈。”他对八重子说：“你也一起来喝吧。今天是值得庆贺的日子。来喝吧，喝吧。”

八重子露出不满的样子，取出一个烟灰缸，递给神山说：“经理先生，请给我斟酒吧。”

神山莫名其妙，不知八重子是开玩笑还是正经话。八重子又对着塚越说：“请你斟满它。”塚越因八重子一反常态而目瞪口呆。

八重子说：“嗯，从开垦者这些人类的渣滓里拣来的废物，你们是不会给她斟酒的。”

她自己把酒斟入烟缸，说道：“但是，人类的渣滓正是你们。昨晚放火就是你们干的。游览地也好、维纳斯道路也好。趁着你们的高兴都去造吧！”说着，把烟灰缸里斟得满满的酒，往塚越他们的脸上泼去。

几天后，作藏和朝夫因证据不足被释放了。作藏找到慎吾家。慎吾看到作藏后怔了一下，但立即堆下笑脸和作藏打招呼。他拉开办公桌的抽屉说：“补偿金平均每家只能付四百万元……但是遗憾的是，大家因为要还债，几乎没剩下多少了。”

作藏没吱声。慎吾拿出一个阿波罗观光公司的大信封说：“这是你的借条……”他算了一下：“还剩七万八千元……”他从钱包里拿出八万元放在桌上说：“好好干吧，我给你写封介绍信好吗？象你这样的人，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没关系，是钢筋做的人哪！”

作藏没有回答。慎吾又说：“我很喜欢你，不，象我这样的人都喜欢你的，战争时期也好，和平时期也好……我们都是一起度过的……是真正的战友哪。”他把八万元塞给作藏说：“那么，再见吧……”把手伸向作藏。作藏握住慎吾白白的手，借条和钞票都散落在地上。作藏的脸上显出愤怒的表情，他那骨节粗大而黑黝黝的手上，每个手指都留着伤疤。这是他长年劳累的标志。慎吾想把手收回，但被作藏紧紧握住，动弹不得。慎吾微微有些吃惊，但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微笑道：“你怎么啦？”作藏盯住他，更用力握住他手。慎吾痛得脸色发白。

作藏紧握着他的手，慢慢把他推向窗边。慎吾的右手拼命想摔掉作藏的手，他用左手按着肚子——剧痛袭击到他的内脏。他额上青筋暴出，满脸虚汗。而作藏却意外地镇静，他冷冷地看着慎吾，把他按到窗口，一下一下往他的肚子打去。

这时门口出现了塚越和慎吾的秘书。塚越慌忙叫秘书喊警察。慎吾无可奈何地说：“算了吧，算了吧！”春子和八重子也吃惊地跑来了。八重子叫道：“你！……放了吧！”作藏回头望了她们一眼，松了手，慢慢走出屋子。

作藏和春子背着行李，默默地望着推土机工作，只听轰的一声，屋子整个都塌了下来。在作藏那噙满泪水的眼睛里，发出坚定的光芒。春子拼命忍住，不让自己哭出声来。昨天还是绿茵茵的田地，在推土机下变成一片棕色。捉虫、培土，象抚养婴儿

似地精心培植的玉蜀黍，已被埋在泥里。

春子跟着作藏来到小火车站。在这儿她送走了母亲、弟弟和妹妹。她们去横须贺投奔外婆家。在这儿她又送走了朝夫。他将去铁平岳的采石场工作。现在她又和父亲来到这儿。他们打算去鹤见找作藏海军时代的朋友，作藏准备在铁工厂做门警。但到了车站后，作藏却默默地坐在长椅上沉思，过了一会，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车票交给春子。春子拿来一看，吃了一惊，这不是去鹤见的车票。作藏慈祥地望着她说：“你去找朝夫吧。”

“那么，爸爸，你……”春子迷惑地望着作藏。

“我打算去五味先生那儿，一生就种蔬菜了，那是我所喜爱的。”

这时火车拉响了汽笛，马上就要到站了。作藏送走了春子后，立刻背起了行李，踏着坚定的步子往前走了。

(薛毅译)

日本文艺动态

日本出版访华诗集《火红的海》

据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四日，日共(左派)机关报《人民之星》报道，诗人磯永秀雄的访华诗集《火红的海》，已由长周新闻社出版。到现在为止，许多文学工作者访问了中国，正式的访华诗集的编辑出版，这是第一次。磯永秀雄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作为山口县文学工作者访华代表团之一员，曾在社会主义中国访问了一个月。

报道谈到，磯永秀雄以前一贯不断地歌颂“海”，他歌颂的“海”，就是人的可贵，人民的伟大，对明天充满信心的人。在《火红的海》中，可以看出他在社会主义中国找到了他不断追求的那个“海”而很感动。在颓废和怠惰、末世学和灭亡之歌的泛滥中，诗人的这本赞扬社会主义中国和人的可爱的诗集，一定会激励日本人民。

报道还谈到，作者在后记中说：“我在大陆看到了‘海’，……这本诗集也是一九七二年的中国的简朴的见闻报告。”

《火红的海》共收录了作者访问广州、北京、延安、西安、上海、湖南等地所写的二十首诗。

另据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日本《人民之星》报道，十二月九日下午，在下关市水产会馆，由骆驼诗社、流域同人会和长周新闻社主办，举行了磯永秀雄访华诗集《火红的海》出版纪念会。在出版纪念会上，大家谈到读了《火红的海》后那些地方受感动，受鼓舞，谈到人民的诗的出色的威力，也谈到应该如何把它作为自己的生活和活动上的鼓励。出版纪念会一开始，就由《流域》同人富成博代表主办者致词，他说这本诗集指明了现代诗的方向。磯永先生不仅在中国看到了海，也看到了在中国的对面的日本的海，看到了日本的未来。他希望大家都来读这本诗集，希望过去不接触诗歌的人也来读。写诗的人也可借此机会考虑一下新的出发点。

《人民之星》发表文章 批判胜山俊介的电影剧本《小林多喜二》

日共(左派)机关报《人民之星》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七日刊登了批判胜山俊介的电影剧本《小林多喜二》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试图用小资产阶级人性论来诽谤革命作家》。文章一开始就提到宫本修正主义集团正在拍摄影片《小林多喜二》。今井正导演。胜山俊介的电影剧本《小林多喜二》也在《文化评论》十一月号上发表。影片将在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初次放映。宫本集团用《早春赋》话剧来严重歪曲多喜二的形象，他们还不满足，又要进一步干反革命坏事。宫本集团想用电影来描绘哪种样子的多喜二的形象呢？根据电影剧本，就暴露了他们的险恶用心，有批判的必要。

文章指出电影剧本中的多喜二，只能看到他的量变(如解说词中有“他成了无产阶级作家”或是“入党”等等)，而看不到生动和具体的质变和飞跃。作者没有着眼在多喜二的改造世界观和彻底解决立场问题这些方面。

文章指出电影剧本还煞费苦心地贬低革命作家多喜二，抬高藏原惟人和宫本显治等。

蓝 衣 骑 士

(美国长篇小说·梗概)

长篇小说《蓝衣骑士》的作者约瑟夫·万鲍是洛杉矶市警察局的一名侦探。他在这部小说里塑造了一个行将退职、但对警察的“荣誉”恋恋不舍的老年警察的形象，通过他退职前夕的各种遭遇，描绘了美国大城市中光怪陆离的社会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警察的无能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故事梗概如下：

警察邦珀今年五十岁了。他从三十岁起穿上蓝色的警察制服在洛杉矶市的大街上巡逻，至今已有二十年之久。他在自己巡逻的地段颇有威名，饭店的老板们都不得罪他，免费招待他一日三餐。一些酒鬼、毒品贩子等社会渣滓也怕他三分，往往远远望见他走来便逃之夭夭。因此他的未婚妻卡西戏谑地称他为“蓝衣骑士”。

但是，近来邦珀觉得自己的身体不比当年了。他的身躯变得肥胖臃肿，行走颇为不便，加上胃病又经常发作，继续当警察显然已不合适，所以他决意退职，转到一家电子公司去当治安主任。正好这时卡西也准备辞掉她在洛杉矶市专科学校的教师职务，去旧金山市附近一家女子学校应聘。她本来打算在下星期一离开洛杉矶，到那家女子学校去接一下头，等月底邦珀退职时再赶回洛杉矶跟他结婚。使卡西喜出望外的是，邦珀在星期二晚上决定改变他原定月底退职的主意，提前到星期五跟卡西一起退职，一同去旧金山。邦珀的老友、巡官克鲁兹十分支持邦珀

的这一决定，因为他知道邦珀跟前妻离婚已有多年，邦珀的儿子比利又早死，所以邦珀很孤独，需要得到安慰，而卡西正是他的理想伴侣。她年纪虽已四十开外，但长得很年轻，前夫又没有给她留下孩子，无牵无挂。何况卡西还受过正规教育。象这样合适的人真是千载难逢啊！因此克鲁兹竭力劝邦珀早点成亲，不要误了大事。现在邦珀决意提早退职，克鲁兹自然为他高兴。

这样一来，邦珀当警察的日子只剩下三天了。二十年来捉强盗、抓酒鬼立下的功绩使他感到光荣，也使他对警察生涯依依难舍。他决心在这余下的三天里再大干一场，在功劳簿上添上最光彩的几笔。星期三一大早，他就叫一个珠宝商把他胸前的徽章擦得闪闪发光，驾驶着他的警车在洛杉矶街头巡逻。突然他瞥见一个名叫佐特的赛马赌注记录员站在街边一个信箱旁。邦珀知道他又在记录赌注了。原来佐特为了逃避警察干涉，记录赌注时总是站在信箱旁，把赌注写在一个寄给自己的信封的背面。当他一发现有警察走过来时，立即把信封投入信箱。这样，警察就抓不到他的罪证，而赌注记录却安然无恙。不料邦珀深知此道。他故意把警车开过信箱才停下，然后跳下车慢悠悠地朝佐特踱过来。佐特连忙打开信箱的小门把信塞进去。就在这一瞬间，邦珀一个箭步猛扑上去用力压紧信箱的小门轧住佐特的手腕。佐特痛得尖叫起来，大声求饶。邦珀逼他招供，佐特承认他每次把赌注记下来后，就用电话向另一个人报告，那个人的电话号码是 6682733。邦珀这才让他抽出轧在信箱里的手，接着又从他那里了解到他的头子是大赌主斯卡洛达，这正是邦珀搜寻了很久的罪犯。邦珀立刻把佐特带到警察局，让警察查理审讯他。佐特向查理供认他把赌注报给一个名叫里芭的女人，她负责一个赌注转报站。查理知道里芭是斯卡洛达的情妇，抓到了她就揪住了斯卡洛达的尾巴。查理和邦珀都为得到这条

重要线索而兴高采烈。他们商定明天去捉里芭，如果她供出一个地下办公室的话，再去搜查这间办公室。

邦珀取得这个重大战果后再度驾车上街巡逻。他打开汽车上的无线电对讲机，对讲机传来了叫他马上赶到百老汇街和九号街的交叉路口的命令。邦珀来到那里，只见巡官格兰特正站在一个“新兵入伍中心”附近，“入伍中心”的大楼前有一群示威者设置了纠察线。格兰特请邦珀监视着这群示威者，他自己走进大楼去向上司汇报，研究对策。邦珀遵命盯着这群示威者。过了一会儿，示威者的队伍里走出一个名叫司各特的青年。他过来主动跟邦珀攀谈，另外还有几个青年也围了上来。司各特问邦珀，警察为什么老是干损人的事，而不干有益于人的事？邦珀竭力为警察辩解。他说警察也做过抢救婴儿、在洪水中救人等有益于社会的事。当然，有时警察也要打人、踢人、收集名单，但这正是为了保护大多数人。邦珀滔滔不绝地说得起劲，有的示威者被他激怒了，大声斥骂他。邦珀跟他们对骂起来。有个黑人示威者向邦珀迎面扔来一个别针，刮伤了他左眼的下方。邦珀大怒，跟示威者冲突起来，示威者一哄而起把他团团围住。正在危急之际，他乘坐的警车中有人伸出一只手来在他背上拍了一下，招呼他赶快躲进车里。邦珀回头一看，见到在情报部工作的斯坦端坐在驾驶盘前面。他急忙钻进汽车，乘车闯出了重围。邦珀惊魂甫定，斯坦就责怪他不该在示威者面前发表讲话，更不该讲警察打人、踢人的事，出自己的洋相。斯坦还告诉邦珀，那个跟他攀谈的司各特是示威者的头头。他故意诱骗邦珀讲话，让身边一个女青年开动手提包里的录音机，把邦珀的话全部录了下来。倘若这个女青年把邦珀的话公开发表，他就会变成全警察局的笑柄。幸好示威者中的那个黑人是警察局的密探，又是那个女青年的相好，他一定会设法把邦珀的讲话抹掉的。邦

珀听到这里方才定下心来。

邦珀驾着警车东游西荡，不觉已是暮色苍茫。他想起老朋友巡官克鲁兹今天请他去吃晚饭，便驱车来到克鲁兹家。克鲁兹夫妇一共生了九个孩子，原是个美满的家庭。但自从他们的长子埃斯特本在越南战死后，克鲁兹一家的生活就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一天，克鲁兹和邦珀两个老朋友在酒醉饭饱后闲聊起来。克鲁兹再次诚恳地劝邦珀不要迷恋危险的警察工作，尽快跟卡西结婚。他提起邦珀在睡梦中时常呼唤他死去的儿子比利的名字，有时还会失声痛哭。由此证明，人的生活里是不能没有爱的，特别是临近暮年更是如此。邦珀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觉得如果不去爱别人，自己反而更安全。克鲁兹说：“你在某一方面说来是安全的……可是如果你不爱别人的话，你的灵魂就处在危险之中了。”邦珀问他，在埃斯特本死后他是否仍然坚持这种想法，克鲁兹长叹一声说：“是的……甚至在埃斯特本死后我仍然感到这是真理。”邦珀十分感激老朋友对他的一番好意，决心照他的嘱咐去做。

星期四早晨，邦珀正开着汽车在街上巡逻，忽然从无线电对讲机上传来要他立即回警察局的急电。邦珀赶回局里一看，原来是查理请他一起去捉里芭。邦珀便跟查理以及另外两个警官一同来到里芭的赌注转报站附近。查理和邦珀借用一个电话亭打电话给里芭，假装报赌注，另外两名警官埋伏在转报站门外。查理刚跟里芭接上电话，马上向那两名警官打暗号。他们立刻撬开门冲进去把里芭逮住，发现她身旁的一块黑板上写着的赌注还没有全部擦掉。罪证确凿，里芭无法抵赖。查理抓住她怕坐牢受苦的弱点，逼她交代出斯卡洛达的一个地下办公室地点。查理答应保护里芭，不让斯卡洛达知道是她供出来的，以免遭他报复。

邦珀离开里芭的转报站，吃过午饭，就到法院去出席对犯人兰德里的预审。兰德里是个贩毒、行凶的惯犯。邦珀通过一个

告密者获悉兰德里住一家旅馆里，室内藏有毒品和一枝枪。邦珀去旅馆找到他的房间，进去一搜查，果然搜出了毒品和枪枝，就当场把兰德里逮捕。今天他和旅馆老板一起出庭作证。邦珀为了保护告密者，编造了一些细节。谁知弄巧成拙，这样一来他的证词就跟旅馆老板的证词大有出入，漏洞百出。更糟糕的是，邦珀没有注意到兰德里在旅客登记簿上用了个化名，因此连犯人的名字也搞错，闹出了大笑话。最后，法官宣布兰德里无罪获释。预审结束后，法官叫邦珀留下来，说要定他假证罪，把他关进监狱。邦珀这下可吓坏了。他向法官承认他是为了不泄露告密者才撒谎的，并且再三恳求法官顾全他这个“蓝衣骑士”的体面，不要定他假证罪。法官明知兰德里是个可疑分子，也知道警察出庭作证时难免要编造些谎话，但邦珀这次出的漏子实在太大了。碍于法律条文，她无法对兰德里判罪。她只得警告邦珀以后要老实一点，不要使法庭为难，可是她还是饶了邦珀，不定他的假证罪。

邦珀垂头丧气地走出法庭以后不久，警车的对讲机又传出指令，要他迅速赶到弗蒙特街去。邦珀猜想肯定是查理找他。他到了那里，果然见到了查理。查理告诉他，他们到里芭交代的地点去侦察过，探出斯卡洛达的地下办公室设在一家洗衣店楼上。办公室里藏有大批赌注记录，而且斯卡洛达的左右手菲什曼今天正好到办公室来。查理已派人去取搜查证，等人一到马上动手搜捕。查理请邦珀在洗衣店后门等着，他们一占领这家地下办公室，就立刻叫他进去察看战果。邦珀照查理的吩咐绕到洗衣店后门口，看见墙边有一道直通三楼的很陡的太平梯。邦珀心里盘算：今天要是逮不住菲什曼，弄不到确凿的罪证，被菲什曼反咬一口，我邦珀可又该倒霉了，说不定真的要去坐班房了。因此，成败在此一举，非得抓到菲什曼不可！邦珀拿定主意，就登上太平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爬上三楼。他想踢开后门冲进

去，但门栓住了，怎么也踢不开。他只好踢碎玻璃破窗而入，大腿和额角都划破了，鲜血直流。这时，菲什曼和一个女人手里捧满了纸盒正走到门边，见到从窗口跳进来一个血淋淋的警察，不禁大惊失色。菲什曼连忙奔到太平梯口准备往下逃。邦珀一把将他揪住。菲什曼大叫：“放开我！”邦珀知道他如果一松手，菲什曼肯定会摔下去。可是他转念一想：要是让菲什曼摔下去，他就休想再奈何我邦珀了。于是，他就把手放开，菲什曼连人带盒跌到下一层的梯口。查理闻声赶来，立即用救护车把菲什曼送往医院。这场搜捕总算破获了一个地下办公室，但菲什曼却摔成重伤。

邦珀连日来在“新兵入伍中心”前受辱，在法庭出丑，好不容易拿下一个赌博地下办公室，却又摔伤了一个要犯，可谓倒霉透了，但他万万没想到更大的打击还在后头。他原来跟克鲁兹约定，星期五中午两人同到西摩饭店去吃午饭，庆贺他的退职。但等他按时赶到饭店里时，没见到克鲁兹。邦珀朝街上望了一眼，看见附近一家药房前停着几辆警车和一辆救护车。他急忙赶去看：克鲁兹的尸体躺在血泊中。原来克鲁兹是到药房里给邦珀买一包雪茄烟时被人打死的。邦珀悲痛地跪在克鲁兹身边，不禁想起了克鲁兹前晚跟他讲的那番关于爱的谈话。他觉得克鲁兹完全错了，他发誓要继续巡逻，此后只要荣誉，不要爱情。他给未婚妻卡西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克鲁兹死了，他要帮助料理后事，因此不准备跟她一起到旧金山去了。接着，他不顾卡西苦苦哀求，毅然挂断了电话，重新登上警车，发狂似地准备去捣毁一家他厌恶已久的酒店……

附：作者约瑟夫·万鲍，三十六岁。在洛杉矶市警察局任职已有十几年，现任侦探长。作品有描写警察的长篇小说《新新人队长们》。
(闵镝译)

狮子头们

(美国长篇小说·梗概)

长篇小说《狮子头们》1972年在美国出版。作者乔赛亚·邦廷曾在侵越美军中当过军官。

小说的情节比较简单，近乎战争实录。作者以讽刺的笔调揭露了侵越美军内部的黑幕：一小撮高级军官为了自己加官晋爵，竟然不顾士兵的死活，不给他们提供必需的运输设备，使他们糊里糊涂地当了炮灰。小说通篇笼罩着失败主义情绪，反映出日益衰落的美帝国主义在越南一筹莫展的困境。故事梗概如下：

驻扎在越南南方湄公河三角洲的美军第十二步兵师，又名“狮子头师”，是一支屡立战功的精锐部队。师长莱姆明少将是个颇有军事才能的指挥官。他善于迅速地摸清敌军的动向，及时地抓住战机，因此深受下级敬仰。莱姆明对此十分自负，从来不能容忍下级向他提出批评。谁要是胆敢说出半句跟他意见不合的话，马上就会被逐出“狮子头师”。莱姆明还要在这个“异端者”的“功效报告”上写上一两句致命的批语，使他永世不得提升。簇拥在他身旁的一些军官们都慑于他的淫威，俯首贴耳，唯唯诺诺，不敢越雷池一步。经常盘旋在他们脑际的问题是：“莱姆明喜欢我怎么干呢？什么能够博得他的欢心呢？”当那帮副师长和参谋长跟他谈话的时候，他们都注视着他的眼睛和嘴唇，细心地察看着他的表情的微小变化，一边专心致志地听着他讲的话，连一个尾音变化都不放过。当觉察到他快要讲完时，他们不

等他最后几句话出口就赶紧点头表示赞同。他偶然说句笑话，他们马上嘻嘻地跟着笑。“我想这些小杂种已经进入这个地区了。”莱姆明说着，一边指着地图上一块绿色的地方。他随即转过身来，眼光落在恭恭敬敬地站着的军官身上。那个军官就会点头附和说：“是的，阁下，那是个好位置。对的。我现在看到了。”莱姆明就是这样以骄横使他的部下慑服，树立起自己的威信；他的部下就是这样靠阿谀逢迎一步步爬上晋升的阶梯。

莱姆明属下有三个旅。第二旅旅长曼利和第三旅旅长莫顿都是他的得力干将。早在朝鲜战争期间，他们就在莱姆明手下执鞭随镫。越南战争爆发后，他们又来到莱姆明麾下指挥作战，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特别是曼利统率的第二旅，虽然在作战中伤亡惨重，使曼利获得了“屠夫”的外号，但“歼敌”数字两个月来连续保持最高纪录。莱姆明十分器重他，引以为全师的光荣。莱姆明一心倚仗这些能征善战的悍将，建树显赫的战功，以便他早日登上梦寐以求的总参谋长的宝座。可是，在他高升的道路上还横梗着一块绊脚石，这就是第一旅旅长乔治·罗伯逊。

罗伯逊外号叫“得过且过的乔治”，是个爱好文学，对军事漫不经心的人。他在西点军校学习期间就经常写诗歌，说笑话，睡懒觉，屡受关禁闭处分。他就这样混到一九五〇年夏天，领到了毕业文凭，并受命在军队服役。在他度假期间接到去朝鲜作战的电令。在朝鲜战场上，由于他带领的一个排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次夜袭中坚守住阵地，受到了上级的奖励。朝鲜停战后，他回国在西点军校教西班牙文，后在华盛顿担任翻译，两度去马德里的美国大使馆出差。就在他第二次出差期间被征召派往越南前线，在莱姆明手下任第一旅旅长。罗伯逊到了越南后，继续保持着他得过且过的作风，因此他的第一旅总是作战不力，拖了全师的后腿。莱姆明对此十分恼火。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下午，

莱姆明特地把罗伯逊找来问话，作战军官格拉布和情报军官克劳福德也列席了。

莱姆明点着了一支烟后开腔了：“乔治，今天上午作简况汇报时你是在场的。我们关于你的空军装备的情况简报跟你的部下告诉你的一致吗？”莱姆明的眼睛眯成一条缝，象钳子一样盯紧罗伯逊。

“是的，阁下，大致相符。不过，当然啰，象这样的简报还未汇报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过时了。我们每天都有可靠的估计情报和强功率计算机提供的情报，但是我们不能总是依靠它们。”

莱姆明气呼呼地问：“为什么不能呢？”

罗伯逊有几秒钟没有说话，假装察看着他的手指甲。“因为一条船只行十浬，而直升飞机飞一百二十浬。你要第一旅跟敌人交锋取胜，将军……我很尊重你的意见……不过你得保证我们得到空运装备。”

“我们以前已经讨论过这件事了，罗伯逊。”

“对，阁下，我们以前讨论过了，但我们旅继续被扣押装备。”

莱姆明见罗伯逊居然跟他顶嘴，不禁怒火中烧。他命令克劳福德等向罗伯逊介绍了“敌情”之后，就把他们打发走了，叫罗伯逊单独留下来“谈话”。

克劳福德等刚走，莱姆明就单刀直入地询问罗伯逊：“谁是安东尼，不，安东尼·特罗洛普？”他手里拿着一本题为《首相》的书。“我的副官在我吃午饭的时候把这本书交给我的。书上有你的名字。他说这本书是今天早晨在直升飞机场上从你的口袋里掉出来的。”

“是个英国小说家，将军。你会喜欢他的。”

“你在直升飞机上看这种东西？”

“是的，阁下。途中看看。不行吗？”

莱姆明不理睬他提的问题。“乔治，你带第一旅带了三个月，可是你啥事也没干。”

罗伯逊没有答话，只是玩赏着莱姆明书桌上摆设的玩具。莱姆明以冷冰冰的声调继续说：“河下游的第四军团所在地越共多如牛毛。那里的河边游动基地，三夜有两夜要挨迫击炮。你们的歼敌数字一直被引为笑柄。听着，罗伯逊，限你一个星期做出点成绩来。整整两个营的兵躺在那些该死的船里，整天看看电影，大吃大喝。把他们从船里赶出来，叫他们上该死的战场上去了。我说得够……”

“是的，将军，十分清楚了。”

莱姆明最后平静地说：“别报给我一个混账数字，乔治。你就滚出去吧。”

“是，阁下。”罗伯逊深知莱姆明的厉害，再跟他争辩下去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只得退了出来。

莱姆明为什么这样限时限刻，急于星火呢？这是有原因的。一九六八年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在大城市中对美军发动了强大攻势，袭击过西贡的美国大使馆，使美军丧魂落魄。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在奇袭成功后，又迅速四散隐蔽。莱姆明接到上司的命令，要他设法探出“敌军”隐蔽的地点，孤立、聚歼他们，使他们无法再进入城市进行骚扰活动。上司将根据各师“歼敌”的数字论功行赏。莱姆明觉得这是他建功立业的好时机。因此，他命令罗伯逊务必在一周之内歼“敌”第三一七营。

罗伯逊指挥的第一旅的战区在湄公河三角洲中部，那里是河渠纵横的地带，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的第三一七营和一些游击队经常出没于这个水乡，不断给予美、伪军以沉重的打击。为了适应这种地理条件，罗伯逊的第一旅与海军协同作战。

海军用小型舰艇把第一旅的步兵运送到预定的登陆地点，然后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上岸冲锋。但是，这样的作战方式缺点很多：舰艇目标大，容易被岸上发现，遭到截击，造成伤亡；而且舰艇速度慢，对方在岸上远远望见后便立即转移，往往使美军扑个空。莱姆明和罗伯逊都觉得用舰艇运兵不如用直升飞机好，但是海军司令康纳福夫对海陆军联合作战很赞赏。莱姆明不想得罪这个三星上将，只好让罗伯逊的第一旅的士兵仍然靠舰艇运送。

在跟部下制订作战方案时，罗伯逊决定向莱姆明申请拨给他们一些直升飞机，用来把一营美军直接送到战场上去，这样可以减少伤亡，取得较大的战果。但是，这个方案遭到莱姆明的否决。他断然告诉罗伯逊，他已经把直升飞机拨给第三旅，因此第一旅的士兵全部要靠舰艇送往战场。罗伯逊和跟他协同指挥的海军军官都表示异议。莱姆明向他们解释说，海军部长伊格内修斯今天要亲临前线视察。海军司令康纳福夫自然不愿在部长面前出乖露丑，难道他会乐意让直升飞机运送步兵吗？其实，莱姆明还有未尽之言：他为了确保自己的前程，决不肯触犯这些军界的头面人物，这就只能牺牲第一旅的士兵了。

罗伯逊的作战方案被否定后，心情十分沉重。他指着窗外正在受训的新兵对他的部下克莱本少校慨叹道：“你看见在下面那边听着中尉讲话的那些小伙子们了吧？他们都是好小伙子。六个月以前他们还在拆汽车，写论布雷特·哈特的文章。现在他们都在这里。他们大多不知道为什么到这里来，或者没有头脑去理清这些问题。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就要去送死了……”

罗伯逊所指的“好小伙子”，可以拿一等兵康佩拉为例。康佩拉在中学里读书时是个篮球健将。在他中学毕业那年，由于他担任主将的球队在州级篮球决赛中只捞到个亚军，康佩拉的声誉从此一落千丈。很多名牌大学都把他拒于门外，加上他在家

中跟父母的关系也很不好，因此当他接到征兵通知的时候，以为可以借此摆脱烦恼，便糊里糊涂地到了越南，被派到罗伯逊的第一旅来。而今他又登上开赴战场的舰艇，参加他的第一次战斗。

舰艇在行进途中受到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的袭击。康佩拉所在的那个班的士兵死伤大半，只剩下康佩拉和其他两个士兵。他们三人上岸后被指派守住河岸上的一条要道。他们等了半天不见“敌军”出现，开始麻痹起来。正在这时，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冲出重围来到河边。康佩拉急忙开枪射击，交锋中头部被打成重伤，又未得到及时抢救，终于伤重身亡。战斗结束后，第一旅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捷，但也因没用直升飞机而造成不必要的伤亡。罗伯逊的部下纳普上尉在起草呈报莱姆明的战后报告中，故意就直升飞机问题对莱姆明提出责难。报告写完后，纳普上尉和克莱本少校一起去向罗伯逊汇报。

他们发现罗伯逊独自坐在他整洁的书房里，望着他自己喷出的雪茄烟烟圈。他虽然连续四十个小时没睡觉了，但是他的神情却显得很镇静、安详。他没抬头就知道他们进来了，做了个手势要他们平静地谈。

克莱本表示关切：“请原谅，上校。我们很抱歉在现在这个时候打扰你。纳普已经写好战后报告的初稿。我估计你跟莱姆明将军联系过了吧？”

罗伯逊点点头。“我跟将军谈过了。他昨天整天待在第二旅，不过今天下午我给他打了电话。”

“他高兴吗？”

“高兴。将军高兴吗。……说得真有趣，查尔斯，将军高兴吗？”

“你要我们过一会儿再来吗，上校？”

“不，我的朋友们，你们留在这里使我高兴。你们确实希望

使你们的上校高兴，不是吗？”

克莱本和纳普都觉得旅长今天有点反常，也许是太疲劳的缘故吧？

罗伯逊最后终于改变了吹毛求疵的口吻，正色说：“是的，查尔斯，那个伟人是高兴的。我相信你们都不准备使他烦恼。”

“我不能这样说，阁下。纳普上尉把战后报告写好了。……你想在上报之前看一遍吗？你应该看看，上校。”

“我应该看看，嘿，更不用说要签字了，对吗？”

纳普象一个小学生把一份成绩很差的报告单交给父亲一样，将战后报告交给罗伯逊。他和克莱本紧张地期待着罗伯逊发表不同意见。但是罗伯逊读完后，脸上没有丝毫反对的表情。

“你要知道，纳普，”罗伯逊说，“当我听见你和少校走进来的时候，我期待你们会问我一个问题。不是你们问的那个问题，不是请我看报告，而是问一个自从我们进入建和（音）以来没人问过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问题。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克莱本和纳普面面相觑。“不知道，阁下。”纳普回答，对自己深为不满。

“你们不知道，嘿？你们的上校不高兴了。”罗伯逊说，“好吧。我们在水上和岸上玩得够久了。我们这次损失了多少，查尔斯，海军除外是十六个牺牲，七十多个受伤，对吗？”

“是的，阁下。”

“我正在想我们一位地位很高的朋友，比莱姆明将军还要高。我正在想我们的贵宾，那个讨厌直升飞机，要我们再次显示水上运兵能力的人。你们现在想得起我指的那个人了吧？”

“上帝啊。他没有来。那个狗崽子没有来。”

“不。他没有来。昨天十四点钟他钻进一架 C—130 飞到

达南（音）去给一些水兵授勋去了。今天下午他就要飞回华盛顿。”罗伯逊的声音冷冰冰的。“不过别叫他狗崽子。他不知道，而且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为了他昨天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说完罗伯逊就提起笔来，在战后报告上签了字。他明知这个报告交上去后会激怒莱姆明，对他自己的前途不利，然而他还是命令克莱本和纳普将报告送呈莱姆明。

结果，不出罗伯逊所料，莱姆明读了这个战后报告后不久，就撤了罗伯逊的旅长一职。莱姆明自己却因为这次大捷高升了。他被提升为中将，受命去卡尔曼堡的“战略福利研究中心”担任司令官兼主任。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莱姆明在“狮子头师”师部接受了总统授予的“特殊功勋奖章”。恰巧在同一天，康佩拉的下葬仪式在他的家乡举行。康佩拉的老同学刘易斯说出了出席葬礼的人的心里话：“这场可恨的战争……有目的吗？他为什么死掉？不是白白送死吗？他干了什么呢？”愤怒的抗议声在墓地的上空回荡着……

一九七一年八月，罗伯逊已经退伍，在他的家乡靠年金过活。莱姆明仍然在卡尔曼堡担任要职，他满怀希望地等待派他到欧洲联军去任最高统帅。他在自传《步兵将军回忆录》中提到一九六八年五月的那场战斗时公然写道：第一旅“并不因为没有直升飞机…而造成了更大的伤亡……”

附：作者乔赛亚·邦廷，出身于地产经纪人家庭。曾在海军服役两年。1959年进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学习，1963年毕业，后去英国牛津大学研究美国现代史。回国后被征召赴越南前线服役。现在美国西点军校任历史助教。

他谈到自己在越南引起思想转变的过程时说：“这不是因为看见一场大屠杀或类似的东西引起的。它是一种缓慢的、

隐蔽的变化：是对军官们的盛气凌人的厌恶……。我得出结论，我们已经到了这步田地：无论我们能够赢得什么，也永远不足以补偿我们所造成的痛苦。”

（洪滂博译）

美国政坛动态

“旧金山滑稽剧团”演出《母亲》

据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三日的黑豹党机关报《黑豹》报道，“旧金山滑稽剧团”最近为黑豹党的“生存计划”募捐，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演出高尔基原著、布莱希特改编的话剧《母亲》。剧团为配合美国当前的斗争对剧本进行了适当的改编。演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场内座无虚席，掌声雷动。

《黑豹》的报道指出：“伟大的艺术来源于正确的政治。”“《母亲》的政治意图显然是支持——而且事实上是鼓动——人民的革命活动。当母亲在做宣传工作时，她转向观众发表议论说：‘你们的主人会叫象你们这样的人去制造军火，但是象你们这样的人会决定开枪打谁。’”

《黑豹》的报道最后说：“正如母亲在临近剧终时所评述的：‘人类的命运就是人类自身……今天的受害者将成为明天的胜利者。’”

美国黑人女诗人举行集会 纪念菲利斯·惠特利的诗集出版二百周年

据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九日《纽约时报》报道，二十名黑人女诗人，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初，从全国各地来到纽约市杰克逊州立大学，举行为期四天的集会，纪念黑人女诗人菲利斯·惠特利的诗集出版二百周年。

菲利斯·惠特利出生于非洲塞内加尔，后被带到美国卖给波士顿市的商人约翰·惠特利当奴隶。她读了一年半的书后就开始写诗，但她的诗集无法在美国发表，直到一七七三年才在英国初次出版。

参加这次集会的女诗人，用朗诵菲利斯·惠特利的诗歌，演出描述她的生平的戏剧等多种形式纪念她。她们还跟杰克逊州立大学的学生座谈，交流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

纽约市的黑人女诗人琼·乔丹回忆起三年前，就在这所大学的校园里，有两名学生由于跟警察搏斗而被枪杀，她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这血淋淋的事实。

集会的组织者、杰克逊州立大学黑人文化与生活研究院院长玛格丽特·沃尔克博士说，她感到这个集会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现在有许多黑人作家仍然经受着与菲利斯·惠特利同样的命运。“尽管他们受到读者的欢迎和评论界的赞扬，教科书仍然不把他们的作品收进去。这就是我们举行这个集会的原因之一。我们的年轻人应该学到那些被藏起来的东西。”

描写凶杀的电视片在美国泛滥成灾

据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报道，描写凶杀的影片，近年来再度充斥美国的电视屏幕，影片中烧杀抢掠的规模越来越大，做法越来越放肆。据统计，在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年间，凶杀片占整个电视节目的十分之八，占卡通片的十分之九。这些教唆杀人放火的影片对电视观众，特别是对青少年毒害很大，使青少年犯罪率激增。波士顿市有六个青年看了这些电视片后，于一九七三年十月二日，在街上看见一个青年妇女提着一桶汽油向自己的汽车走去，当即上前将她围住，强迫她把汽油浇在自己身上，然后点火把她活活烧死。类似这样的事，在美国社会上屡见不鲜。

报道说，凶杀片的泛滥，引起美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最近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有三分之二的公众认为电视上放映的凶杀片太多了。不少人还向美国国会及其他有关机构写信，愤怒地进行谴责。但是，由于凶杀片成本低、利润高，电视商出于赢利的目的，找出种种借口，拒绝减少凶杀片的放映。美国统治集团中，也有人对凶杀片的泛滥感到忧虑，但是无可奈何。有些参议员想用统计凶杀片在电视节目中所占的比例的办法告诫电视观众，但电视商认为这反而会使更多的人去看凶杀片。

艺术地再现发达的社会主义 社会的生活(节译)

苏修党刊《共产党人》1972年第9期刊登该刊编委、文学评论家伊凡诺夫(1973年已病死)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学中的几个迫切问题》。这篇文章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谈对过去时代的文化遗产的态度问题；第二部分谈关于苏联文学的继承问题；这里节译的是文章的第三部分，主要谈文学反映所谓“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问题。作者在这一部分中提出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两种“新与旧”的矛盾冲突，肯定话剧《外来人》中切什科夫这个形象，为苏修鼓吹写所谓“当代英雄”制造理论根据。

自然，直接的当代现实的艺术反映是更为“费力的硬果子”。当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达到社会一政治统一的高度的时候，当人民已经创造了把科技革命的成就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结合起来的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时候，问题就在于真正地、印象深刻地、艺术地再现今天，再现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①

在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曾经强调，社会主义在苏联三十年代下半期就已经取得胜利，在此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在苏联社会中，国民经济、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

^① 此处着重号在原文中系斜体字，下同。

化和觉悟都取得了无可估量的更高的水平。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说：“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苏维埃人用忘我的劳动建设起来的。”

在苏共中央“关于筹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五十周年”的决议中，对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重要的方面作了说明。

成熟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领域，是今天苏联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对象。遗憾的是，今天的苏联文学在反映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生活所具有的特点方面做得很差。而可反映的东西是有的：社会主义各民族的繁荣和接近；人们的新的历史统一体——苏联人民的特点；个性的全面发展；存在于脑力和体力、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别更为明显的消失；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以及许多许多别的方面。须知，这一切不是抽象的范畴，它们可以在我么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在他们的性格中、道德中以及诸如此类中找到反映。这远不是无冲突过程。它们渗透在形形色色倾向的尖锐冲突中。理解当代现实发展的规律性，这就是看到它的冲突的多样性。

在反映我们生活的今天的作家面前，有着极为复杂的任务。如果说在为阶级矛盾或战时环境所制约的冲突中，人就象石蕊试纸那样把自己表现得确定无疑，那么在今天，事情就远不是那样简单。

怎样更鲜明地揭示当代的先进人？在什么样的环境和冲突中揭示？用什么观点？怎样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英雄行为？所有这一切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印象深刻地显示这些或那些当代人所具有的反面特点也是不容易的；虽然这些特点似乎是在表面，问题却在于如何令人信服地揭示它的原因和克服它们的道路。

自然，对这些问题，谁也不可能给药方般地回答。但是批评

家和读者一起可以评判作家所找到的答案的说服力，这种说服力不只是依赖于文学技巧。必须把技巧贯穿在社会、心理和其他给当代人以影响的过程的最深刻的本质中去，而这只有用真正的、融会贯通了的马列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评价全部现象和整个极其复杂的当代现实才能做到。为了展现我们同时代人的本质，应当善于把他的思想、行为和事业同这个现实所特有的宏大規模相对照。

在许多作品中，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角色，多半不能给人以深刻印象、不能触及心灵，而只是象影子那样一闪而过，这是表面地显示生活的结果。

反映什么样的冲突才使一系列作家或多或少成功地揭示了当代苏联社会的各种类型的人们呢？

首先，这是新的、社会主义的和旧的、衰颓着的事物之间的冲突，这些旧事物虽然已经注定要失败、要成为过去，但是它们还绝望地抓住生活，时而妨碍着新事物，使新事物横遭损伤，并且摧残人。

阿·阿纳尼叶夫的长篇小说《界线》，就是一系列反映类似冲突的作品中的一部。作家既成功地描绘了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意识体现者的鲜明形象（有着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丰富阅历的民警中校鲍加坚可夫，年轻的侦查员叶戈尔）；也描绘了停留在旧事物桎梏下的人们的鲜明形象：爱钱财，要积大钱，甚至准备为此去犯罪（米纳耶夫·伊巴金）。

妨碍我们当代生活，并且一定程度上还在传播的旧事物的危险残迹，就是各种各样的违法行为。

同这些残迹相联系的冲突，很自然地继续使我们的作家们激动。这些冲突基本上都用侦探小说的体裁来表现，并且经常流于公式化，流于文学的刻板公式。当然，同这一主题相联系的

生活材料未必可能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但是深刻揭示决定这种或那种罪犯的行为的种种原因是必要的。很遗憾，这种揭示常常是不成功的，因此，一般说来，侦探小说写得太相似了。

如果作家严肃认真地触及与犯罪现象相联系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就会很有说服力并且印象深刻。

以符·玛加宁——前不久用长篇小说《直线》天才地表述自己的新的中篇小说为例。这部新中篇小说叫做《没有父亲的人》，写的是关于昔日保育院孤儿在生活中艰难地探索自己的道路的故事。

小说的主角尤里·拉宾比大家更快、更坚实地找到了这条道路，他并且还帮助了自己过去的一些同学。

在他的同学中，只有一个被朋友们友爱地叫做谢廖仁卡的人，怎么也没有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为不善于“把自己掌握在手里”的人。拉宾做他的工作做得特别多。在这方面，罪过都在于意志不坚定的青年还在童年时就受到了深刻的创伤，这个创伤是毁害他母亲的暴徒的野蛮行为的结果。

甚至连老朋友拉宾的关怀也帮助不了在心理上受损害、正成长为青年的谢廖仁卡。他不断地在反社会的行为里“跌落”，于是最后，他身患重病，奄奄一息。小说的情节线索由于同这个冲突境遇相联系而具有说服力。遗憾的是，拉宾这个光明人物的品质的体现者的形象，在思想艺术关系上，写得不如其他形象成功。在这个形象里，感觉得到某种模糊不清和性格的不确定性，这表现在小说的许多情节里。这是某种抽象的善的体现，也只能是这样。

有积极作用的坚定目的性的例子是伊·德沃列茨基的剧本《外来人》中阿历克谢·切什科夫的形象，这个剧本现正在我们很多剧院里上演。

确实，我们在这里遇到另一种类型的冲突。这个冲突也是旧与新之间的冲突，但是这里的旧事物不是革命前制度的“遗毒”，而是我们自己发展中的困难所产生的。这个冲突是以领导生产的现代科学方法的拥护者为一方，同另一方——主观上是正直的人们之间的冲突，也许，他们在某个时候，甚至为自己的时代体现了不坏的倾向，但是他们僵化了并且实质上成为在科技革命条件下进一步发展生产的障碍。

被任命为巨型车间主任的工程师切什科夫反对因循守旧，拒绝紧急动员和突击作风，勇敢地迎着同公司领导和某些别的还看不到现代方向的工作人员之间的尖锐关系而成为胜利者。

在这一类冲突和它的戏剧性的解决中，当然有着同尖锐的情节相联系的一定的象征性。可以责难作者说，他没有在集体中找到一开始就跟着切什科夫走的足够的力量。但是，评论界友好地支持这个剧本是做得对的。

在列·隆顿的中篇小说《做一个工程师》中（《莫斯科》1972年第1期）也是以相似的冲突为基础的。这，自然不是偶然的巧合。以科技革命的成就为目标的先进的、现代化的领导方法同衰颓着的传统的突击作风、紧急动员以及诸如此类的倾向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了在很多现代作品中情节展开的动因。重要的只是这条路不要变成“踏出”一条容易通向“公式”的路。在主人公的心理方面，在形成作为作品人物的这种或那种类型的人的环境方面，必须有非常细致和深刻的洞察力。

无论是剧本《外来人》的作者伊·德沃列茨基，还是中篇小说《做一个工程师》的作者列·隆顿，都力图避免把主人公直率地区分为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在刻画与先进人物相对立的形象时，列·隆顿也象伊·德沃列茨基一样，想显示出这些从本身来说是正直的、真挚而有坚强信念的人们，他们的行为是于国

家十分有益的。他们的方法不是由他们性格上的缺点产生的，而是在成长为领导者的时候，当时的经济和技术环境所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在于这些人能否尽快地跟上生活中出现的新事物的步伐。

很遗憾，列·隆顿的中篇小说里的重要构思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艺术体现。主要人物维克托尔·康斯坦丁诺维奇的形象很少成功，他时常象被指定的管理机器一样出现，对某些与他相对立的形象也是如此。总之一句话，中篇小说《做一个工程师》更象是作家在表现现代题材方面的申请书。

我们谈了现代题材作品中的两种性质的冲突，但是，不言而喻，这些冲突要多得多。作家们力图反映这些冲突和寻找解决这些冲突的途径，他们的成就各有不同。

在讲到文学反映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生活所面临的那些任务的同时，还想谈谈关于对我们文学一向是，现在也是主要的题材——工人阶级题材的作品。众所周知，就是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也是领导力量。而且，它的社会作用在不断增长，这就决定了对它进行艺术反映的浓厚的兴趣。在这里，我们的评论界不是没有根据地首先提到瓦·柯热夫尼可夫的《特别分队》、谢·萨尔塔科夫的《巴尔宾的故事》、符·波波夫的《战斗中获得》和米·科列斯尼可夫的《挑选的权利》。遗憾的是，这样的作品还非常缺乏。

先进的现代工人的特点，值得在文学中多方面地和深刻地加以反映。瓦·柯热夫尼可夫在塑造了彼得·梁平金和斯捷潘·布可夫的形象以后，可以看出他最靠近于揭示这些特点。瓦·柯热夫尼可夫的中篇小说完全应当在文学评论界和广大读者圈里得到肯定的反映。对谢·萨尔塔科夫的《巴尔宾的故事》也可以这样说。

在中篇小说《不要出卖皇后》里，谢·萨尔塔科夫的主人公、沉箱工人柯斯佳·巴尔宾说道：“对我来说，没有兴趣的工作是没有的。在似乎是最枯燥的事情里，我也能给自己找到兴趣。首先，兴趣在工作本身，在为了工作而找到某种运动的美，没有运动的美我就不懂得劳动……而第二种兴趣是不仅看到现在双手在干活，而且看到结果，你的工作所能产生的结果：在沉箱里挖泥泞的粘土，要看到花岗石砌的桥墩；拉着肮脏的装卵石的车子，要看到漆得光亮闪烁的汽车怎样在桥上飞驰。”

这是苏联工人的传统，在我们文学里这个传统也传统地得到了反映。要知道，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里，库兹涅茨克的建设者们在雨里冷得发抖，他们期望建设一个花园城。诗人以充分的根据来证明：“在苏维埃国家里有了这样的人，我知道，城市一定会有的，我知道，花园里一定会百花盛开的！”

柯斯佳·巴尔宾不是无聊的空想家，而是，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现实的浪漫主义者。他的理想是同挑选适合自己力量的广泛可能性相联系的。他同妻子玛莎，一个年轻的工程师一起幻想到宇宙去飞行。什么事情都与他有关，这就是为什么他为舒拉·卡洛列娃——一个落在罪犯集团里被灾祸威胁着的姑娘而斗争。

我们时代的先进的年轻工人——柯斯佳·巴尔宾就是这样的：在小说里他的许多讲话同我们先进的工人们讲到关于自己和同志们的话是完全吻合的。

谢·萨尔塔科夫成功地表达先进的当代人的思想和感情而借助的艺术手法不是教条，别的作家可以找到别的艺术方法，甚至是更复杂的和印象深刻的方法。我的观点是，这种手法也会达到自己的基本目的的。

在艺术散文中，对当代农村劳动者的形象进行最充分揭示

的，有这样一些作家：伊凡诺夫、拉多夫以及一系列别的作家。当代农村劳动者的某些特点，在阿斯塔甫也夫、贝洛夫、拉斯普金以及其他人的短、中篇小说里得到鲜明的反映。遗憾的是，在一系列写农村的中篇小说中，目标不是反映现代的特点，而更多的是宗法特点。揭示当代农村的高大的正面人物的企图，在一切情况下都是非常令人不能信服的。也许这是因为，简单化、公式化、和由此产生的主人公行为的人为化和臆造，以及它们心理上的原因在起作用。

鲍洛维可夫的中篇小说《阿纽塔》（《伏尔加》杂志1971年第11期）就是类似这种艺术家的不成功的作品。把名字作为小说名称的女主人公以及某些其他人物，按照作者的构思，应当多方面地描绘出目前农村的苏维埃人的个性，试图展示脑力和体力劳动者之间差别的消失，但是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勾出了一条虚线，这样的虚线未必能揭示当代农村生活所具有的那个多样性。而上述问题却要求特别深刻的艺术反映。

鲍洛维可夫的中篇小说只是很多例子中的一个，而且还不是那些选取了重要的非常必需的题材、但写得表面化的作品中的最坏的例子。

也有其他一类作品，在这些作品里，作家的注意力一般不是集中在主要方面，而是集中在次要的、有时是很荒唐的方面。

自然，生活是这样的多样化，它可以供给无限数量的细节和环境。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家的任务在于：在所有这些多样化中，在苏联人的任何具体的生活现象中，找到并且以艺术的分寸、印象深刻的说服力，明亮地照出正是苏维埃人所具有的那些东西。

我们只是谈了当代苏联文学发展的某些问题。

所有艺术创作问题的顺利解决，是同我们的文艺批评活动

联系在一起的。必须深刻地和全面地评价作家的作品。非常遗憾，这远不是经常做得到的。举例说，在俄文版的贝尔舍维茨诗集的序言里，只指出她的创作成就。其实女诗人是有重大缺点的。为什么对这些缺点不声不响呢？为了关怀地指引他们的创作活动，适时帮助他们在思想、创作上成长，批评家应当指出艺术家强的方面和弱的方面。

在苏共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和不久前苏共中央决议里谈到的关于文艺批评的那些内容，是一九七二年一月全苏作协理事会名为“文艺批评和当代现实”的会议上作为进行详尽的和全面的分析的基础。

用哲学和美学上的方法论武装我们的批评界，铲除主观主义、集团偏私、无原则的恭维和无根据的辱骂具有特殊的意义。

毫无疑问，党的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指示和上面提到的苏共中央的决议^①，对文学艺术，同样也对文艺批评的进一步发展，将以最有效的方式促进苏联艺术文化的新的高涨。

(迅行译)

① 指苏修中央关于加强文艺批评的决议。